



## 目 录

### 专 论

- 3 冯绍雷 / 十年后的展望——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定位与空间思考

### 专题文稿：外高加索与俄国

- 8 林精华 /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 30 刘亚丁 / 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的行旅和创作为例
- 47 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 / 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五日战争”之结果及影响
- 68 马尔哈兹·马茨阿别利泽 / 俄罗斯地缘政治构想与异化的俄格关系
- 81 罗伊·埃里森 / 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评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

### 苏联·苏共

- 94 崔海智 / 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
- 124 曹广金 / 论1929—1933年经济危机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 学术对话

- 138 施展、冯绍雷 / 关于苏联、民族国家与“人”——“地”关系的对话
- 145 胡彦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年4月23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1 年第 2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Фэн Шаолэй*

Обзор 10 лет спуст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вопросом будущ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3)

###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Русская импер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РФ—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пониман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8)

### *Лю Ядин*

Эх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вказской войны XIX века—Маршруты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Лермонтова и Л.Толстого..... (30)

### *Сергей Маркедонов*

Кризис Больш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Россия—Результат и влияние «пятидневной войны» ..... (47)

### *Малхаз Мацаберидз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и ухудшение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68)

### *Рой Аллисон*

Военная сила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по кампании в Грузии..... (81)

### *Цзуй Хайчж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экономики СССР—Доклад И.Майского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британско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 (94)

### *Цао Гуанцзинь*

О влия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929-1933 гг. на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24)

### *Ши Чжань, Фэн Шаолэй*

Диалог о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человеком» и «территорией» ..... (138)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1 年第 2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Feng Shaolei*

Prospects after Ten Years of the SCO's Establishment — On the SCO's Future Orientation and Space ..... (3)

### *Lin Jinghua*

Russian Imperial Tradi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ology of Post-Soviet Literature ..... (8)

### *Liu Yading*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Caucasus War of the 19th Century — Taking the Traveling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Lermontov and Leo Tolstoy as the Example ..... (30)

### *Sergey Markedonov*

Crisis of the Great Caucasus and Russia — Results and Influences of “Five-Day War” ..... (47)

### *Malkhaz Matsaberidze*

The Russian Geopolitical Conceptions and Metamorphosis of the Georgian-Russian Relations ..... (68)

### *Roy Allison*

Military Force as a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 Examining the Official Russian Discourse on the Campaign in Georgia ..... (81)

### *Cui Haizhi*

Perspective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Postwar Wester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 Ivan Mikhailovich Maisky's Reports on Postwar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 ..... (94)

### *Cao Guangjin*

On the Impact of 1929-1933 Economic Crisis o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 (124)

### *Shi Zhan & Feng Shaolei*

Dialogue on the Soviet Union, Nation-Stat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Territory” ..... (138)

专 论

## 十年后的展望

###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定位与空间的思考\*

冯绍雷\*\*

十年之前，上海合作组织的横空出世，成为欧亚大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令全球关注的大事。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历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推动了区域跨国交往的扩展和深化，揭开了欧亚地区跨国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历史性篇章。

历史地看，这一组织是在本世纪初欧亚地区面临新的发展和新的挑战的环境之中形成的，是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宗教文明、不同国力大小和不同国内体制的复杂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一成长路径一方面表明了这一组织乃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历史性创举，而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组织的发展道路决不会一帆风顺。

在这十年中，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继解决相互间的边界问题之后，通过种种条约为这些国家增进互信和确保安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与法律保证；构建了相当丰富多样的组织框架和机制，为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之间发展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使得这一组织的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多年来，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进程中，该组织的声音始终是转型中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年来，世界的形势正在发生进一步的重大变化。

首先，国际政治经济重心正在迅速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国际发展势头正在迅速出现。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成长，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 2005JJDGJW039)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正在成为这个转型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也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G20、金砖国家、以及一系列全球的和地区的国际组织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是这一领域的突出亮点。虽然，欧美国家无论在战略力量、经济实力、管理水平、体制影响、以及思想文化的辐射力等各方面，依然在全球格局中明显占据上风，但是，传统工业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占权重正在下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正在逐渐地消退；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虽依然存在，但是内部相互依存度正在下降。

第二，近十余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后冷战时期大国间结盟对抗现象的消失，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远不如冷战时期那样重要。但是，国家间实际冲突水平、频率和烈度，依然令人担忧。从1999年开始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一直到最近的利比亚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这中间，一方面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猖獗、包括过度依赖镇压的暴政，使得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但是另一方面，借反恐、反对镇压平民而实施的势力扩张政策显然已经成为强权的行为惯性。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因素还是一再以各种方式被作用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其中，美国所主张的外交就是为了“推广民主”的信条，已经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重新被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在这样动荡而微妙的形势之下，中亚各国、俄罗斯、中国等国组织起来，以我们自己的合作行动避免外部势力对于我们所在地区的干扰，确保我们所在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区域国际组织存在的意义。

第三，最近这十年来，全球化推进下的正反两方面效应、若干强权附加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观意志、及其被激发起的社会抗拒，使得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动荡、危机和非常规性事件层出不穷，危机——反应式的事态处理成为大国间国际交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大国行为因突发性危机事件作用于地区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借助于重大危机来实现外交突破。“9·11”事件、颜色革命、天然气冲突、世界金融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动荡等等，几乎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危机——反应式的事态处理特点。而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几乎又都与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有着密切关联。从如何应对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危机形势的角度来看，国际经验证明了这一国际组织存在的必要，同时，也给这一组织今后发展的前景设置了重重的考验。

第四，从国际金融危机、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以及中东北非的所谓“革命”以来的局势变化看，当危机中的各国难以自保、客观上却又置身于各自原有的区域合

作框架之下的时候，当美国也难以施展全球性的影响、不得不退而以经营若干地区作为其战略重点的时候，在地区和次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与竞争，非常可能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国际事务的焦点所在。欧盟在原有区域框架已经力不从心、各国意见分歧渐趋扩大之时，将竭尽全力力保维持区域合作进程，以免在全球竞争中沉沦；东亚地区的合作在遭受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背景之下，特别是面临美国“重返亚洲”的重大战略调整的背景之下，也必将是一番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上海合作组织所在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乃是大国间博弈的聚集地：在这一地区，北约与欧盟在过去十多年里经历了重要的扩张，目前只是处于间歇状态；而近年来，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大力提升影响力和聚合力，特别体现在对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三国海关同盟、包括欧亚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地区机构合作水平的提升上，也将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一种新的外部环境；包括中亚国家要求实现自己的自主性建设、使这一地区免受任何大国主宰的愿望，也都给区域合作进程输入了新的动因。总之，“区域”概念在国际事务中的提升已是相当令人关注的事实。

第五，新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势头迅猛，内部整合的水平有所提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继续上升，但是，发展和转型的方式正在面临深刻变化。俄罗斯正在进行有关“2020年发展纲要”的大讨论，中国正在进行从过于依赖海外市场转向海外发展和发展内需均衡式发展的战略大调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正在以不同方式进入所谓的“第二次转型”，以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并克服前一阶段改革进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政策陷阱”。这种发展机理和内部体制结构的变化，势必将对新兴国家、转型国家的外部关系带来不同含义的影响：虽然，体制变迁中相对权力集中的过程可能引发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敏感与紧张，但是，像中国这样从外延型发展转向内需和外部平行发展的战略，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迟缓国际紧张状态的有利因素。这是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背景。

总起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更富有活力的发展与壮大，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阶段国际社会、地区层面、成员国各国内部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所规定的一个客观需求。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年以来，人们对于该组织本身的地位与作用也正在越来越具有客观清醒、并富有远见的认识。

鉴于该组织是在冷战后的一个特殊阶段建立起来的跨国区域组织，它已经在一系列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还不可能希望它立即就具备像欧盟、北约那样的老牌国际组织在长时间中所形成的非常成熟的内部功能和机制。因此，可以在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期待它在一旦发生重要的国际变局、包括本地区面临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发挥其所有预想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已经在较短时期内处理了那么多复杂的国际与区域事务的地区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是完全

可以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体现出来的。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具有的不同国内国际背景，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功能定位，可能还会在增加政治互信、加强安全合作和深化经济交往水平等各个方向的相互交叉中被确认，而不会被简单地定格为或者仅仅是着眼于经济功能，或者仅仅是着眼于安全事务，或者仅仅是提升政治互信水平。这样一种状态既是由于所在地区的多种需求的客观态势所决定的，也是出于各成员国和各观察员国唯有在进一步合作中才能够寻求和发展出更多共同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理。

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开始，就被其宪章定格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组织。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处于不同程度的进一步体制变迁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以，十年以来，不仅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有所扩大，吸收了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其正式的成员国，而且也吸收了蒙古、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作为其观察员国，以及吸收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作为其对话伙伴国。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扩展问题，在该组织已经具备了关于吸收成员国的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上，可以谨慎、稳步地推进，前提是既有利于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之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有利于区域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互利、正义、合作和稳定。

就未来发展的态势而言，一个根本性的趋势是：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依然存在着巨大潜能。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各方相互之间互补性的经济与安全结构仍将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的发展。从经济的角度看，最近有学者提出，独联体的发展有三个难题：粮食安全、创新经济、自由贸易区。实际上，这也正是今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相互之间可以发挥合作互补的优势之所在。从安全领域来看，该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安全隐患，包括美国宣布撤军之后以阿富汗形势为核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各国有着大量的共同认知，可以使之形成为安全合作的机制。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所奉行的“上海精神”，是这个新生国际组织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该组织的多边与双边合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依托。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成员国的诉求和利益，乃是这种精神的基本要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不仅在各自己已经参与的多边或双边合作的构建过程中得到了体现，而且也在各自暂时尚未参与的成员国多边和双边关系中得以体现。这样一种本着协商求同的精神、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态度，为该组织的长远发展作出十分重要的铺垫。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还有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上文讲到过，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结盟对抗的紧张态势，但是，出于各种动机的意识形态惯性依然没有全然消失，有人还是习惯于用“输出民主”式的立场和战略

来看待和处理这一地区的事态发展。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来说，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民主体制，总的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不同的行进节奏，不一样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匹配，使得对于这一异常复杂转型过程，有一个被外部世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苏联解体二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与西方国家良好关系的愿望不一定能够被即时理解和接受的前车之鉴，使得当地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改善相互关系的过程始终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因此，为了避免内部的转型过程受到过多的外来不虞之扰，为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存在着从“体制接近”走向“体制合作”的可能性。这一逻辑惯性的存在，至少将会以外部世界多大程度上愿意、以及能够客观友善地看待非西方国家的转型事务，以及非西方国家本身将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地推进这一领域的改革为前提。

总之，十年的经历对于势将担当大任的区域国际组织来说，还是一段非常短暂的历史。但是，在这样一段丰富的历史体验中，人们正在进一步看清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诸种动因与机理。

（责任编辑 常喆）

\* \* \* \*

（上接139页）

**冯绍雷：**谈得不错！尤其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中“民族一人一地”这一根本特性的点明，指出其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的地方，值得重视。我很支持其他学科的朋友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民族问题以及俄国问题。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但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加油干吧。

**施展：**谢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专题文稿：外高加索与俄国

##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

### ——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林精华\*\*

**【内容提要】**文学在后苏联没有消亡，甚至年度的文学生产量远超过苏联时代的每年文学创作。然而，后苏联文学的存续及其所显示出的生命力，不能视作是反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可以仅仅看作是文学产业化的结果，倒是应该看到，文学在后苏联的独特性是后苏联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其审美的表达。这种情形接续了文学在俄国的传统，从而继续与欧洲文学相区别。造成后苏联文学的如此特质，正在于俄罗斯自身的帝国传统在俄联邦时代不是中断了，而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使俄国重建有了国民认同的依据，文学则成了在审美上促成俄国人认同俄罗斯国家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后苏联文学 方法论 民族主义 帝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08-(22)

文学在后苏联时代的存在和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大型文学杂志以及不断创办的文学报刊，20年来刊载的文学作品的总量是天文数字，还不包括有些作家的作品未必先经由杂志而是径直从出版社发行出来的；《文学报》每年都公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图书之家》的图书销售量、社会许多团体或个人大力支持文学事业、有些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等，这些情况意味着后苏联俄国文学仍然得到社会的相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1990年代以来俄国文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2BWW006）的阶段成果，同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项目《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俄国社会进程》的支持。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当关注，成为俄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部分，是一项必须面对的公共事业；文学杂志和文化电视台、学术界对后苏联文学的热烈讨论，有些讨论甚至波及到社会公共领域，促使大学开设后苏联文学研究专题课，这些情况表明，文学在后苏联时代仍是知识界积极关注的对象之一；不同的文学奖项激活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国家、社团和重要人物积极支持文学发展，许多作家参与社会进程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显示出文学没有蜕变成作家同仁圈内的自娱自乐游戏，而是和后苏联俄国重建相关联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文学事实”的存在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也不限于作家和读者的审美活动，而是经由文化市场去参与后苏联俄国重建的文化活动，要满足民族认同的诉求，因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力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然结果，哪怕是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可见，文学没有随着俄国的历史变动、疆域变化、政治动荡、经济冲击和全球化侵袭等而消亡，反而以奇特的张力彰显出相当强的生命力，从而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学景观。这是否就是人们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所预期的“俄国文化复兴”呢？如果真是这样，何以有那么多怀疑和否定后苏联俄国文学的声音呢？若不是，又何以让那么多俄国内外的专业学者如此痴迷后苏联文学，很多作家获得各种重要奖项呢？莫非它是苏联文学在后苏联阶段的正常延续，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俄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代作家的作品本身，但它的存在方式却不同于苏联文学？退一步说，即使把当代俄国文学视为俄国文学史从苏联延续到后苏联，又该如何面对这庞大的文学事实及其和苏联文学的区别，而不是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视为社会政治表达的延伸呢？

面对如何理解如此庞大的文学事实之困境，《俄国文学拉特利奇指南》(2001)有研究方法论的提示：若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来谈论后苏联俄国文学，无疑会造成对其实际的本体意义的某种偏离，或会夸大其审美的或社会的价值，或缩小乃至否定当今文学存在的积极意义<sup>①</sup>。这就意味着，用苏联时代官方研究文学的方法是不合适宜的，不能对文学事实予以客观描述，会脱离整体文学事实及其历史过程，受限于若干其实没能影响社会之作的人物形象、主题、风格等，并且这样的解读容易个人感知化，和文学事实不相关，甚至远离文学叙述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按多伦多大学教授马尔什研究后苏联俄国文学的经验，“探查后苏联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化人物在后苏联时期对历史和民族认同所表现出的各种态度，同时关注为何俄国文化知识分子（和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后苏联之作用的严重衰落……要特别关注后苏联俄国出版的关于历史主题的文学文本。关注的不仅是文学和文化文本本身，还要

---

<sup>①</sup> Neil Corn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1, p.235.其中写《后苏联时代文学》的是《文学报》专栏作家奥拉·拉特尼娜和格拉斯哥大学著名学者德维斯特(Martin Dewhrist)。

讨论它们在媒体上所引发的争论。包括小说作品中所表现出对诸多事实的历史精确性或解释的有效性，和它们在俄国社会的各领域所激发的政治与美学讨论”<sup>①</sup>。这一经验提示我们，不能限于文学文本来研究后苏联文学事实，但它尚未充分揭示如何有效把握后苏联文学转型的途径，因为这是涉及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等的超文学难题。

—

**要理解庞大的后苏联文学事实，的确需考虑社会政治诉求和民主纷争的语境，但再也不能如苏联时期那样视文学为社会政治的延续。**按《旗》杂志主编楚普林所论，“(在后苏联)作家试图充当国家的家庭教师或试图去统帅人民，文学报刊编辑部希望履行政治俱乐部职责并指导社会舆论，这样的时代已不再”，但文学也随之遭遇失去意识形态特权之后果，社会声望丧失、文学中心主义瓦解等危机<sup>②</sup>。这种情形之发生，是因为伴随后苏联到来的过程，新闻报刊审查制度被废除，法律代替了政党意识形态，言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结束了苏联时代的政治以其强权干预文学的情形，政治日益成为政治家们的专门活动。而以政治行为强行推动的休克疗法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993年10月叶利钦以武力终止苏联留下来的苏维埃(议会)、他政绩不佳和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却竞选连任成功，普京执政的8年及其以后的岁月以牺牲民主和宪政来发展经济、梅德韦杰夫继续经济中心却时常引发克里姆林宫和政府之争等等，这些都显示“政治民主”和“自由”在俄国的尝试并不成功，人们对政治丧失了信心，政治中心化的格局基本上被打破，以至于总统大选的投票率越来越低，居民对国家杜马选举的热情远不如对地方杜马选举的期待。即使意识形态纷争不断、不同层次的政治权力角逐每年都在进行，但不再影响国民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对文学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少遇文学被政治活动所干预的情形。即使有些作家和批评家积极参与政治纷争，那纯粹是个人行为，如1974年流亡美国的作家利蒙诺夫(О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 1942—)，1990年代初回国后就热衷于政治，甚至于1994年3月组建反政府的“民族国家布尔什维克党(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从日里诺夫斯基自由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另一激进民族主义政党，几次被政府拒绝登记，其本人也数次入狱，但并不影响其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在2009年3月他宣布参加2012年或提前的总统大选，也没有妨碍其文学活

<sup>①</sup> Rosalind Marsh, *Literature,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Russia, 1991-2006*, Oxford tec.: Peter Lang, 2007, pp.17-20.

<sup>②</sup> Знамя. 1995, №1, сс.187-188.

带格式的：俄语

动，他叙述自己从事俄罗斯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历程的传记《我的政治生涯》(2002)、作为政治家理解俄罗斯问题之作《另类俄国》(2003)、诗集《俄罗斯人》(2004)、政治散文《利蒙诺夫反对普京》(2003)、长篇小说《自命不凡者的末日》(2006)、诗集《小男孩，快跑》(2009)等能正常出版，有的作品甚至小有轰动。由此，政府设立的诸多文学奖，也不再是传达和实施意识形态的行为，但官方文学奖是否能促使文学更好地存续和发展，同国家的出版言论自由法律之间构成何种关系，与民间团体设立的奖金数额不等的文学奖是否共同促进了文学在俄国的多元化发展(还是成为左右文学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等问题，若只限于政治领域来讨论，是很难言说清楚的。

这种政治自由对于俄国知识界和文学界来说是新鲜的陌生事，三百年来作家和批评家首次可以自由理解“谁之罪”、“怎么办”、“复活”等问题，而且作家的不同政治立场、杂志的各种倾向，正好构建了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正是在这种情形中，苏联时代那些不被认可的知识分子所创办地下出版物、侨居境外的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境外出版物合法化了。这些出版物上当时被称为另类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在后苏联俄国不再被视为另类叙述。相应的，后苏联后现代主义作家能按自己的方式去叙述俄罗斯问题，表达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俄罗斯帝国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从而使得后苏联俄国文学的生存境遇未必完全依赖政治，即“我们处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时代”，而且是有别于西方那种和现代主义对抗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它有自己的秘密，且不仅仅是精英构思和商业运作出来的畅销作品<sup>①</sup>。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这期间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事实，就需要特别观察因为后现代因素的参与，文学生产者理解俄罗斯问题和表达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仅仅是政治原因。

然而，事情却并非就这样简单明了：在后苏联俄国，政治仍然存在并有很大的干预社会能力。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作协即刻出现分裂为互不承认的民主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和爱国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之趋势，传统派占优势并掌握着作协领导权，自由派便在当年10月集会，另立作协，于是出现了传统派控制的俄联邦作协(当时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协)和自由派掌握的俄国作协(苏联作协)。作家组织分裂成对立两派的状况，近二十年来始终存在，导致卷入不同派系的作家、批评家，其文学活动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其中，著名批评家楚普林的年度性《俄国文学指南》经常性排斥许多著名的传统派作家，原因乃其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明日报》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那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之作《黑炸药先生》(2002)，语言啰嗦、诸多情节有复制媒体之嫌，却深得读者认可，包括楚普林在内的一些自

---

<sup>①</sup> М. Межнева и Н. Конрадова. Окнов ми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006, сс.8-11.

由派批评家很气愤著名出版社(Ad Marginem)何以推出如此右翼之作<sup>①</sup>。其实, 1994年10月底俄联邦作协理事会举行题为“俄国文学: 起源、传统和当代现实”研讨会, 在会上拉斯普京就声称, 莫斯科已失去了俄国的斯拉夫性, 经由仍保留着斯拉夫传统的外省文化改造莫斯科, 是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最好选择。这不单是文化问题, 也是政治诉求。更有甚者, 曾是苏联农村题材作家的别洛夫主张, 作协是文学组织也是政治组织, 文学与政治不是对立的, 脱离政治, 文学无法生存<sup>②</sup>。而曾任国家杜马侨胞联系和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名学者米格拉尼扬(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 1949—), 其《俄国会有前途吗?》(《共青团真理报》1995年第39期)声言:“对俄国来说, 对外的每一次胜利都造成了国内的巨大失败, 导致不自由成分的增加。民族的自我肯定, 是通过地理扩张而实现的。俄国的这种自我肯定方式不是独一无二的, 罗马精神同样也是通过征服新的空间表现出来的, 但罗马精神的背后是高度发达的古希腊文明, 罗马人在掌握了希腊文明后开始将其向各处播散。而俄罗斯精神在进行扩张的同时, 则传播了本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即专制独裁制度”。这也就是, 20年来俄国重建的历程, 共同的俄罗斯帝国认同, 使得表面上俄国没有人为的社会阶级分裂, 但还是有利益集团归属、政见差异、不同党派之别等带来社会政治的分化, 文学界也和社会一样出现分化——“社会政治区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21世纪有极大的增强”, 只是这种来自政治的矛盾, 在面对俄国社会急剧转型时, 共同的俄罗斯民族认同稀释了政治分化的意义, “分化显示出的作用近乎零”<sup>③</sup>。政治分化之于民族国家观念的意义如此复杂, 作家队伍的分裂虽然很难影响文学进程, 却可能加剧文学倾向的进一步复杂化: 一向以张扬俄罗斯价值观为主旨的《莫斯科》杂志, 其主编博罗金(Леонид Бородин)出席《旗》杂志1999年初组织著名批评家和作家举行题为“当代俄罗斯文学: 新的诺亚方舟”研讨会, 论及作家队伍分化10年来的文学发展问题时, 他如是说道, “1990年代初有作家说俄国分成更多部分, 其文化就越丰富多彩和更具独创性”, 那是幼稚之言, “经过10年痛苦的社会经历之后, 他们不再是小孩, 而已独立成人。我想再遇见这样的作家, 问问他打算怎样解释他不是爱国者, 他何以憎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是否发自内心地恼恨国家和人民为标准——我看不可能这样来定义俄罗斯作家。没有这种可能性”, 应当校正所谓“民主派”和“爱国派”的文学分类, 因为“分裂、分化是绝对存在的。但究其原因则是微不足道的话题, 一个并非预定乐意回答的问题。完

① Сергей Чуприн. После драки: урок прикладной конспирологии// Знамя, 2002, № 10, сс.192-197.

② Диалог. 1995, №2.

③ Rosland Marsh, *Literature, history & Identity in Post-Soviet Russia, 1991-2006*, Oxford: Peter Lang, 2007, p.41.

全看不到，证明分化仍在不断加剧的事实。相反，很快就显示出来对文学党派性之争的厌恶。自由创作的愉悦实际上已经来临，只是对文学天才的舞台之展露尚不明朗”<sup>①</sup>。出席这次研讨会和其他作家和批评家，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类似的意见，甚至学术界也有这样的声音，如对俄国批评界和国外学界把俄国作家分成传统派(又称爱国派)和改革派(又称民主派)的做法，莫斯科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阿根诺索夫就认为，这种流行的界定实际上是不可行的，“看得出来彼托夫、沃兹涅先斯基或卡扎科娃，要比瓦·别洛夫、尤·邦达列夫或尤·库兹涅佐夫少一点爱国心。顺便提一句，尤·库兹涅佐夫很难被归入到传统诗人之中。照我看，对优秀作家的划分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的，即建立在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上。一部分人认为，国家应一体化到世界大家庭之中，最低限度地保持民族特征；另一部分人则主张走完全独特的发展之路。这种争论可追溯到19世纪，那时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父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一派)互相争吵。这种分野并无什么坏处，只是近几十年，这种区分有集团敌视的形式……这样划分及其争吵，酷似斯大林主义时期或中国的文革年代，给文学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sup>②</sup>。

可以说，不能认为这是弱势作家的自我安慰或强势一派的自欺欺人之言。社会阶层出现结构性重组，作家队伍出现分化，是正常的，只不过其对于社会重建的意义是有限的。夸大作家队伍因为利益和政见不同而分化，从而会影响文学进程是不合时宜的，诚如批评家库尔巴托夫(Валентин Курбатов,1939—)所说，生活在发生分化，文学怎能维持统一呢？这在西方属于正常表现，而对真正的俄国文学来说则是一种病症<sup>③</sup>。也就是说，政治纷争对于后苏联文学的意义是尚需继续讨论的话题。

## 二

可是，就在政治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日趋式微之际，经济对文学的作用则突然加大。因而，要理解后苏联文学事实，需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出版法的通过及其实施，意味着国家再也不给文学颁发意识形态的许可证或禁令，但文学也就面临着自我生存的危机了：文学产品的推出不再是苏联时代作家创作作品那样简单，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文学生产活动，要根据文化市场规律要求，独立面对出版社(或杂志社)。这也就是为何后苏联时代作家少有全职的，更多的是兴趣和

① Лев Аннинский. Роман Арбитман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оев ковчег?// Знамя, 1999, №1.

② “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阿格诺索夫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③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оев ковчег?// Знамя 1999, №1.

志向所为。同样，那些大型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也是根据实实在在的书刊销售量而各有作家群选择的。于是，苏联时代那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发行量的杂志，在后苏联普遍下降到万份以下。为了生存，必须选择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应和社会政治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导致各大杂志普遍放弃曾热衷的苏联时代作家作品。文学生产中介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完全是销售渠道和读者的选择结果，是后苏联审美趣味的事实性表达，而不是某种观念所致。后苏联俄国文学进入文化市场，无论被多少人批评为粗野的资本主义，但恢复了马克思所说的文学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之真实状态，既改变了俄国出版社的布局（出版社出版和销售排行榜显示出，传统大社普遍让位于新兴的私有出版社），也凸显了大型文学杂志的特色，后苏联俄国文学产品的丰富性便由此而来。这一变化还成就了不同特色的作家群，各种文学奖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了满足奖项要求的产品。同时还培养了具有不同审美要求的读者群，这也是大众文学成为后苏联俄国文化生命活力之所在的原因。尤其是，市场中介作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使文学在后苏联俄国的位置得以摆正。

然而，市场经济之于后苏联文学的意义，同样并非政治之于文学那样明了、简单！市场经济在俄联邦建构过程中的效应是一言难尽的：休克疗法、私有化和金融寡头、打击金融寡头和再次国有化等，实际上使绝大多数的国民失去了苏联时代计划经济的保障，饱受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之伤害。而这样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以政治方式推动的，因而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伴随着的是对设计这种经济的政治制度缺乏信任。《新世界》、《旗帜》、《我们的同时代人》或《新文学通报》等杂志，不因为资助人的不同（无论是自由派的索罗斯基金会还是政府财政预算），会改变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主题的坚持，但普通读者虽然同样置身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但基本上不再自费购买和阅读这些文学杂志。这样一来，文学所表达的民族认同仅是社会状态的表达，而难以直接提升国民对俄联邦认同的质量。因此，市场经济本身经常被文学家所诟病。例如，安德列·彼托夫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就把市场经济叙述成是和政治联手置苏联后期以来知识分子命运于险境的最重要因素。可是，就是这种不被很多知识分子看好的市场经济，积极促进了文学界的分化，没有完全导致文学家变成市场上的写作高手，大众文学只是后苏联文学的一个部分。而且，市场化以其特有的方式锻造了许多作家，推出了优秀作品，从而成就了专家认为难读、却有广泛受众群的维克多·别列文；而阿库宁和安德列·彼托夫两个完全对立的作家，却被市场分别视为后苏联最受欢迎和最重要的作家；还有托卡列娃、乌利茨卡雅、彼得鲁舍夫斯卡雅、托尔斯泰雅等女性作家异军突起。诸如此类的现象意味着，正是基于文学产品在文化市场上的竞争，才显示出文学魅力。另一方面，

文学产品本身却并非是市场经济计算出来的，“同其他文化学科相比，文学研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要松散得多，所表现的形式也更为多样，批评准则对出版和文学信誉的影响，从来没有超出现代主义领域。这并非要否定学术机构与市场之间的任何联系，因为大学和中小学的文学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哪些作者的作品得以继续刊行(在美国那样的大市场情况更为如此)，而文学机构对当代创作的直接影响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不存在以同样方式限制不适合者的经济手段，也不存在文学部门与出版社之间的交流渠道(而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在那里，学术界与展销界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这并非说明，在文学研究机构中不存在发挥作用的强大范式或无意识规则，它仅仅表明，在这个领域比其他领域更为广阔、更加多元化。如果可以把学术性的建构理论和艺术理论比作成功的大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营销成系列的专业性产品，那么文学研究更像一个跨国多业公司，通过不同渠道、采用不同手段，销售大量产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现代范式的轮廓在文学研究中比其他领域中要模糊得多”<sup>①</sup>。这些现象意味着，作家、出版和销售、读者共同完成的文学活动，整体上属于经济学的行为，但具体的文学产品则是特定审美活动的产物、独特文学观念的表达，这也就是为何不止一位作家拒绝数额可观的文学奖的原因。但是，著名作家加尔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Галковский, 1960—)那部由 949 个相互循环的词条组成的巨型作品《无尽头的死胡同》(1985-1988 年创作)，虽然被批评界所热议，却被所有出版商拒绝，作者只得于 1997 年创办“地下出版社”，自己刊行。

可以说，文学作为文化市场的一部分，在后苏联俄国经历了痛苦艰难的历程，却是成就庞大文学事实的崭新动力。然而，通过权力结构推行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实际上强行改变了千余年来俄国人反私有制的价值观，这会在精神上加剧转型的复杂化，也就导致了那些来自苏联时代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强调个人审美和知识分子责任表达的青年作家，会奇特地批评文学经济学，本能地抵抗后苏联俄国资本主义，从而使得后苏联文学对资本主义改革的叙述少有讴歌、多为斥责。

**问题还不止于此。要理解后苏联俄国文学的庞大事实，还需考虑“苏联因素”，但不能解释成后苏联文学是对苏联文学的背弃或延续。**在文学上瓦解苏联的声音，苏联末期已经甚嚣尘上。按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追悼苏联文学》(1990)的说法，苏联制度之终结，首先是官方的苏联文学之死亡，但当时激动着苏俄社会的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和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穿白衣的人们》之类专注于政治上反对专制主义的文学，以及其他直接赞成体制的或明显批评体制的文学，都

---

<sup>①</sup> Steven Conner,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p.111-112.



属于苏联的衍生物，也会迅速消亡<sup>①</sup>。这样的表述，在后苏联到来不久，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验，即大多数苏联主流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很少被后苏联读者所关注。独立电视台在 1990 年代中期时常举行文学辩论会节目，“90%的苏联作家是人民不再需要的”的声音不绝于耳。此论虽然有些激烈，却说出了一种共同心声。弃绝苏联，似乎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前蔚然成风。

然而，随着时间的自然延伸，苏联在后苏联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变得复杂起来。其中，1972 年开始侨居西德的著名逻辑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1922—2006)，先后创作了《精神病院》(1980)、《不贞洁的力量》(1986)、《戈尔巴乔夫主义》(1988)、《共产主义危机》(1991)、《丑恶帝国的毁灭》(1994)等著名社会学小说，以类似辞典的方式，打破了文学和学术的界限，与他的那些并非社会乌托邦小说的理论文本，如《没有幻觉》(1979)、《我们和西方》(1979)等一道，以生动叙述和理性分析相结合，深刻批判苏联的集权制度，被冠以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只揭露了劳改营的内幕，而季诺维耶夫却把劳改营外的生活写得和劳改营里一样。殊不知，2000 年季诺维耶夫在给轰动 1970 年代中后期海外俄侨知识分子的旧作写序时却说：“我在写《发光的高地》(1976)时，并不想要毁掉国家和苏联社会。我深信这个制度是稳固的”。而且，他在后苏联时期也身体力行地写出《俄罗斯的悲剧：乌托邦的覆灭》(1999)、《伟大的进化》(1999)、《通往超级社会之路》(2001)、《俄国共产主义的灭亡》(2001)、《未来政党的意识形态》(2003)等反思苏联的佳作，从不同层面诉说后苏联俄国如何比苏联更糟糕。同样，被迫流寓美国 20 年之久的索尔仁尼琴，当年虽然曾声言“尽快地解散邪恶的苏联，建立只有斯拉夫人组成的新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参加的俄罗斯联盟”<sup>②</sup>，却在《20 世纪末俄罗斯问题》(1995)中反思说，后苏联的产生和存在是俄国历史的灾难，是和 17 世纪伊凡雷帝、1917 年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并列的三个最混乱的黑暗期。他在《倾塌的俄国》(1998)中又称：后苏联的私有化和 1920 年代的“国有化”、1930 年代的“集体化”，是 20 世纪俄国所经历的三大劫难。这不是他的临时想法，1994 年 10 月 27 日索尔仁尼琴在国家杜马发表题为《给人民以权利》的演讲（《真理报》1994 年 12 月 1 日）时已经呼吁，要在切实而真正地向民主制度推进的同时，重申成立斯拉夫国家联盟的必要性。这可以视作是苏联帝国情结在他心中的复活。

这些老作家所表述的苏联情怀，以其复杂的经历对比出苏联的意义，而更多的作家则兴起怀旧之风。曾被强烈批评、否定、质疑的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及其历史

① 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 Памятник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4 Июля 1990, с.8.

② Р. А. Медведев.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11-12, 2001.

带格式的：俄语

遗产，在 1990 年代末却被翻了过来，54%的俄国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俄国历史上最令人满意的时期<sup>①</sup>。对苏联的态度发生如此之变化，是后苏联俄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作为俄联邦总统，普京多次强调俄国历史的延续性，并通过重新肯定苏联国歌的歌词、苏联红军建置、苏联经典文学在教育中的作用等措施，凸显苏联的正面意义，而梅德韦杰夫签署禁止否定性讨论卫国战争的法令。诸如此类行动，却得到议会各党团的支持。不拒绝苏联，其背后不是“苏联”本身的魅力，而是因“苏联”成了激发俄罗斯帝国认同的历史记忆，是俄联邦有效重建帝国的重要资源。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回味苏联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目的不是要重建苏联，也不是要延续苏联帝国，而是要避免后苏联俄国的“非苏联化”（即国家不再继续解体）。实际上，到 1991 年 10 月，还有 75%居民认同应维持苏联存在，而后苏联居民认同苏联、希望成为苏联人的比例已不足 10%。而这种变化，正是基于族裔诉求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如“莫斯科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声音不仅仅是口号，更是强烈现实的表达，导致 1997 年 63%莫斯科居民宁可认为自己属于莫斯科人，而不是把自己视为俄国人。如此强大的族裔主义潮流成为俄国重建过程中的复杂因素，需要苏联帝国意识对其整合；而这种矛盾渗透进文学之中，会使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变得更为复杂。

这些情形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后苏联文学视为是在割断与苏联文学之关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孕育出的全新文学，否则，就如同十月革命后把苏维埃文学认定为是切断与传统帝俄文学之联系的做法同样荒谬；同时，后苏联文学中的许多苏联因素，却不能视为后苏联文学就是苏联文学的延续，因为对苏联的批判或怀旧，皆不同于苏联文学对苏联的叙述。

### 三

最终，我们看到，经由文化市场而得以存在并活跃起来的后苏联文学，不再痴迷于当下政治，而是时常怀念苏联、诉诸历史。但这些并非是因为苏联本身多么正确、帝俄历史多么让人认同，而是苏联作为历史和其他不同时期的历史一样，成为后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资源，这也就构成了后苏联文学事实的基本内容。要理解这类文学事实，就需要特别回到后苏联俄国重建的复杂语境中。

作为有 70 余年“苏维埃身份”的俄国人，突然间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伟大公民”变成了“俄联邦的普通居民”，很难不对自己的苏俄身份发生疑问，必须重

---

<sup>①</sup> Сегодня. 30 января 1999, с.2.

新确认其认同，以消除俄罗斯联邦此起彼伏地加剧人们身份困惑的感受，以至于无论对“后苏联俄国”持何种立场，都必须承认，俄罗斯联邦作为一种存在，已经和后苏联俄国全体居民的每个方面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从具体个人的身份到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诉求到社会的整体建构等皆然。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研究院国际关系教授赖特(Margot Light)看来，苏联意识形态曾左右了俄国居民的身份认同，因而生活在苏联转型和后苏联时代的人，面对那套支撑自己认同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便无所适从。于是，他们找到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把它作为后苏联俄国的进程基础，并成为近 20 年来俄国外交的导向<sup>①</sup>。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趋势和后现代潮流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苏联解体进入了价值多元的后现代化却未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后苏联阶段，若不以帝国诉求面对这些变化，俄国很可能会被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所瓦解<sup>②</sup>。由此，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就不单是文化产业的经济学行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苏联俄国重建过程所左右的文化活动。民族身份、民族国家观念、文学审美的民族意识等构成了后苏联俄国文学的基本内容。在这期间，作家、出版家、读者各自关心的话题可谓千差万别，但面对后苏联未能解决的俄国民族身份问题，则予以共同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由于 18 世纪初就明确起来的俄罗斯问题，三个世纪以来始终没能解决，在后苏联甚至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俄罗斯无法超越沉重的苏联遗产（诸如政治疆域变动而导致居民身份复杂化、国家性质变化而使得苏联价值观变化），要直面全球化与世界文化的挑战（对德国文化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化地接纳或否定马克思主义，也敢于直面包括启蒙主义和后现代的法兰西文化，如德里达、拉康、德勒兹、鲍德里亚、福柯等著作被大量引进、讨论、运用，1995—2004 年间俄国出现了 922 种有关翻译和讨论法国思想和文化的文献<sup>③</sup>），要面对人口减少和超过近千万的俄罗斯侨民的问题，要看到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还有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及制度创新等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普遍和俄罗斯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消解、认同与拒绝等的选择相关联的。

对于如此复杂的情形，利哈乔夫的外孙女、英国索尔福德大学俄国史教授托尔兹(Vera Tolz)的解读是：“因为俄罗斯国家建构的独特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国家框架下的公民和族裔因素是被弱化的。由于俄国是多族裔构成的帝国，俄罗斯

---

① Rick Fawn (ed.), *Ide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Communist Foreign Policies*, Routledge, 2003, pp. 42-59.

② Margot Light (2003),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3,19 (3). pp. 42-59.

③ Татьяна Вайзер.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мысль в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ах(1995-2004)// С. Зенкин ( ред.),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Франция в миров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М.: НЛЮ, 2005, сс.460-519.

族裔身份认同也就没有得到正常发育。俄国和苏联的政府是威权的，甚至和西方相比是可怜的、僵化不变的个人对国家认同问题，因为这类因素，在国家疆域内联合起来的公民认同及其发展变化，就显得荒谬可笑。苏联时期，俄罗斯族裔认同有时是不知不觉经由政府和警察而得到超常发展的，认同的构成过程在1991年还远未完成”，“俄罗斯民族归属和民族家族疆界何在的争论，已经成为后苏联俄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的主流话题。问题的中心则是俄国的未来”，“贯穿1990年代的俄国人观念——应该保存他们统一的身份认同，表达这种思想的，不仅有激进的左翼和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些温和派”<sup>①</sup>。这样的表述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联解体是以加盟共和国为主体的族裔独立诉求的结果，俄联邦则是其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产物，但民族主义在俄国复兴以后，没有因出现俄联邦而止步，而是激发了包括俄罗斯族裔在内的其他族裔的主体性要求。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联邦主权宣言》（规定“民族自治实体可以成为联邦主体，按地域划分的行政区也同样可以成为联邦主体”）。两个月后，俄联邦境内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率先通过主权宣言。接着，其他自治共和国也相继跟上，许多自治州自动升格为自治共和国。到1992年初，16个自治共和国和4个自治州都去掉“自治”，自行宣布为共和国（全俄只有一个自治州例外）。而始于1990年3月的俄罗斯民族统一运动（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作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也是此后俄国如火如荼的政治力量，从莫斯科和彼得堡一直蔓延到远东、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高加索和乌拉尔等全国大大小小的地区和城市，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浩大的本土全民运动，其中甚至出现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言行（并因为它的存在，导致了其他民族也有相对应的族裔主义诉求）。该运动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议会里不断发出支持他的声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体现了这种趋向，他们甚至得到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呼应<sup>②</sup>。1993年9月，乌拉尔地区五个州的首脑联合宣布建立统一的乌拉尔共和国，此后相继出现了“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联盟”等，以至于1996年6月25日政府不得不颁布《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这份政策构想宣称：“在国家生活正处于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有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俄国各族裔的关系。这些趋势包括：各族裔居民要求自治和俄国社会一体化的客观过程并行；俄国各主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劲，公民要求强化国家制度、贯彻统一的经济政治改革政策，与满足各地区由其历史经济文化特点所决定的状况相互协调，保持并发展各自民族文化特性，但不妨碍其忠诚于俄罗斯精神”。这些行为，实际上影

---

<sup>①</sup> Yitzhak Brudny, Jonathan Frankel and Steani Hoffman (ed.),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Rus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60-162.

<sup>②</sup> См. Вячесла Лихачёв. *Нац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 Панорма, 2002.

响到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是为了避免国家瓦解，联邦中央被迫同意所有边疆区/州以联邦主体身份签订联邦条约。然而，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这一“政策构想”仅仅是暂时结束了各族裔第一波要求获得主权而分离联邦主体的运动，给族裔主体性的进一步要求提供了依据，如1998年政府危机期间，卡尔梅克、鞑靼斯坦等共和国又提出了类似独立于俄罗斯联邦的要求，尤其是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车臣—高加索独立运动，皆属于此。可是，面对民族主义的复杂后果及其所引发的争论，俄联邦科学院教授索洛维伊夫妇《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一辩：没有民族主义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国家和民族》(2006)却声言：“直接证实或暗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整个历史中具有反动（保守）、反民主和反现代化的特点，充当了反动的政权党的政治手段、成为保存保守的帝国秩序的工具。对于国际社会和谐与当代俄国的稳定而言，俄罗斯民族主义被看作为是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潜在或现实的主要威胁。类似观点在俄国本土学术和社会政治话语中绝对地占据着主流地位”，“但是我们确信，站在否定性立场上推断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政治上也是极其危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族裔性不需要恢复历史名誉，生活本身就为其恢复了其荣誉。在知识分子遭受大规模且带有戏剧性地毁灭的社会进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族裔认同则恢复了其公民权”，“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帝国利益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寻求和谐、消除矛盾、互利。在苏维埃之前和苏联时代，帝国政治的内部发展之主要矛盾和根源，并不在帝国和民族国家边缘之间的冲突，而是帝国权力和俄罗斯民众之间的矛盾”，“俄罗斯人的帝国负担，不是以某种政治或文化特权和特惠补偿其劳动大众”<sup>①</sup>。如此表述，在肯定民族主义的同时，实际上掩盖了俄国幅员辽阔和多族裔居民之构成，是帝国扩张之结果的事实，阻止人们去反思帝国，如那位米格拉尼扬认为，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办法，不是抑制、消解帝国诉求，而是需要有相应的超级大国地位、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保证不受外来侵犯和内部分裂<sup>②</sup>。

之所以出现这种论述和社会进程相互矛盾的情形，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传统在当代被激活后所产生的生命力。后苏联以建设自由、民主、法制的公民社会为目标，社会进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并从形式上完成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转换，如1993年底通过了俄联邦宪法，1994年4月底通过《社会和睦条约》并生效（主要内容为：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承认1993年宪法是俄国法律制度和国家的基础，

---

① Татьяна Соловей и Валерий Соловей. А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6, № 11.

② См. 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1997, сс.60-62.

放弃以任何形式的暴力解决社会问题和诉求，左派党团被纳入整个政治体系框架之内，成为现行制度内的反对派，从而建立了俄罗斯式的民主政体，保证了政局相对稳定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效，主要是由于：1993—1996年车臣战争发动之际，叶利钦通过主流媒体急切地希望复兴俄罗斯民族主义；1996—1999年叶利钦连任期间，因为健康欠佳、家族和金融寡头趁机介入政治，而他化解这一状况和经济危机的手段之一，就是在媒体上大量讨论俄罗斯思想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使公众从对“民主”失望的氛围中转向渴望国家统一和秩序，以及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上来。这种策略很有成效，使这种看似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保证了总统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新千年到来前夕，叶利钦“传位”给普京——这并不符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宪法程序的举动得到认可，是因为普京执政伊始就推行把俄国建成世界强国的观念。普京在那篇重要文献《千年之交的俄国》中列举了俄联邦不再是全球性大国的各种情形，就任总统后经常会见各类文学家和艺术家，鼓励他们去激励人民复兴俄国民族自豪感，许多政策制定和实施是以把俄国再次建成世界强国为目标。此举吻合了要把俄国重新建成世界帝国的心声——希望重振俄罗斯帝国雄风的呼声此起彼伏，俄罗斯帝国的思想、历史、构成、目前困境、未来远景等，成为知识界199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讨论得极为热烈的话题。政府施政以此为契机，并非仅仅解决人们当下的现实问题，更激发国民对祖国成为强国的期待，如以强硬态度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从与西方合作到在许多事情上对抗北约、欧盟及希望加入其中的独联体国家，2006年11月16日普京宣布2007—2015年俄国政府要拨款1800亿美元用于研制先进武器，以确保俄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尤其是这年底普京宣布2007年为俄语年，并从战略意义上阐明俄语年的意义——有效联系全球近3亿讲俄语的人、强化俄语在全球化时代的地位、凸显与俄语有关的人士对俄国文化的认同感等。帝国诉求，使得民主、人权、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常常让位于社会进程的宏大目标。

如此一来就出现一种奇异情形：195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第一次使用“认同(identity)”这一术语，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独有的概念(最早用来描述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后来演变成对自己身份的定义)，“这个英文词在俄语中没有特别等值的词，只是简单地直接音译идентичность，但被著名作家安德列·彼托夫突出地使用到后苏联俄国上来。他1996年接受访谈时说，‘俄国正在穿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重新获得身份’”，“后苏联文学已经证实，这个概念已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各位俄国作家的个人诉求和民族身份诉求的自然媒介”<sup>①</sup>。这种表述在俄国

---

<sup>①</sup> Rosalind Marsh, *Literature, History & Identity in Post-Soviet Russia, 1991-2006*, pp.9-11.

获得了相当多的回应——“在近年的俄国学术和政治出版物上，有一个词出现得异常频繁。这个词就是认同或身份(идентичность)”，并且这个概念有着俄国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sup>①</sup>。的确，这是一个契合俄国历史且内涵丰富的概念：由于俄罗斯帝国以武力和政治威权推行国家的疆域统一和版图扩张，造成在俄国作为被民众广泛认同的“国家地位”(nationhood)概念，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state)、“帝国”(empire)概念没有区分开来，从而使“俄国”充满着意识形态定义和自发认同之争（对国家的理解和认知存在着政府和民间、知识分子和民众、上层与草根、俄罗斯族裔和非俄罗斯族裔等区别），这就特别需要“认同”这个能超越这些分歧的概念<sup>②</sup>。而从“莫斯科—第三罗马”概念以降，经斯拉夫共同体—泛斯拉夫主义，到共产国际和东方阵营，俄国人一直在神化俄罗斯帝国，“而把‘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种说法是对民族主义的神化。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甚至造成文化传统的失调”<sup>③</sup>。苏联解体意味着这种民族主义神话的破产，这种灾变在俄国历史不止一次地发生。相应的，俄国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都积极探索俄罗斯帝国认同问题，按批评家伊凡诺娃《寻求新认同的后苏联文学》(1997)所言，“认同危机在我们文化中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很滑稽的形式，有时候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后苏联文化认同危机最突出的表达者是采列杰里(урабом Церетели)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所写的小说《铁钎》(шампур)——倡导强国意识<sup>④</sup>。于是，俄联邦是重建帝国还是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为问题：帝国解体是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潮流，南斯拉夫作为国力并不强大的帝国，其分解过程充满着旷日持久的血腥和暴力，而 1991 年 12 月底的别洛韦日协议，避免了世界上最大帝国分解过程的大规模流血和其他战争灾难，况且 1991 年的八一九事件已表明，苏联无力掌控军队、安全、货币、税收、司法、经济等内政的所有重要方面，也难以面对外交和国际事务，苏联不能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命运已经由其自身决定了，也就是说，这个领土毗连的帝国解体带来了十年之久的阵痛，并非别洛韦日协议所致，而是苏联帝国自身的必然代价。但历史教训未必能使俄国人放弃帝国梦想，这正是托尔兹的《俄国》(2001)所说的，后苏联俄国重建要涉及到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民族国家观念的认同，如统一的身份(union identity)——俄国人自视为帝国居民或是创造超越民族国家的弥赛亚的居民，作为经

① Вл. Малахов. Понаехали тут: очерки 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расизме и культурном плюрализме. М.НЛО, 2007, С.7.

②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 Empire 1552-191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48-48.

④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Посл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Знамя,1996, №4.

由公共根源和文化而联合起来的东斯拉夫民族，作为讲俄语的共同体而不管具体的族裔起源，俄罗斯人在人种上的界定由血缘纽带衍生出公共认同的基础<sup>①</sup>。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后苏联俄国社会重建过程中虽然彼此对立冲突的现象很多，但本质上是围绕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来的：1996年俄国民众票选俄国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人物时，把54.3%的票投给了彼得大帝，而叶利钦和普京都是彼得大帝的赞赏者和模仿者<sup>②</sup>；普京在2000年5月把俄国划分为七大行政区，每个区派驻总统代表，此举是受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治国经验的启示；2000年有人试图以格林卡的《为沙皇而活着》为国歌而引起纷争，如巴维尔克·鲁萨诺夫就认为恢复帝国要考虑到民主价值的传达，但国家杜马于2000年12月8日以381票赞成、51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关于国歌、国旗和国徽的法律草案，决定恢复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1938年谱写的《苏联共产党之歌》、后来定为苏联国歌的《牢不可破的联盟》重新作为国歌旋律，歌词则由原作者、时年87岁的苏联著名诗人、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修改，终止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选定使用了近10年的由米哈伊尔·格林卡谱曲（没有歌词）的国歌《爱国者之歌》，12月20日普京签署国歌法令。普京偏爱俄罗斯民族主义，不再漠视历史上的许多伟大成功，尤其是军事胜利、文化和科学上的成就，如用11月4日的莫斯科解放日（1611年从波兰控制下解放出来）替代苏联十月革命节（11月7日），2005年还恢复了帝俄时代的克里姆林宫门卫的守卫模式。丰富国家的仪式和复活被遗忘的俄国历史传统，目的在于恢复被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相应的，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之所以成为近十年来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用俄罗斯帝国理念研究古罗斯文学的成果，意外地和后苏联帝国意识的扩展相吻合。1995年俄国作协和《俄国新书》杂志等联合设立爱德华·沃洛金帝国文化奖（Импе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мени Эдуарда Володина），每年都有民族主义者和倡导俄罗斯弥赛亚的宗教人士获奖。2005年莫斯科神学院教授M.杜纳耶夫和国家杜马议员H.娜洛钦妮茨卡雅等创办《帝国复兴》（Импер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杂志，很受欢迎。普京连任以后，热衷于正面讨论官方倡导的俄国新理念——主权民主和可控民主等帝国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赢得了很多声望。

在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实践和市场经济等幻灭之后，在不断发掘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俄罗斯帝国”理念，自动地成为超越左翼或右翼的最流行理念，俄国各党派、各阶层、各职业人士很少有否定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

<sup>①</sup> Vera Tolz,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1, pp238-251.

<sup>②</sup>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12 (8 Апрель 1996); Lindsey Hughes, *Peter the Grea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论述后苏联对彼得大帝的看法。



夫《强国》(1995)强调,历经战火和灾难而劫后余生的俄罗斯帝国理念,必须得到保存和保护。俄罗斯国立设计技术学院社会学教授卡夫洛夫(С.Гавров)《为帝国的现代化》(2004)声称,“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主要努力不是为了进入西方现代性文明谱系,而是为了保持、重建、强化帝国的意义”<sup>①</sup>。而且,自《俄罗斯帝国:词典和指南》(1992)问世以降,知识界开始致力于在知识和理论上恢复和丰富俄罗斯帝国概念的意义,其中2002年6月24日国立人文大学举行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与话语实践”学术研讨会,几乎少有对其批评之声。由此,索洛维伊夫妇《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一辩:没有民族主义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国家和民族》(2006)声言:“以通常眼光看,民族国家话语对俄国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在增加,21世纪初以来所召唤的,不是强化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潮流,而是作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资本主义转型及其在族裔河道里的转向。这种转型与俄罗斯认同质量的提高相结合,对俄罗斯精神挣脱不适应状态有着重要的救治意义,对探寻新的民族自我确认方式和手段、民族自豪感的新对象亦如此”<sup>②</sup>。更有甚者,索尔仁尼琴《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声称,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运动乃是一部保卫俄国的宏大历史,俄国作为巨大启示录图景的组成部分,可以描绘成俄罗斯民族意识是如何衰落的,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变得明朗了,即俄罗斯民族的未来是否还存在<sup>③</sup>。

在这样的形势下,后苏联文学变化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但文学中的保守倾向和民族主义诉求则一以贯之,其中反思、辨析和赞扬俄罗斯帝国意识的作品最为普遍,并且吻合大大小小的奖项要求。在后苏联以去文学中心论和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著称的别尔格,侨居美国多年,却出版了《糟糕的犹太人》(The Bad еврей, 2010)这样危言耸听的著作。布克奖设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抨击为外国经济干预俄国文化事务,是对俄国尊严的冒犯,不少著名作家反对接受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基金的文学奖。文学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如尤里·波里亚科夫2001年开始主编《文学报》后,该报的民族主义趋向更为显著,哪怕它标榜向各种倾向的作家开放,但不倡导帝国意识的著名畅销书作家如亚历山德拉·马尔尼娜的作品在这张报纸上就很难找到版面。文学的这种变化,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北高加索地区卡尔巴吉诺—巴尔卡尔国立大学教师古尔图耶娃(Т.Б.Гургуева),在讨论北高加索地区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时,把它纳入这个地区民族认同框架下进行考察,其著作《(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北高加索诗歌)大写的“小人物”》(1994)、副博士学位论文《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后现

① С. Н. Гавро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о имя империи,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4, С. 6.

② Татьяна Соловей и Валерий Соловей. А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06, № 11, С.33.

③ A. Solzhenitsyn, *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 century*,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5, P.88~ 107.

代主义：北高加索的俄罗斯文学和俄语诗歌的类型学关系》(1997)等论述了少数族裔诉求是如何表达俄罗斯帝国意识的问题。著名学者加斯帕洛夫(М. Л. Гаспаров)院士研究后苏联诗歌问题，认为它仍然是对生活的表达，后苏联诗人关心的是俄国文化、俄国人的命运<sup>①</sup>。国立彼尔姆大学教授阿巴舍娃《探求人的形象的文学（20世纪末俄国散文：作家认同之形成）》(2001)，着重描述1990年代以来俄国历史与文化断裂、国家认同出现危机的情势，如何影响了作家民族认同的文化表达、自我身份确认的文学表述<sup>②</sup>。俄国文学研究出现如此之变并非突然的，而是历史的延续。按美国西北大学人文学系主任和国际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瓦奇特(Andrew Wachtel)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维尼茨基(Vinitsky)合作进行的“文学的文化史”研究系列《俄国文学》(2009)之论，整个俄国文学的文化表征就是要寻求民族身份，并由此制作出俄罗斯理念；同样，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卡迪亚(Katya Hokason)认为，普希金的《巴赫契萨拉伊喷泉》和《茨冈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以及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等，分别表达了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意识，即以现代文明去开拓疆域并改造新疆域中的非俄罗斯族裔，如1851年4月，22岁的托尔斯泰和哥哥一道去北高加索征战，就带着文明眼光叙述北高加索地区<sup>③</sup>。尤其是，马尔什的《俄国认同的实质：后苏联文化中的“东方—西方”主题》(2008)声称，19世纪以来西伯利亚地区就显示其在俄国的重要性，随着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这一地区创造了更多的资源价值，也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族裔结构，今天它更体现出帝国认同的意义，成为俄国人讨论东西方问题时必须涉及的对象。<sup>④</sup>这些论述和俄国史学家雅科夫·戈尔金(Яков Гордин, 1935—)《俄国需要高加索：是幻觉还是现实》(《旗》杂志2009年第8期)所强调的相一致，即给俄国带来许多灾难的高加索对俄国的重要性由来已久。可见，俄国民族认同和文学叙述关系密切，成为俄国文学的特色、发展动力和变迁的中介。

如此情形，引起了西方学术界198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帝国研究”的兴趣，大

---

① М. Л. Гаспаров. Русский стих как зеркал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32, 1998.

② М. П. Абаше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поисках лица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вто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ермь: Изд-во Пер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1, с.7.

③ Katya Hoka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 Toronto et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pp.73-106, 170-197. 其实，此前J.布鲁克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国文学：经典的经典化》(1981)已有类似看法，认为《高加索的俘虏》使俄国有了进入历史的新进口，《巴赫契萨拉伊的喷泉》和《茨冈人》乃歌颂俄罗斯帝国的诗篇，《阿尔组鲁姆之行》隐含着普希金希望把非斯拉夫民族俄罗斯化。

④ Rosalind March, "The Nature of Russia's Identity: the Theme of 'Russia and the West' in Post-Soviet Culture", Roger E. Kanet(ed.), *Identities, Nations and Politics after Communism*,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149-172.

量著作直接研究俄国历史即俄罗斯帝国史，并且帝国同俄罗斯民族主义相关联。著名学者汤普逊(Ewa Thopeson)的《1939—1941 年间苏联出版物中的民族主义宣传》(1991)、《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殖民主义体验》(1997)、《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认同：第二思想》(1998)、《帝国的知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等，用知识考古学方法讨论理所当然的“俄罗斯帝国”概念之生成，以及如何成就了俄国文学、苏联、伟大作家等。而巴雷特(Thomas M. Barrett)《在帝国的边缘：捷列克地区的哥萨克和北高加索的边疆》(1999)讨论俄国政府如何利用哥萨克在西伯利亚、下伏尔加河流域、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扩展俄罗斯疆域、保护新版图、整合地方经济、播散俄罗斯文明，以及哥萨克如何在族裔诉求上被弱化等敏感问题。至于桑德尔(Thomas Sanders)的《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地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学专业》(1999)，认真梳理 18 世纪俄罗斯帝国的专制理念之确立过程，和学术制度与学位制度之关系，以及学术进步又是如何修缮帝国理念，诸如 1840—1995 年间俄国历史学科中的国家学派、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和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米留科夫、谢尔盖·普拉东诺夫等的帝国史学观念与方法论、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历史学派等，在成就俄罗斯帝国理念上的巨大作用。此外，列文(Dominic Lieven)《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对手们，1917-1991》(1994)、豪斯金(Geoffrey Hosking)《俄罗斯：人民与帝国，1552- 1917》(1997)、密西根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桑尼(Ronald Suny)《自成一体的帝国：俄罗斯帝国、民族认同和帝国理论》(1998)、楚罗思(C.Chulos)主编《帝国的衰落、民族国家的诞生：俄国的民族认同》(2000)、卡普勒(Andreas Kappeler)《俄罗斯帝国：多族裔历史》(2001)、拉瑞(Marlène Laruelle)主编《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俄国的民族强硬》(2009)等，对俄罗斯帝国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与此同时，西方还在俄罗斯帝国框架之下研究俄国历史和文化的重大问题，如古斯塔夫森(Thane Gustafson)《俄国风格的资本主义》(1999)讨论俄罗斯以帝国方式推行资本主义的问题；怀特(Anne White)《俄国：后共产主义的生存和多种认同》(2004)还原 1990 年代以来俄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帝国认同的关系；彼得森(Nady Peterson)《颠覆性的想象：幻想小说和苏联文学终结，1970—1990 年代》(1997)、克斯格罗夫(Simon Cosgrove)《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联文学的政治学：以 1981—1991 年〈我们的同时代人〉为例》(2004)等，研究俄罗斯文学帝国意识形态之下发展问题，卓有成就。也就是说，在国际斯拉夫学界，对后苏联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关注其政治体制重构、经济变革、外交政策调整，还是俄语、文学、文化等问题，无不特别关注俄罗斯帝国及其民族认同问题。可见，后苏联文学事实状态、后苏联社会各种现象、俄国知识界和欧美斯拉夫研究界的趋向等共同表明：在后苏联重建过程中，俄罗斯帝国作为民族主义诉求和民族认同的核心，超越了俄国的各种政治纷争，文学也被这种潮流所裹挟。这意味

着，关注后苏联文学必须看到俄罗斯民族性中的帝国意识，而且这种要求未必不符合文学研究规律。黑格尔《美学》哪怕以启蒙主义的普遍理性去讨论美学问题，也依然声称：“诗的题材不是科学抽象的一般，而是体现个别具体事物的理性，所以诗始终要受民族特性的制约。诗出自民族，民族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就是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这就导致诗向许多特殊方面分化。东方诗、意大利诗、西班牙诗、英国诗、罗马诗、德国诗等，在精神、情感、世界观、表现方式上各不相同”，“在这些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中，又有某些因素更适宜于诗之表达，如东方意识方式比起西方的(古希腊除外)就较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的、固定的、统一的、有实体性的东西总是起着主导性作用”<sup>①</sup>。因而，面对不再是学习对象的后苏联俄国文学，我们要做的事情最好是，切近作为文学事实创作的俄罗斯文学实际状态，包括后苏联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整体构成、表达方式、文学批评、大众文学、文学的社会效应等一系列具体情形。但是，每种情形都和俄国重建过程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相关：这正是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文化传统延续，它在不同时期或掩盖在东正教信仰之下，或被欧洲文明概念所包裹，或被表述为共产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核心论题乃俄罗斯帝国。后苏联把这个论题明朗化了，无论形式多么复杂，帝国情怀成为大多数作家的共同表达，还影响到读者阅读和批评家的讨论：这是后苏联区别于苏联的重要文化现象。

这就进一步表明，我们无法依据苏联时代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去审视庞大的文学事实。这种方法有意识掩盖了上述全部重要问题：文学、文学批评、哲学、史学等在俄国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经由苏联的表述，最重要的问题成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或冲突。实际上，“阶级冲突”在苏联被简单地表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之矛盾，它就掩盖了东正教所认定的贫民和富人的道德冲突，尤其是还掩饰了在俄罗斯帝国形成和扩张过程中被强行纳入帝国版图的少数族裔和俄罗斯族裔之间的矛盾，俄国要成为强大帝国所导致的个人存在和帝国诉求之间的冲突，俄国以学习或反对西方的方式来实现强盛帝国所带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等。这些矛盾掩藏在文学叙述中，在1990年代以来的后苏联文学中亦然：经由市场化中介，文学不再是直接诉诸意识形态，而是以审美方式表达俄罗斯帝国情怀。由此，依据苏联官方研究文学方法判断后苏联文学发展，只关心社会政治进程对文学的意义，是触及不到文学事实及其本质的；况且后苏联俄国进入了民主时代，解除了新闻审查制度，文学能自由生产，其他学科能合法表达自己的社会使命，我们若局限于对其进行纯粹的文学叙述学研究，显然也会回避许多重大的文学事实。

---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27页。

另外，普遍的市场化、个人参与政治程度的降低，这些也不是决定着后苏联时代文学发展的全部因素。后苏联文学现象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复杂多样。作为文学事实，在规模上并不比过去小，但文学的作用却降低了很多。诚如伊凡诺娃所说，“俄国文学在以前就是‘我们的全部’——是教师的讲坛，是神圣的语言，是预言，是哲学，是政治学，是社会学——文学现在挣脱了这些功能，因为这些学科在事实上各自合法化了。俄国文学只是成了文学。这是多了还是少了？”<sup>①</sup>。的确，后苏联不再有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引起洛阳纸贵的景观，也不再出现某种流派能统辖大部分读者的现象，更没有所谓统一的文学思潮、流派。进而，依据文学思潮的变迁，编年史般地描述后苏联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难触及整体的文学事实的，最多只能是偶尔触摸到但难以诠释清楚一些文学现象，这就是达维多夫(Юрий Давыдов)2000年在俄国当代语言艺术科学院为颁发首届格里高利耶夫奖而举行的文学研讨会上所说的，这是一个犹大时代，“我认为，现在不应该确定作家的文学地位”(《旗》杂志2000年第1期)。如此一来，名目繁多的文学奖因其体现了民族认同的不同方面，反而成为深刻影响文学进程的重要因素；与文学奖相对应的众多的文学组织，包括俄国的作家协会、俄国作家的协会、作协国际联合体、莫斯科作协、彼得堡作协、当代俄罗斯语言艺术科学院、俄国语言艺术科学院等，在各自的范围内很活跃，它们作为文学事实，却没有通过文学产品去影响俄国社会重构，作用有限。至于不同团体的作家，虽然还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倾向之分，但他们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淹没在对后苏联重建的帝国诉求中，作家本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和认同俄国的方式，对后苏联俄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可能比其政治主张更为重要。诸如此类的情形预示着，对后苏联文学进行单方面的社会学研究，同样是难以奏效的，把它作为俄罗斯帝国情怀在审美领域之延伸，进行综合性研究，那就理所当然了。

---

**【Abstract】** The post-Soviet Union observed more 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than that of the Soviet era instead of its demise. However, the existence and vitality of post-Soviet literature can not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an extension of ideology or simply as the result of literary industry. Actually its uniqueness should be seen not only as a part of the social process of the post-Soviet but also as an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at period. This ha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in Russia, which proceeds to distinguish itself with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Russian imperial tradition has not been

---

① Н. Иванов. Интервью// Лепта. № 6, 1991, с.71.

interrupted during the era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ut became open and legitimized, it offered basi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 with its national identity.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Russians' identification in the Russian State aesthetically.

**【Key Words】** Post-Soviet Literature, Methodology, Nationalism, imperial trad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е умерл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а, наоборот, по объёмам появления на свет н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ревзошла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 проявленная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 может пониматься как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идеологии, но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с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результ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неповторимость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часть процесса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его 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традиц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и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ся различия с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А такой признак, создавши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кроется в собственно импер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й и в эпох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прервался, а наоборот получил больше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для раскрытия и был узаконен, что позволило России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основ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стала основ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по признанию гражданам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мпер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

(责任编辑 黄翔)

## 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

——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的行旅和创作为例

刘亚丁\*

**【内容提要】**西方斯拉夫学者对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有所研究，但在我国和俄国，此项研究尚待展开。本文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为例，以作家行旅为切入点，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关联中，勾勒他们作品所反映的俄罗斯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莱蒙托夫早期对宁死不屈的反叛山民的赞扬和后期对俄国征服者的认同形成对比。托尔斯泰在第一时期认同俄罗斯帝国政府征服高加索的战略，第二个时期则在超越俄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对立中领悟了高加索山民视死如归的种族性特征和人性等问题。他们态度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原因。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写作，与他们服军役有直接关系，虽然未必能提供高加索战争的编年史，却揭示了高加索各民族真实的心理结构，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19世纪高加索战争 莱蒙托夫 列·托尔斯泰 传记 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30-(17)

### 一、导 言

19世纪后半叶，沙皇俄国以战争手段完成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对高加索的扩张。但时至今日，高加索依然是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俄罗斯联邦的山地后院及邻国并

\* 刘亚丁，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SKG201004）。

不平静。今天对 19 世纪俄罗斯作家围绕高加索战争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作学术考察，不但是俄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开拓，而且对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研究亦不无裨益。

学术总是受到权力或隐或显的左右。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作品在俄罗斯国内的文学研究中并不受重视，往往只有在具体的作家选本的序言中，<sup>①</sup>或在作家的传记中约略涉及到高加索战争。但西方的斯拉夫学者却不乏建树，如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埃娃·汤普森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再如苏珊·莱顿的《俄罗斯文学与帝国：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征服高加索》，该书讨论了普希金笔下的山民形象、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对山民的叙述、莱蒙托夫早期高加索作品的东方男子汉气概和《伊斯梅尔—贝》、《当代英雄》以及《瓦列里克》等作品、列·托尔斯泰的有关作品，还有关于高加索写作中的女性化问题等等。该书趣味细腻，理论资源丰富，仅举一语——“在年轻的莱蒙托夫于 18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所写的 6 部高加索作品中充斥着里比多和野性”——即可见一斑。<sup>②</sup> 卡佳·霍瑞森著有《俄罗斯边境书写》一书，其中分析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巴赫奇萨拉伊喷泉》和《阿尔祖旅行记》等作品，另外还分析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的《阿玛拉特老爷》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人民形象，分析托氏的《哥萨克》等等。她详尽分析了《阿玛拉特老爷》中的维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当代英雄》中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上尉，把他们当成了联结山民和俄国军人的中心人物。<sup>③</sup> 这三本书都具有不俗的学术见解，但或许由于过于繁复的任务，或许因为疏于关注作家传记的细节，问题反而有可能被遮蔽：这些俄国作家针对俄国的拓疆政策、对山民的残酷镇压，他们表明了什么立场，对反抗俄罗斯帝国入侵的山民，他们又持何种态度？更何况，在我国，对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作品的研究尚未展开。正是基于这样的遗憾，本文试图以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为例，以作家行旅为切入点，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关联中，勾勒他们作品所反映的俄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同时还着意追踪同一作家在不同创作阶段这种态度的演化。

狭义的 19 世纪高加索战争，是指从 1817 年开始在车臣、达吉斯坦山地和西北高加索展开的俄国军队同反叛山民之间的战争，以 1864 年俄国军队控制阿布哈兹和占领切尔克斯人的最后据点克巴达为终点。<sup>④</sup> 广义的高加索战争则可提前到 18 世纪

① Д. Жуко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сборнику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Л. Толстого».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3, сс.3-32.

②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4.

③ Katya Horan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vers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pp.171-197.

④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3, т.11, сс.119-121.



初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征服高加索的战争。这就是 19 世纪俄罗斯作家高加索写作的大背景。

## 二、莱蒙托夫与高加索战争

学术界对莱蒙托夫高加索题材作品的认识是非常不足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就以汤普森为例，她认为：“他（指普希金——引者注）和莱蒙托夫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作为的正当性，虽然他们偶尔把俄国的代言人分成有尊严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苏霍鲁科夫，布尔卓夫——都是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人物——原文如此，引者注）和没有尊严的（皮巧林）。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访问过的地方，作为穿着俄国哥萨克制服的文明的一部分，将会兴旺发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俄国文本记忆制造了俄国是这一地区严厉而正义的治理英才的形象。”<sup>①</sup>尽管笔者非常欣赏汤普逊的许多论断，但在这里不得不指出，她的上述论断是不正确的：在莱氏创作的前期，他不但不是俄国的代言人，反而是反叛的山民的歌颂者。

可将莱氏的高加索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1828 年开始，直到莱氏 1834 年从近卫军官佐学校毕业为止。第二阶段从 1835 年开始直到 1841 年决斗身亡为止。在第一个阶段，他对敢于反抗俄国军队征讨的车臣、切尔克斯山民赞美有加，对俄国军人在高加索的暴行有所贬斥。第二个阶段则对征服者——俄国军人大唱赞歌。

1820 年和 1825 年，当时年仅 6 岁和 10 岁的莱氏两度跟随外祖母到高加索度假，到了高加索矿泉城和戈利亚切沃茨克。<sup>②</sup>莱氏这些童年的印象，加上后来他自己的阅读，到 1828 年激发了少年诗人的创作灵感。是年他创作了两部以高加索为背景的长诗，一部是《切尔克斯人》，另一部是《高加索俘虏》。

在《切尔克斯人》中，莱氏讲述了捷列克河畔的一场激战。在捷列克河谷里切尔克斯人听说自己的王公被俄国军人俘虏，怒不可遏，摩拳擦掌，发誓要拼死救出他。要塞里俄国军人正盛装阅兵。突然惊慌失措的俄国哨兵飞马来报，切尔克斯人在山下造反了。俄国长官立即命令团队投入战斗。两军开始了一场恶战，最后切尔克斯人惨败，土司也坠马身亡。在该叙事诗中，隐含作者的聚焦点是移动的，时而聚焦切尔克斯人，时而聚焦俄国军队，但其情感距切尔克斯人更近：

---

① [美]埃娃·汤普森《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8 页、第 71 页。

②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нва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Лермонтова// М. Лермон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90, т.2, с. 649.

一位切尔克斯人身披甲子锁，  
那装束从头到脚银光闪闪。  
自由农民围坐在他周围，  
还有些人径直躺在如茵草毯。  
一些人把刺刀磨得更锋利，  
另一些人正练习射出利箭。  
突然土司站起来讲话，  
周围是如此静谧，如此无言。  
“切尔克斯人，我能征善战的人民，  
你们每时每刻都准备出战。  
要决一死战，光荣地牺牲没有谁比你们更加勇敢。  
请抬头望把要塞瞧一瞧，  
我弟兄戴着脚镣受牢狱熬煎。  
他既孤独，又焦虑、悲伤，  
要么救他出狱，要么我殒命黄泉。  
……此刻我向穆罕默德起誓，  
向全世界发出庄严誓言！  
现在到了决定生死的关头，  
要么让俄国人送死，遭难，  
要么就是我自己把明亮的、  
初升的太阳看上最后一眼”  
土司言罢，寂然肃立，  
自由农民重复了三番：  
“要么我们击毙俄国人，要么我们自己头断。”<sup>①</sup>

悲壮之情，表现得十分感人。

1830年莱氏写了抒情诗《致高加索》来歌颂反抗的山民：

高加索，你这遥远的地方！  
你这纯朴的自由的故乡！  
你也充满了种种的不幸，  
你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  
难道在这弥漫的云雾下

---

<sup>①</sup> М. Лермо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М.и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т.2, сс.9-10.

你的千岩万壑重叠嶂  
也都听到了苦难的呼唤，  
光荣、黄金与锁链的声响？……  
不！切尔克斯人，别再期望  
过往的年代重回到祖国：从前自由所喜爱的国土  
眼看着为了自由而沦亡。<sup>①</sup>

1830年先后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爆发了反俄国的起义，但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莱氏此诗就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sup>②</sup>

1832年莱氏早期的另一部长诗《伊斯梅尔一贝》则更明显地表达了倾向性。长诗表现了切尔克斯人抗击俄国军人入侵中的悲剧性一幕，切尔克斯人的首领罗斯兰贝克，在同俄国哥萨克的战争中颇受切尔克斯人拥戴。后来他的胞弟——被父亲送到俄国去学习军事的伊斯梅尔回来了，切尔克斯人转而拥戴他。罗斯兰贝克趁同俄军恶战之机，害死了伊斯梅尔。在这部长诗中有这样一些诗句：

怎样的草原，怎样的山峰和海洋  
能够抵抗住斯拉夫人的武器？  
俄罗斯的沙皇在何处压服不了  
对他政令的敌视和反叛背离？  
你归顺吧，契（切）尔克斯人！东方和西方的  
命运，也许都将和你的命运无异。

那时刻即将到来——你将会骄傲地说：尽管我是奴隶，却是宇宙之王的奴隶！”<sup>③</sup>

这是对不屈服的切尔克斯人的颂扬。

村庄在燃烧；它们失去了保护者，  
祖国的子孙遭受敌人的攻击……

一个战胜者像一只凶残的野兽，端着刺刀冲进一个被征服的家里，他杀死了屋中的老人和孩子们，

又用他那双血淋淋的手把那  
年轻的母亲和清白的闺女调戏，  
但山民的妻子并不是那样可欺！

强吻之后随着来的是一阵刀声，俄罗斯人退了，叫了一声，便倒下去！“为

① 《莱蒙托夫诗选》，余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7页。

② М.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 с.628.

③ 《莱蒙托夫诗选》，第395页。

我复仇呀，伙伴们！”于是转瞬间

简陋的小屋在他们眼前着火了

契（切）尔克斯人自由的篝火在熊熊燃起！<sup>①</sup>

这是对俄军行径和山民反抗的描写。19世纪的莱氏研究家П.维斯科瓦蒂伊指出：莱氏“同情山民持续而顽强地进行的捍卫自己峡谷的斗争。而且他不止一次表达这种同情。”<sup>②</sup>

即使是在苏联学者的文学史中，对这些作品的反侵略性也有客观的概括：“在莱蒙托夫的早期的另一个系列，即高加索长诗《卡累》（1830—1831）、《伊斯梅尔一贝》（1832）、《巴斯童村》（1832—1833）和《反叛的山民》（1833）中，主人公的社会积极性得到了加强。这种社会积极性在《伊斯梅尔一贝》中开始获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sup>③</sup>

第二个时期，莱氏的倾向发生了大转弯，他的作品对高加索的书写呈现出有趣趋势：早期热情讴歌高加索山民反抗俄国侵略者的长诗，被肯定性地表现俄国入侵高加索的作品所代替。

1837年莱氏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高加索之行。1837年由于写了纪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莱氏被流放高加索从军。3月19日莱氏从彼得堡出发，踏上了去高加索的路途。5月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克。6月到了驻扎在阿拉普的尼日戈罗德龙骑兵团，9月他到了塔曼。<sup>④</sup>莱氏行迹的研究者为我们勾画了他1837年的高加索之行：“就这样莱蒙托夫第一次走上了格鲁吉亚战道。当时高加索是俄罗斯帝国的偏远边疆区。不间断的战争在进行着。诗人不时停下车来，为这些地方画速写，以便日后好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展示给朋友们看。到了第比利斯后，莱氏得知，在阿塞拜疆和库班省爆发了沙米尔支持者的起义，为了平息暴动，调去了莱氏服役的下诺夫戈罗德龙骑兵团的若干骑兵连。”<sup>⑤</sup>同年莱氏接到了改流放到驻扎在诺夫戈罗德的骠骑兵团服役的命令，于是他又走上了返回俄国的路程，“从第比利斯出发，沿格鲁吉亚军道行进已经是12月了，这时节十字架山上总是飞舞着鹅毛大雪……莱蒙托夫向北行进。又到了库拉河与阿拉格瓦河汇合的姆茨赫塔（位于格鲁吉亚——引者注）。又到了卡伊沙乌尔峡谷，经过阴郁的古德山和十字架山。又到了雄伟的卡兹别克山。前面就是弗

---

① 《莱蒙托夫诗选》，第396页。

②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Рихтел, 1891, с.163.

③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А. Благой, М. и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т. II, с.550.

④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нва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Лермон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2, с.660-661.

⑤ И. Андроников. Маршрутами Лермонтова// О.Миллер. По Лермонтовским местам, М.: Профиздат, 1989, с.8.

拉季卡夫卡兹（位于俄罗斯——引者注）和俄国了。”<sup>①</sup>莱氏在《当代英雄》中则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他自己的旅行，同时表达了对俄国武力征服高加索的正面肯定。

《当代英雄》中的人物有自己的地理跨度：1、小说的第一叙述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从格鲁吉亚向俄国内地进发；2、主人公皮巧林从内地经过格鲁吉亚到波斯，这是反向的行程。先看小说的第一叙述者，用纳博科夫的概括就是：“好奇的旅行者描写了自己沿格鲁吉亚军道在高加索的旅行。”<sup>②</sup>小说的第一叙述者遇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时候，后者对他说：“早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时代，我已经是当兵了，他来防线视察时，我已经是陆军少尉了。”<sup>③</sup>这个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就是叶尔莫洛夫。<sup>④</sup>实际上旅行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重复了莱氏在 1837 年冬天的那次从格鲁吉亚向弗拉季卡夫卡兹行进的旅程。这个旅行者对他们经过的十字架山大发议论：“‘瞧，那就是十字架山！’……关于这个十字架还有一个相当奇怪但又十分流行的传说呢：说它乃是彼得大帝当年路过高加索时亲自竖立起来的；然而这一说法不足为信：一则彼得一世当年仅仅到过达吉斯坦，二则这十字架上用巨大的字母题名：它是根据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命令而竖立的，至于它的竣工日期，也有清楚的记载，分明是一八二四年。”<sup>⑤</sup>这里就将叶尔莫洛夫的拓疆之功凸显了出来，以战争的手段将不服从俄国统治的各族山民消灭或驱逐，然后立上十字架，表明这是东正教的俄国征服了穆斯林山民，此地已属俄国所有。莱氏本人不但在小说中描写这座十字架山，还以油画描绘了它。<sup>⑥</sup>在《当代英雄》中莱顿看到了文化冲突的意义：“尽管莱蒙托夫对俄罗斯是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第三地带的新观点略有所顾，但《当代英雄》并没有变成消极的综合体。与此相反，皮巧林在车臣突然发生了残酷的冲突（在《梅丽公爵小姐》中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的俄罗斯社会也同样如此）。在小说开端中皮巧林设计诱拐切尔克斯姑娘贝拉，给山民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带来了灾难。”<sup>⑦</sup>

1841 年莱氏写成随笔《高加索人》：“高加索人，是那种半俄罗斯、半高加索的

① Там же, с.8-9.

② В. Набоков.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Герою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Его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 с.425.

③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周启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年，第 9 页，译文有所修改，所据俄文本是 М. Лермо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90, т.2, с.458.

④ А. П. 叶尔莫洛夫（1877-1861），此人在 1816-1827 年担任高加索军司令和格鲁吉亚总司令，主导高加索战争。参见：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0, с.434.

⑤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 43-44 页。Katya Horanson 的上述著作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参见：Katya Horan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 pp.191-192.

⑥ О. Миллер.По Лермоновским местам,М.,Профиздат,1989,с.228-229.

⑦ Katya Horanson., *Wrting at Russia's borders*. pp.214-215.

生物。真正的高加索人是非常优异的，当得起任何敬佩，在十八岁之前他在士官学校里受教育，从那里出息成优秀的军官；他在课堂上偷偷读《高加索俘虏》，由此燃起了对高加索的热情。”在描写其服饰时，有这样的句子：“他对军大衣抱着先天的反感，却对披风情有独钟；披风就是他的托加，他总是披着它，哪怕雨水灌进衣领，哪怕冷风吹得他寒颤——在所不惜！那因普希金、马尔林斯基和叶尔莫洛夫的肖像而风靡一时的披风从来不离身。”<sup>①</sup>莱氏的倾向的转折是明显的：由早期赞扬高加索山民反抗俄国军队的征服，转而赞美征服者，即所谓的“高加索人”及其将领叶尔莫洛夫等人。

莱氏本人在1840年7月参加了一次讨伐反叛的车臣人的战斗，并以叙事诗的形式描写了它。是年7月11日，莱氏所在的部队由加拉耶夫中将率领，在捷列河的支流瓦列里克河岸对反叛的车臣人发起进攻。莱氏本人则充当了观察员和传令员。加拉耶夫中将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夸奖了他：“进攻瓦列里克之敌人鹿砦之役，坚金步兵团之莱蒙托夫受命观察前锋之行动，并将其进展报告团队司令，且置来自于隐藏于树丛之敌之威慑于不顾。此军官不惧任何危险，以超常之勇猛镇静出色地完成嘱托，且与勇敢之先锋并肩突袭入敌军之鹿砦。”因瓦列里克之战，莱氏获得了一枚圣弗拉季米尔勋章，这对年轻的军官来说是很高的殊荣。<sup>②</sup>莱氏同年写成的叙事诗《瓦列里克》则直接表现了诗人参加的这次征讨。在诗中，莱氏尽管对为争夺一地而伤亡如此之多的人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但他以俄国军人的视角描写了战斗：

在叶尔莫洛夫时代，开进了  
车奇尼亚（即车臣——引者注）、阿瓦里亚，开进了山里；  
在那里激战，我们打败他们……  
将军率领随从跃马在前……  
哥萨克犹如蜜蜂，  
呐喊着铺天盖地。<sup>③</sup>

在手稿中有这样的诗句：

狡猾的敌人时隐时现，  
我们重又拥挤向前。<sup>④</sup>

这是莱氏自己亲自参加的一次战斗的真实再现。莱顿对《瓦列里克》的解读是

---

① М. Лермог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Правда, 1990, т.2, сс.590-592.

②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с.349-350.还可参见 К.Мамацев.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В сборнике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сс.264-265.

③ 《莱蒙托夫诗选》，第266、267页。

④ М. Лермон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т.2, с.697.

有深度的：“《瓦列里克》传达了由杀人引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剧烈的疏离感：莱蒙托夫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抒情诗人把战争视为杀人，而不是对男子汉气的鼓励。”<sup>①</sup>但是，莱氏在这首诗作中的立场问题，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在同一时期莱氏还有短诗《遗言》，其中写道：

请你告诉他们，我挂了彩，  
子弹把我的胸口打穿了，  
我已忠诚地为沙皇死去。<sup>②</sup>

同早期的高加索作品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莱氏立场的转折：他为身为征讨高加索山民的俄国军人而自豪。

莱氏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原因值得探究。在第一个时期，童年、少年时莱氏即爱上了高加索。他深受其时俄国流行的浪漫主义时尚的影响，崇尚自由反叛精神，高加索山民正好契合了这种精神取向。此外他还把高加索当成了夏多布利昂笔下的南美丛林，因而玩味着其中的异国情调。其叙事诗不但欣赏高加索雄峻的自然之美，而且对反抗俄军的山民也击节赞叹。莱氏在第二个时期对俄罗斯帝国的拓疆政策的肯定也要从他本人的经历中去寻找原因。1832年莱氏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考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近卫军官佐学校，这导致了她的转折。建立这所近卫军官佐学校的目的，据其创办者尼古拉大公说，是为了让那些有良好家庭教养、受过高等教育、但又不能很好地执行纪律的青年尽快完成军事教育。<sup>③</sup>在这所学校里，莱氏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一方面莱氏感到压抑和烦闷。他不断地向外祖母抱怨军校生活的严格管制、枯燥乏味，盼望能早日毕业当上正式的军官。另一方面又热心与同学交友，积极参与学员的各种活动，如为校学生报写诗。在这里他完成了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职业军人的转换。<sup>④</sup>1838年同学M.采伊德列夫要去高加索的部队，在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莱氏即兴赋诗：

金发的俄罗斯德国佬，  
即将开拔到遥远的国度，  
重新挑起战争的，  
是那些胡须茂盛的异教徒。

---

①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 p.225.

② 《莱蒙托夫诗选》，第275页。

③ П. 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167.

④ См. А. Мерински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в юнкерской школе, и е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Лермонтове// М. Лермонт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сс.130-173; П.Вистоватый. М.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с.167-191.

战争的狂欢盛宴上，  
他要出发，我们短叹长嘘；  
充满那少年胸臆的，  
是激烈的、钢铁般的愁绪。<sup>①</sup>

这里莱氏的情感转换了：他先前所称赞的反叛山民，在这里变成了“挑起战争”的“异教徒”。当然莱氏的转折不是直线型的，他在近卫军官佐学校期间所写的《巴斯童村》等作品中还是流露了对山民的同情。

### 三、列·托尔斯泰与高加索战争

如果将托氏有关高加索的书写分为两个时期的话，托氏在第一时期（止于 50 年代中期）与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拓疆立场是比较吻合的，尽管他对俄国将军纵容杀戮抢掠等略有反思。第二个时期（开始于 90 年代）则在超越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两造对立中反思了人性等问题。

1851 年春，列夫·托尔斯泰离开了在图拉南边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随着在高加索任军官的兄长尼古拉来到高加索。列·托尔斯泰后来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炮兵部队。1851 年 6 月 22 日他第一参加了对山民的讨伐。7 月 3 日托氏在日记中写道：“参加了袭击。行动同样不妙：行动是没有意识的，巴良金斯基胆小怕事。”<sup>②</sup>1852 年 5 月，托氏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开始创作以此事迹为基础的短篇小说《袭击》，同年 12 月完成。<sup>③</sup>小说以一个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志愿兵为叙述者，讲述沙皇的军队夜间突袭一个不屈服的山民的村子的经过。经过一昼夜的行军，黎明时俄军发起进攻，占领了山民已经撤离的村子。俄军抢掠财物，焚烧房屋。俄军撤离时，山民开始偷袭，一个年轻的军官负伤，很快就殒命。在这篇小说里托氏道出了来高加索参加征讨山民行动的各类俄罗斯军官的动机。叙述者问赫洛波夫大尉：“您来这里服务是为了什么啊？”“一个人总得服务啊，”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何况对于我们穷人来说，双薪也很有点用处。”<sup>④</sup>普通军人参加征讨高加索山民的目的表达得十分坦率。还有的军官到高加索是为了追求荣誉。值得思考的是，正是这些军人的合力，完成了俄国在高加索的拓疆。在这篇规模不大的作品中还引入了 19 世纪前半叶高加索战事的各

---

① М. Лермонтов. Поэзи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Проза//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а, М.: Слово 2008, с.3.

②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http://perfilovu.narod.ru/nepozn/litera.html>

③ См. Е.Майми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М.: Наука, 1978, с.37; Л. Гусев.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1828-1855 г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 сс.297—298.

④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 年，第 5 页。



方风云人物。在小说中写到了指挥这次征讨行动的将军的言行。托氏研究者德·茹科夫指出：小说中的“将军”“即是巴良金斯基……他是公爵，少将。20岁时违背父母的意愿到了‘性格培养学校’高加索从军。1835年负重伤，险遭山民俘获。1845年以上校军阶重返高加索，参加了达尔金征讨。1851年起担任高加索军左翼司令。1853年巴良金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军参谋长，但他不能忍受第比利斯的生活，返回了彼得堡。1856年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1859年，在他的指挥下，俄国军队对古尼勃村发起进攻，在此役中沙米尔及数百随从被俘。”<sup>①</sup>高加索战争中抵抗俄国军队的最重要的人物沙米尔也是小说中没有出场的人物。首先是俄国军队出征时歌手们唱到了他：“沙米尔想起来反抗，/在过去的岁月里。”作品中的人物也议论了沙米尔。<sup>②</sup>沙米尔（1791-1871）是车臣和达吉斯坦山民首领，1834年被选为“伊迈”，即首领。他联合车臣、达吉斯坦和切尔克斯的山民反抗在高加索的俄国军队。1859年被巴良金斯基的部下俘虏，1866年宣誓成为俄罗斯臣民，1871年死于离伊斯兰圣城麦加不远的麦地那。<sup>③</sup>这样，托氏的《袭击》就把高加索的征服者和反征服者都带到了前台。

托氏的另一篇作品《伐林》的意义也不同寻常，它将俄军征服高加索战争的战术变化在第一时间披露了出来。1853年托氏在高加索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伐林——一个士官生的故事》，1855年完稿。在小说中，在俄军和山民的炮火对射中，一支俄军士兵砍伐了几俄里范围内的树林。俄军撤退时，受到了山民的追击。这篇小說也是托氏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的描写。1852年1月巴良金斯基开始谋划迫使小车臣河两岸的未归附的山民或者交出武器，迁居到松查河平坦的河岸，或者退进深山。是年1月底，托氏从第比利斯参加士官生考试后返回达罗格拉德科夫斯卡娅镇，他参加了弗列夫斯基少将的分队的砍伐森林的行动。<sup>④</sup>《伐林》就是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再现。

托氏在高加索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哥萨克》。作品以贵族青年奥列宁离开其厌倦的上流社会到高加索寻求幸福开始，结束于他向哥萨克乡间姑娘玛丽雅娜失败的求婚。作品的叙述者写到哥萨克、俄国沙皇与高加索的关系：“在这片土地肥沃的、草木茂盛的林地上，从古以来就住着英俊、勇敢而富裕的俄罗斯人，他们信奉旧教，被称为高地哥萨克。很久以前，他们信奉旧教的祖先从俄罗斯逃出来，定居在捷列河畔高地上的车臣人中间。这高地是林木茂盛的大车臣群山。在哥萨克人中流传着一个传说：伊凡雷帝有一次来到捷列河畔，召见高地上的长老，把左岸

① Л. Толстой.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3, с.396.

②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11页、18页。

③ 参见<http://ru.wikipedia.org/wiki/%D0%A8%D0%B0%D0%BC%D0%B8%D0%BB%D1%8C>及李雅君：《俄罗斯之痛：“车臣问题”探源》，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④ Л. Толстой. 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сс.397-398.

的土地赐给他们，劝谕他们跟俄罗斯人和睦相处，并且答应不强迫他们归顺或改变信仰。”<sup>①</sup>可见托氏已经在给俄国的征服行动提供合法化论证了。在《哥萨克》这部作品中，托氏借助身份为贵族的主人公表达了对俄国征服高加索战略的态度。小说的主人公奥列宁曾经这样遐想：“一会儿，他幻想自己以超群的勇气和惊人的力量杀死和征服无数的山民；一会儿，他把自己想象成山民，跟别的山民一起，反抗俄罗斯人，保卫独立。”<sup>②</sup>1852年5月29日，托氏在日记中写道：“5点钟起床。生活平淡无奇，健康有点小问题，嗓子疼。什么都没有写。忙乎钢琴的事情。整个早上都在幻想着征服高加索。”<sup>③</sup>在《哥萨克》的一种异稿中，奥列宁“编制了‘和平征服高加索’的计划”。<sup>④</sup>对征服山民的行动，托氏在赞同与反对之间游移，在行动上他参与了征服山民的行动，在情感上他又对大量的牺牲者表现出恻隐之心。但“征服”这个词用得很“合适”。这里涉及到宗教的高低之分，以代表文明和进步的基督教，即东正教来征服信奉异教的穆斯林山民。苏联时代的托氏研究者在谈到托氏高加索作品的意义时也承认：“确实，有过俄国的君主的轮番改变的政策，有过对反叛的山民的残酷镇压的企图，有过有战略计划的、有理由的实施与无理由的残酷，有过山民的为自由而斗争与穆斯林领主的充满宗教狂热的残暴……当然，还有过双方的、所有的民族的英雄的功勋和痛苦。”<sup>⑤</sup>通常俄罗斯学界将托氏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写的作品也算作高加索作品，因篇幅所限这里从略。

第二个时期则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托氏对高加索交战双方的评判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了。早在1853年7月，哈吉穆拉特向俄国军队投降的事件已经给托氏留下了印象，他写道：“沙米尔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哈吉穆拉特近日向政府投诚，在车臣全境这可是头号骁将，好生了得，干了不少坏事。”<sup>⑥</sup>1896年托氏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作家数易其稿，直到他仙逝后才于1912年发表于《托尔斯泰遗作》第三卷。<sup>⑦</sup>在《哈吉穆拉特》开篇，“我”走过田野看到一朵牛蒡花，即本地人所称的“鞑靼花”。“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多刺扎手的牛蒡花摘下来，对此，“我”想：“生命的力量和毅力多么惊人，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而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呀。”<sup>⑧</sup>这句话不妨看作是点题之语。主人公哈吉穆拉特是沙米尔手下的第一骁将，

①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244-245页。

② [俄]列·托尔斯泰：《高加索故事》，草婴译，第239页。

③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④ Л. Гусев.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1828-1855 гг., с.303.

⑤ Д. Жуко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с.12.

⑥ Цитата из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В.Шкловского.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с.168.

⑦ Примечание к 《Наджи-Мурату》 //Л.Н.Лолстой.Кавказ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М.,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83,с.404.

⑧ [俄]列·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页。

而且身任州长，突然主动向俄国前线军官投降。他的英俊的外貌与和善的态度博得了俄国下级军官及眷属的好感。俄军第比利斯总司令、高加索总督瓦郎曹夫并不相信哈吉穆拉特会真心投降，他致信陆军大臣柴尔奈舍夫，提出利用哈吉穆拉特与沙米尔的矛盾从中渔利。本来柴尔奈舍夫企图挑拨沙皇与瓦郎曹夫的关系，提出另外的处置哈吉穆拉特的方案，但沙皇同意瓦郎曹夫的方案，并命令加强伐林和对山民的镇压。哈吉穆拉特向瓦郎曹夫提出以俘虏和金钱交换被沙米尔扣押的他的亲属。后来他发现俄军并不信任他，也无意营救他的亲属，便利用骑马兜风的机会，策马脱离俄军的监视，在逃跑中被击毙。在《哈吉穆拉特》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叙述者（姑且当成隐含的托尔斯泰）对哈吉穆拉特的态度。以通常的伦理标准看，对于车臣和达吉斯坦不愿归顺俄国的山民来说，哈吉穆拉特是叛徒；对俄国军人而言，这是个可资利用的变节者。但在叙述者的笔下，他却不卑不亢，脸上总是带着孩童般的微笑，因而赢得了俄军第一线官兵的敬重。而他对被沙米尔扣押的亲属的关爱和焦虑，则折射出丰富的人性光彩。叙述者对这“高价牺牲”的生命掩饰不住赞美之情。相反，俄国军人则残暴无情，杀死哈吉穆拉特后，还把他的首级送到前线到处示众。一个俄国军人的情人玛丽娅·德美特列芙娜斥责道：“战争！说什么战争啊？一句话，全是刽子手。人死了应该埋在土里，而他们戏弄着玩。全是刽子手。”<sup>①</sup>除此而外，学术界还从《哈吉穆拉特》中发现了丰富的内涵。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给了这部小说极高的评价<sup>②</sup>。有西方学者对《哈吉穆拉特》作了更为宏观的意义阐释——将这部小说的写作与 1899—1902 年英国人屠杀布尔人的布尔战争相联系，“由于对帝国结构有了新的反思，托尔斯泰在关注农民和贵族的关系时形成了新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在《哈吉穆拉特》中，作为不公正的社会政治体制中的牺牲者的农民的团结，是与对高加索山民的同情相融合的，俄国人将这些山民当成外国人进行无情的杀戮。”<sup>③</sup>苏联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哈吉穆拉特……是为农民的自由而战的战士。他无路可走。他在沙米尔那里的路，是荣誉，可不是农民，这是另一种暴政。他在尼古拉一世那里的路，是金钱和荣誉，可是俄罗斯人踏碎了农民的田地。沙米尔变成了尼古拉一世这样的暴君，哈吉穆拉特从沙米尔这个暴君跑向尼古拉这个暴君……”<sup>④</sup>什克洛夫斯基也启发了别的苏联学者：“《哈吉穆拉特》的类似于社会国家结构的金字塔的纵切面——在其顶点是尼古拉一世和沙米尔”，“一个高傲的人，独立不羁的人，如果他选择了反抗暴政，他就会走投无路，山上沙米尔的宗教暴政、

① [俄]列·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第 173 页。

② [美]哈·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259-271 页。

③ Susan Layt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 p.263.

④ В. Шкловский. Лев Толстой.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3, с.745.

尼古拉一世的制度暴政同样不能忍受桀骜不驯。”<sup>①</sup>但他们似乎没有更多地留意托氏通过哈吉穆拉特所体现的高加索人宁折不弯的种族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托氏超越俄国军队和反叛山民之间的谁是谁非判断，开始了对人性等问题的更深刻的追问。

托氏高加索题材作品的两个阶段所体现出的作家立场有明显的变化，其前期对沙皇俄国的高加索扩张不无认同感，后期则具有了比简单的赞成与反对更丰厚的内涵。托氏立场演变背后的深层缘由值得追踪。在第一个时期，托氏作品中所表达的立场具有他个人复杂的心理原因。托氏 1847 年 4 月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本拟帮助自己的农民，并通过自修以考上硕士。不料如此的善举和志向尚未有所体现，却开始了一般贵族纨绔子弟的沉沦。他来回于莫斯科和雅斯纳亚·波良纳之间，无所事事，沉溺于赌博中不能自拔。他在 1851 年 1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良心折磨，腰无半文，向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察科夫、科洛什内借钱。”1 月 17 日写道：“从 14 日开始过得很不满意。没有跟斯托雷平去舞会；钱输光了，一个子儿都没有；全都是因为性格软弱。”<sup>②</sup>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在高加索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列夫·托尔斯泰决定跟他到高加索去，这成了他摆脱当时沉沦的良机。到了高加索后，年轻人成功立业的欲望支配着他。他开始谋求成为军人。用文学家、托氏传记作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他想像所有人那样，既然到了高加索，就该满载军人的静静的荣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而归。”<sup>③</sup>1851 年 7 月，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巴良金斯基指挥的高加索军队的左翼部队。1852 年 3 月谋得炮兵士官的身份后，他积极勇敢地参加讨伐反叛山民的大小战斗，有三次获得圣乔治勋章的机会。<sup>④</sup>在高加索期间，托氏为摆脱人生沉沦而从军，具有强烈的建立军功的愿望，他在创作高加索题材作品的时候，倾向于俄国军人一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作为托氏同俄罗斯帝国立场吻合的佐证，不妨再补充一条材料：1855 年 6 月托氏收到《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巴纳耶夫的信，信中说他在《现代人》上的《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被带到了沙皇。对此托氏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把它读给皇上听，这满足了我的自尊心。”<sup>⑤</sup>到了第二个时期，在创作《哈吉穆拉特》的时候，托氏已经不复是当年刚刚从军的托氏了。1856 年 11 月托氏退伍，到 90 年代，他不但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重要

① Д. Жуко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поэзи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т. с.28, с.29.

②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③ В. Шкловский. Лев Толстой. с.165.

④ 参见[英]艾尔默·默德：《托尔斯泰传》（上），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73-74页。

⑤ Дневни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а Куличках) Льв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Толстого (1828-1910)

作品，而且已经走出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精神危机。托氏的文学创作活动实际上是对俄罗斯贵族社会的逐渐扩展的批判过程：首先是在自传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道德认识，或道德批判阶段，然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道德—政治批判阶段，再后是《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经济批判阶段，到 80 年代以后进入了全面批判的阶段。<sup>①</sup>而且 1895 年他写成了激烈指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篇演说文章《毫无意义的幻想》，已经表明了同沙皇政府不合作的态度。<sup>②</sup>因此，托氏在《哈吉穆拉特》中对沙皇及其周围进行批判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

#### 四、余 论

首先，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写作中的倾向性与其职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与他们服军役有直接关系。莱氏早期写高加索，主要是歌颂山民反抗俄国军队的征服行为，后来他进入彼得堡的官佐学校，其创作倾向就发生了演变。托氏写俄国军人在高加索镇压山民，是因为他随兄到高加索当志愿兵。服军役和服文官役是 19 世纪俄罗斯大多数贵族和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在 19 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对于俄罗斯社会的知识阶级而言，服军役和服文官役几乎是强制性的，会有一段取得尉官一类职务所必不可少的时间。对一部分人而言，服役是谋生的主要手段；对另一些人而言，服役仅仅是保障其显赫地位的官职的必备条件；对第三类人而言，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国家服役涵盖了智力活动的大多数领域。”<sup>③</sup>据洛特曼研究，1762 年 2 月 11 日，叶卡捷琳娜政府发布公告，规定服役是强制性的，“服役有机地形成了贵族的荣誉观念，在同爱国主义的联系中形成了伦理风习的价值。”<sup>④</sup>服役不但会改变知识阶层的生存方式，也会对其观念产生冲击。由于服役，知识阶层自然会服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尤其是涉及到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和外交纠纷的时候，更是如此。过去的文学史写作或作家研究，几乎完全没有顾及作家的服役对其写作观念和创作倾向的影响。尼·别尔佳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伊·伯林的《俄罗斯思想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同沙皇政府相敌对的。固然，19 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没有被服役束缚的前提下，往往能够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思考，独立行事。但由于服役的影响，在对外扩张这

① 刘亚丁：“列·托尔斯泰自传性形象系列”，《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 2 期，第 293-298 页。

② 参见倪蕊琴编：“列·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简表”，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525-560 页。

③ Д. Раск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и русск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XIX веке//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0, т.5, с.473.

④ Ю. Лотман. Пушкин.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1997, сс.500-501.

一点上，这些知识分子是与沙皇政府互相呼应的。他们主动、自愿地与国家共谋，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内容。

其次，文学反映人的心理结构问题。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文学所记载的内容也值得重视。通常认为文化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物质层次（人化自然，或对象化的劳动），心物结合的层次（政治制度、科学理论、教育制度），心灵层次（文化心理结构、文学和艺术等）。文化的层次演变的规律是，越深层的演变越慢，最后变化的才是心理。<sup>①</sup>也就是说，人化自然会改变，社会制度也会变更，但人的心理结构却未必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迅即演变，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学则是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刻的记录。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虽然未必能提供高加索战争的编年史，但它们提供了更主要的东西：高加索各民族的心理结构的真实图景。高加索地区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过去的伊斯梅尔一贝、哈吉穆拉特们身上，可以看到今天的高加索的不屈服者的影子。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今天的高加索武装分子身上，依然流着哈吉穆拉特们的血液。正因为如此，在今天，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依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启迪。

---

**【Abstract】** Western Slavic scholars have made some studies on the works on Caucasus subject matter of Russian writers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but such studies need to be expanded in China and Russia. Taking Lermontov and Leo Tolstoy as the example and their traveling as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riters' biographies and their works, draws the outlin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rebellious mountain people reflected in their works and the writ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 Empire's policy of expanding frontier and the rebellious mountain people. Lermontov's praise of the rebellious mountain people, who have character rather die than surrender, in early periods contrasted with his positive expression of Russian conquerors in later periods. Leo Tolstoy almost supported the strategy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standpoint of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period, while in the second period, he reflected on the question of spirit altogether unbending mountain people and humanity. The change of their attitudes has reasons of their own.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Russian writers' works on Caucasus subject matter have an immediate relation to their experience of military service. Russian writers' works on Caucasus subject matter can't necessarily

---

① 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5期，第81页。

provide the “chronicle” of Caucasus War, but they presen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the real picture of mental structure of Caucasus nationalities. Because of this, the 19<sup>th</sup>-century Russian writers’ works on Caucasus subject matter still have meaning of reality.

**【Key Words】** Caucasus War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M.U.Lermontov, Lev Tolstoy, biography works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ой кавказской те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западной славистики было заметно, но на которой пока не обращают внимание 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ак же и 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В настоящая статья излагаются маршруты по Кавказу М.Лермонтова и Л. Толстого, их кавказ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в связь с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их биографии, в которых 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войск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и восставшими кавказскими горцами, и писатель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империаль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так и к горцев особенно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Яркий контраст симпатии к восставшим горцам, предпочитающим лучше умереть стоя, чем жить на коленях, в первом периоде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экспансии империи в втором периоде Лермонтова. Наоборот, в первом периоде Л.Толстой, согласный с стратегией покорения Кавказа империи, а в втором периоде уже не следя за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и горцев, он обнаружил глубо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расов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кавказских горцев, не боясь смерти, а также вообщ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ы. Изменение их подхода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их личными причинами. Кавказская тематика, зависящая от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ы сам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хотя не дает хронику кавказской войны, но раскрывает истинны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народов на Кавказе, поэтому имеет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XIX века,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Л. Н. Толстой, биограф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

(责任编辑 常喆)

## 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 ——“五日战争”之结果及影响

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

**【内容提要】**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五日战争”和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独立为标志，南高加索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倍受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该地区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已经沦为了主要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舞台，俄罗斯的“维稳方案”、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以及欧盟的“欧洲化”政策在此相互博弈。大高加索地区正在彻底地“国际化”。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长期酝酿的冲突在2008年8月导致俄罗斯的深度卷入并升级为“五日战争”，引发了俄罗斯从维持现状到公开支持分离政权的立场转变。这不仅从政治和法律上改变了独联体两个热点地区的面貌，改变了力量结构，还严重影响了整个欧亚地区民族—政治形势。“五日战争”证明了共同规则、标准和准则已经失效，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面临着设计世界秩序新模式的问题。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新安全构想引发了不同观点和评论。促进有效合作，形成共同准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俄罗斯 格鲁吉亚 南高加索 “五日战争” 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47-(21)

### 导 言

2008年8月，高加索地区成为国际关系之焦点。尽管这听似夸大其词，但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国家间边界得以

\* 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 (Sergey Markedonov)，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副教授，莫斯科政治与军事分析所族际关系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划定，但所谓的“别洛韦日国家主义”<sup>①</sup>原则最初并没有应用于南高加索。因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边界修订的第一个先例在此出现。欧亚大陆，特别是高加索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只获得部分承认的国家——它们的独立仅得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联邦的认可，但却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承认。2008年8月南奥塞梯的“五日战争”之后，莫斯科自1991年以来首次表明了其扮演修正国家角色的意愿。2008年之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奉行优先维护现状的国家政策。莫斯科改变路线的尝试引起其与西方——美国和欧盟——关系的变化。然而，如今该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像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1999年10月18日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上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所公开表现的言辞形象。

因此，南高加索不单是对于本地区，而且还成为本地区乃至整个后苏联空间的新的舞台。这也解释了为何该地区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五日战争”是否会成为俄罗斯和西方新一轮对峙的起点？它是否会触发格鲁吉亚国内、其周边国家及高加索地区国家间新的民族冲突？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承认是否会为俄罗斯北高加索民族政治自决设立先例？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是否会波及其他地区的冲突，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问题上的冲突？俄罗斯是否会允许获得部分承认的共和国树立国家地位？总体而言，俄罗斯会在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国内政治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2008年“炎夏”事件所引发的基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考虑对“大高加索”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挑战。

## 一、地区冲突：相互作用

俄罗斯南部所有的民族政治冲突实际上与前苏联外高加索共和国的冲突紧密相关。这里不单是指公开的冲突，而且还包括潜在的冲突。如今，第比利斯继续夸大来自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确切地说是明格雷利亚人）难民问题，却对20世纪90年代初大批奥塞梯族人从格鲁吉亚离开保持沉默。在战前的格鲁吉亚，大约有10万奥塞梯族人生活在南奥塞梯之外，而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在前南奥塞梯自治州人数则为63200人。奥塞梯族人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五大民族团体，位于格鲁吉亚族、亚美尼亚族、俄罗斯族和阿塞拜疆族之后，其总数超过了生

---

<sup>①</sup> 别洛韦日国家主义（Belovezh'e nationalism）一词来源于别洛韦日协定（Belovezh'e Agreement）。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明斯克市签订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前苏联各机构在联合体成员国境内的活动将停止——译者注。

活在密集居住区的阿布哈兹族（根据1989年全国民调，总共有93000名阿布哈兹族人）。在1990年至1992年的敌对状态之前，奥塞梯族人主要生活在第比利斯（33318人），茨欣瓦利（31537人），哥里（8222人）和鲁斯塔维（5613人）。<sup>①</sup>

如今，格鲁吉亚（境内）大约有3万奥塞梯族人居住。由于过去几年没有进行随访，因而难以判断他们的真实境况。然而，第比利斯所做出的“要充分保证格鲁吉亚境内奥塞梯族人权利和自由”的承诺并不令人信服。同时，几乎所有来自格鲁吉亚内地（包括南奥塞梯居民）的难民都定居在北奥塞梯。北奥塞梯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包括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普里戈罗德内（Prigorodnyi）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该地区开始受到北奥塞梯政治领导人民族主义言论的影响。

在1992年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中（这也是俄罗斯土地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内地和南奥塞梯的居民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解释了为何每当第比利斯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或是发表好战言论时，诸如前国防部长伊拉克利·奥克鲁阿什维利（Irakly Okruashvili）“在茨欣瓦利庆祝新年”的表态<sup>②</sup>，都会引起俄罗斯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涌向北奥塞梯的新难民潮只会致使奥塞梯与印古什之间的关系恶化。

20世纪90年代初，格鲁吉亚对克瓦雷利（Kvareli）阿尔瓦人（Avars）的强制移民引起了达吉斯坦北部地区的动荡。迁至达吉斯坦基兹利亚尔（Kizlyar）和塔鲁姆（Tarum）地区的阿尔瓦人受到了俄罗斯族和诺盖族（Nogays）的抵制。这致使达吉斯坦北部俄罗斯族人的持续外流。“车臣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鲁吉亚阿卡迈特区（Akhmeta District）（潘基西峡谷，Pankisi Gorge）局势的缓和。因此，没有格鲁吉亚的稳定，便不可能有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阿塞拜疆的达吉斯坦族（列兹金人，阿尔瓦人）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引起了达吉斯坦权力精英的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车臣因素”如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致使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断恶化。

2008年8月达到顶峰的俄格冲突，再次证实并提升了北高加索共和国的政治作用。车臣“东方”营——如同俄罗斯陆军的结构单元——积极参与了对格鲁吉亚军队的进攻。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sian）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首先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a）——时刻准备着将志愿军送至冲突地区。这与1992—1993年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十分相似。当时，阿布哈兹的胜利是由北高加

---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Georgia – South Ossetia: Refugee Return the Path to Peace,” *Europe Briefing*, No. 38, 19 April 2005, p4.

② See “Okruashvili Intends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in Tskhinvali” [in Russian], *Strana Ru.*, 2 May 2006, <http://old.strana.ru/stories/04/06/01/3507/280404.html>

索共和国运动代表组成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Confederation of the Caucasus Highland Peoples）的武装力量所取得的。2008年8月，志愿军的参与并非没有条件。有能力提出要求的非政府组织明确表示，在没有获得与俄罗斯联邦中央合作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但是很明显地，俄罗斯南部的民族区域仍然在政治和军事水平上拥有动员群众的巨大潜力。

印古什共和国国内局势动荡，它在南奥塞梯事件上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2008年8月16日，著名网站“高加索焦点”（Caucasian Knot, Kavkazskiy uzel）上发表了一篇以（题为）“南奥塞梯战争让印古什居民回想起城郊区（普里戈罗德内）冲突”的文章，该题目意味深长。这篇文章提到“印古什居民本可以与南奥塞梯及一小支安置在俄南部地区的移民就军事冲突进行谈话”。该文强调，每当念及1992年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印古什人就无法对南奥塞梯居民产生特别的同情。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奥塞梯的难民也没有流亡至印古什，而是选择去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此外，“高加索焦点”网站的记者引用了多名印古什居民的说法，其中相当一些颇具说服力：“如今，俄罗斯已对南奥塞梯表示歉意，但却并未对1992年受难的印古什人表达任何歉意”。来自纳兹兰的19岁青年伊涅萨回忆起在普里戈罗德内区印古什人所遭遇的谋杀，指出“没有人对冲突的受害者致歉”，甚至都“没有人为这些受害者说情”。<sup>①</sup>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在普里戈罗德内区定居的南奥塞梯难民（如今这块土地上大约生活着7500人）。这是导致北高加索两个共和国双边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我们再次援引“高加索焦点”网站上的文章：

39岁的伊萨是城郊区的居民，他对该地区的奥塞梯人持消极看法。他认为当地政府很久以前就在准备南奥塞梯居民的定居点。‘这一点我们都清楚，而每个印古什人也心知肚明。捷尔克（Terk）、切尔诺列钦斯基（Chernorechenskoye）和尤日涅（Yuzhnyi）定居点都是为了此目的而准备的。南奥塞梯冲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环节都逐渐呈现眼前。当局制造了一场灾难，迫使数千名南奥塞梯难民逃离，而萨博本地区六七万印古什人却被遗忘。没有人像如今谈及奥塞梯人一样谈及他们。南奥塞梯居民自1992年开始居住在城郊区。北奥塞梯政府将被驱逐的印古什人的房子给了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一些家庭自1992年冲突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尤日涅定居点。’<sup>②</sup>

---

① See “The War in South Ossetia Reminded Residents of Ingushetia about the Conflict in the Prigorodny District” [in Russian], *Caucasian Knot*, 16 August 2008, <http://www.kavkaz-uzel.ru/articles/140550>

② “The War in South Ossetia Reminded Residents of Ingushetia about the Conflict in the Prigorodny District”.

因此，如果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局势不稳，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持续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两者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解释了为何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南高加索地缘政治领导者的重担。俄罗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形势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之而来。这些法律上属于格鲁吉亚但事实上却是独立国家（具备国家的要件：军队、议会、行政权力机构和警察）的领土的稳定，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然而，如何界定“稳定”并且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将这些领土“重新整合”进格鲁吉亚，则是另外一回事。

## 二、地缘政治竞争的区域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南高加索地区便不再是俄罗斯联邦的地缘政治“附属品”了。自那时起，地区和地区外行为体不再认为俄罗斯是新近独立的南高加索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也不再认为俄罗斯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间唯一的调解人和唯一的政治重心。20世纪90年代初期，事实上，俄罗斯可以在不受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这三个南高加索国家的政权。<sup>①</sup>相关各国均认为俄罗斯是该地区民族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及和平协议的主要的缔结者。毋庸置疑，俄罗斯在结束南奥塞梯（1992年）、阿布哈兹（1993—1994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1994年）的流血事件、阻止格鲁吉亚内乱（1993）以及帮助格鲁吉亚维和行动方面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俄罗斯也在决定南高加索“热点地区”和平进程的政治和法律设计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关于南奥塞梯的达戈梅斯协议（1992）、关于阿布哈兹的莫斯科协议（1994）和终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比什凯克协定和停火协议。

然而，尽管相比美国、欧盟、土耳其和伊朗所具有的明显优势<sup>②</sup>，但是俄罗斯却无法向南高加索国家提供任何具备吸引力的现代化项目，而只能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稳定器”的角色。这个角色在“热点地区”本应合乎情理，但是莫斯科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只专注于“冻结”冲突，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以及现代化层面均所做甚少。实际上，克林姆林宫的政策完全集中于巩固政权和支持南高加索的统治者这两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政策与尚古主义相关联，而2000年之后却与苏维埃的复仇努力相联系。由于这种错误，南高加索彻底国际化了。这一进程不仅是美国、欧盟或者土耳其，而且也是南高加索国家的兴趣所在。21世纪初，南高加索国家——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承认了

---

①如1992年初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Eduard Shevardnadze）和1993年的盖达尔·阿利耶夫政权（Heydar Aliyev）。

②比如语言因素、苏维埃的过去、长期的社会经济联系、精英代表间的个人联系。

它们对“国际化”进程的兴趣。苏呼米（Sukhumi）、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的政治精英和相对较少的茨欣瓦利政治精英明白，如果他们的外交政策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他们获得认可的机会将会明显增多。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亚里尔·科恩（Ariel Cohen）所注意到的那样，必须：

要理解，高加索和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不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国四百年来向南方的扩张业已结束。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或军队当权派没有通过公开使用军事力量恢复帝国的意图。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部署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自由，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历史上首次进入欧亚大陆内域，获得这里巨大的可用经济资源。<sup>①</sup>

南高加索出现了新的行为体。事实上，外高加索地区三个前苏联共和国的领土已变成各国、各国际组织进行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

同时，当前至少有三大方案在南高加索进行博弈。首先是俄罗斯的“维稳”方案。几年前，俄罗斯的“维稳”方案主要基于“苏联的怀旧资源”。然而，能源因素新近成为重点。总体而言，“市场化”原则（即市场价格规则起着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朋友关系中亦是如此）逐渐成为俄罗斯与南高加索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同时，资源的改变（“怀旧”资源让位于能源资源）并未导致政治重心的任何变化。对于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避免了革命性的冲击（“颜色革命”，或者是新的非体制型政治人物的出现）。因此，“冻结”国内政治进程成为俄罗斯在已获得承认的南高加索国家及事实上存在的实体的维稳方案的基本目标。

第二项方案是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其风格而言，该战略与俄罗斯的维稳方案截然相反。撇开我们的喜好，美国在南高加索的存在已是政治现实，比如：美国—格鲁吉亚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帮助训练格鲁吉亚军队、在北约框架中为第比利斯提供主要“说客”的政治支持）；抑或是美国对亚美尼亚的援助，亚美尼亚直到最近依旧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财政援助接受国；又或者是美国与阿塞拜疆合作的石油项目的加速发展——著名的政治管道“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老布什声称，这一管道能够鼓励所有高加索国家的独立，并且能够发掘它们的经济潜力。<sup>②</sup>

1997年是美国高加索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年。1997年以来，南高加索经历了三波“美国化”。事实上，直到1997年美国都承认俄罗斯联邦在后苏联空间的领导

---

① Ariel Cohen, “US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Building a New ‘Silk Road’ to Economic Prosperity,” *Backgrounder*, No. 1132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4 July 1997).

② See “Baku – Ceyhan Pipeline: Unexpected Pluses of Russia’s ‘Political Loss’” [in Russian], *Prime-Tass*, 26 May 2005, <http://www.prime-tass.ru/news/show.asp?id=535&ct=articles>

作用，并没有将前苏联南高加索共和国当作其特殊战略利益区。早在1996年，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大卫·马克（David Mark）坚持认为“奉行该政策可以保证南高加索所有政权的稳定，既不会挑战俄罗斯的绝对主导地位，也无需承担任何政治义务”。<sup>①</sup>而1997年之后，美国开始将高加索地区列为其地缘政治重点之一。

第二波始于2001年“9·11”悲剧。“9·11”事件促使美国增加其在前苏联的整个东方、特别是南高加索存在的意图。2002年4月，美国与格鲁吉亚签署了“培训和装备”协议，旨在为格鲁吉亚培训2000人组成的特种兵部队。美国对前苏联南高加索共和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美国政府支持2003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由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领导的获胜团队“年轻的格鲁吉亚人（Young Georgians）”。在阿塞拜疆，美国支持权力更替以及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的当选。美国还支持“民主与发展组织——古阿姆（GUAM）”作为独联体的替代方案，GUAM的成员包括3个南高加索国家中的两个，即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

南高加索的第三波“美国化”进程与伊拉克战争密切相关。首先，入侵伊拉克是美国“大中东”全球计划的一个部分。起初，华盛顿认为宏观区域的控制体系是建立在其与最亲密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强大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该战略的设计者看来，“大中东计划”的成功实现，将有助于解决包括以色列安全以及对该地区主要能源资源的控制等诸多问题。南高加索地处大中东的后方，应该保持稳定和平静。然而，不同于俄罗斯，美国视稳定源自对“持续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当然，美国并未丧失其一贯具有的现实主义意识。除了忙于格鲁吉亚的“民主化”之外，美国还不断地批评亚美尼亚“民主建设中的缺点”。同时，美国就在阿塞拜疆建立“开放社会”的前景稍持保留意见，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意识到当今将近60%的阿塞拜疆人支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一旦公众意愿得以自由表达，大中东相对平静的“后方”将会陷入混乱。

第三项方案则是欧盟的“欧洲化”政策：欧洲共同体（自1993年起更名为欧盟）20世纪90年代成为活跃在南高加索的主要行为体之一。然而，不同于美国注重军事和政治领域，欧盟的高加索政策更为强调社会和经济领域。欧盟的第二个关注点则是实现地区稳定并且力求促进该地区向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欧洲标准”看齐。2004年，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被纳入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计划。2006年11月14日，南高加索国家对欧洲邻国政策计划的采用，标志着该地区的“欧洲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的高加索政策变

---

<sup>①</sup> David Mark, “Eurasia Letter: Russia and the New Transcaucasus,” *Foreign Policy*, No.105, Winter 1996, p.141.

得更为一致和“完整”。2007年1月起，黑海地区成为欧盟的边界。土耳其分析家马斯塔夫·阿伊丁（Mustafa Aydin）比较客观地指出，不同于美国，已经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作为成员国的欧盟成为活跃在黑海和南高加索的区域行为体。<sup>①</sup>

如今，这三项计划从属于一个框架：欧洲邻国政策，“黑海协同”和“东方政策”。上述计划中最新的则是波兰倡议，这是欧盟新成员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这些计划的最初目标是促使南高加索更为接近欧洲，并且将欧洲良好的邻国关系移植到高加索区域。

同时，美国和欧盟迄今为止为南高加索设计的这两种新方案，不是被俄罗斯忽视，就是被当作是阻止俄罗斯在该地区维持支配角色的严峻挑战。危言耸听的言辞不绝于耳，但皆非出自重要政客之口，尽管在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欧盟关系恶化期间俄罗斯当局也曾说过。相反，俄罗斯外交界和专家们缺乏洞察力以仔细客观地判断这三个相互博弈的方案所可能产生的威胁以及与欧洲人、美国人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从这种角度来看，似乎有必要区分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也有必要意识到在高加索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统一的西方”或“西方政策”。早在2004年，欧盟官员代表安东尼·顾奇（Anthony Gooch）在展望美国“大中东”战略的前景时就说过，使用现存的轮子胜于发明全新的轮子。<sup>②</sup>

欧洲并不完全支持将民主强行“引入”包括后苏联高加索在内的东方。举例来说，让我们看看北约成员国对于格鲁吉亚的北大西洋前景的不同处理方法。同时，美国代表批评贯穿欧洲计划的理想主义和过于天真。2007年4月11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黑海协同：新地区合作倡议”。该倡议的第3.3节界定了欧洲“冻结冲突”的处理方法。根据倡议，欧盟委员会“倡导欧盟通过在解决冲突的持续努力中增加其政治参与”。<sup>③</sup>然而，谁能真正将冲突各方分开，谁将保证如今居住在冲突区的人们和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的安全？该倡议并未给出答案。谁将为了实现光明的和平理想而遭受损失？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美国和欧洲的方案均存在重大缺陷。

同时，无论俄罗斯精英喜欢与否，西方的方案，即美国和欧洲的计划，在南高加索已成事实。如今，欧盟是为卷入高加索民族—政治冲突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最大

---

① Mustafa Aydin, “Europe’s New Region: The Black Sea in the Wider European Neighbourhood,” *Journal of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5, No.2, May 2005, p. 257.

② See “Group of Eight: Bush Has not Managed to Buil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Russian], *Polit*, 11 June 2004, <http://www.polit.ru/news/2004/06/11/broader.popup.html>

③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lack Sea Synergy –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COM (2007) 160 final, Brussels, 11 April 2007,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7\\_160\\_en.pdf](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7_160_en.pdf)

供应方。自2002年以来，欧盟委员会不断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中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捐款金额达到1100万欧元。2006年12月4日，欧盟承诺追加2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冲突受害者的民族血统并不是欧盟决定其分发援助的决定因素。诚如上文所述，直到最近亚美尼亚还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援助接受国。如果我们分析亚美尼亚（俄罗斯的战略伙伴）经济的进出口结构，显然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出口仅占其所有进口额的16%（而荷兰出口占其进口额的18%）。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出口占俄罗斯总进口额的13%。如今，格鲁吉亚成为第二大美国援助接受国。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高加索国家的经济“西化”已是一个既成事实。

对于高加索而言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冲突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仅仅靠抽象的民主理论和慷慨的资金援助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俄罗斯的表态和政治参与，该地区的“和平”简直无法想象。然而，为了让西方听到俄罗斯的声音，首先需要精通美国、欧洲的政治语言，并且学会如何应用这种可以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圈和法律界所理解的语言来维护重大的国家利益。其次，我们自己也需要参与巩固的进程，同时还应参与到南高加索国家渐进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不促进进步就无法维持稳定。再次，俄罗斯可以指导欧洲人如何将法律架构与政治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此乃促进高加索实现持久和解的必要条件。

### 三、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对峙：从局部小争斗到全球意义的冲突

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长期酝酿的冲突在8月升级为五日战争，从而成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在过去17年里发生的第三次武装对峙。南奥塞梯在法律上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直到8月26日之前俄罗斯都承认这一事实。然而，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直接参与使得这次战争与前两次明显不同。

不同于1992至1993年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当时只是俄罗斯军人个人的自发行动，莫斯科并没有表达对其军队行动的支持。而针对这次的“五日战争”，克林姆林宫称之为“促使格鲁吉亚走向和平的行动”，旨在从全面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拯救奥塞梯人民。不同于在过去的格鲁吉亚—奥塞梯对峙（1991至1992年、1992至1993年以及2004年）中的表现，美国和欧盟这一次积极参与其中。乌克兰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乌克兰对参与军事行动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强硬立场阻碍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第比利斯首次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抗两个分裂的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南奥塞梯及其周边发生的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头条。五日战争伊始，联合国安理会曾三次开会讨论高加索的局势。考虑到高加索有可能成为一场新的大型战争的起



点，自1991年至1994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武装冲突以来，大众传媒首次发布预警。

但是，五日战争最重大的影响则是莫斯科正式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格鲁吉亚的两个自治共和国因此加入了获得部分承认的“国家”的阵营，就如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共和国。它们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但却既是核俱乐部成员又能够行使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一个国家建立了成熟的关系。

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是后苏联时期在格鲁吉亚首次升级为全面对抗的民族对峙。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南奥塞梯自治州——不被承认的南奥塞梯共和国的前身——成立于1922年4月20日。该民族国家的领土（3840平方公里）占格鲁吉亚领土总面积的6.5%。根据苏联1989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南奥塞梯的居民为98500人（其中，奥塞梯族为63200人；格鲁吉亚族为28500人；俄罗斯族为28500人；900人来自犹太民族各群体）。1989年格鲁吉亚的奥塞梯族人口总计165000人，为格鲁吉亚总人口的3%。大约10万奥塞梯族人居住在格鲁吉亚内地，最大的群体生活在第比利斯、哥里和鲁斯塔维。危机前期，南奥塞梯的法律地位由1980年通过的南奥塞梯自治州法所约束。<sup>①</sup>

冲突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国际社会知之甚少、不感兴趣的局部对峙，到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第一阶段（1988—1989年）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冲突。在此期间，冲突双方互不认同对方的主张，形成了后来冲突中貌似有理的民族—政治指导方针。比如，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和记者开始将奥塞梯人描绘成来自北高加索的“生活在格鲁吉亚土地上的外来族群”。而奥塞梯同仁则深入剖析了两个奥塞梯（俄罗斯的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之间“共同的阿兰人传统”<sup>②</sup>（common Alan heritage）的论题。<sup>③</sup>第二阶段（1989—1991年）则是标志着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为期两年的立法“地位”之争的政治—法律阶段。

1989年9月20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布了侵犯南奥塞梯自治州权利的征兵法。两个月后，即1989年11月1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人民代表委员会将自治州的地位提升为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第比利斯对这一单方面给予南奥塞梯更高地位的举动十分恼怒。1989年11月16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

---

① Alexander Skakov, “South Ossetia: Demography, Economy, Policy” [in Russian], Georgia: It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I (2002): 167.

② 阿兰人是古代占据黑海东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在1世纪罗马的文献中首见记载。他们专门饲养马匹，经常袭击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高加索各行省。约370年阿兰人被匈奴征服后，只有一部分留在奥尔良和瓦朗斯（Valence）附近定居，大多数都迁往非洲。据说接受匈奴统治的部分是高加索奥塞梯人（Ossetes）的祖先。

③ Artur Tsutsiyev, Atlas of the Ethno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1774-2004) [In Russian] (Moscow: Evropa, 2006), 111-117.

维埃主席团宣布，南奥塞梯自治州委员会的决议无效。一周后，数千名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报复行动，在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举行游行示威，这次行动中出现了第一次人员伤亡。

紧接着的事件进一步促使冲突升级。1990年12月11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南奥塞梯自治权无效。同时，苏维埃政府宣布南奥塞梯自治州进入紧急状态，而格鲁吉亚领导人则实行对南奥塞梯的封锁。

第三阶段，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的武装斗争爆发（1991年1月至1992年1月）。1991年1月6日，苏联内务部队从茨欣瓦利撤回兵营，多达6000名格鲁吉亚军人开驻该城市，屠杀无辜。

南奥塞梯首府在交战过程中经受了三次袭击（1991年2月和3月，以及1992年6月）。俄罗斯位于北高加索的地区北奥塞梯也被卷入冲突。43000名来自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各行政区的难民涌入北奥塞梯。克里姆林宫无法直接控制北奥塞梯的行为。此外，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坚持只在莫斯科支持南奥塞梯（无论哪种形式）的条件下才会签署联邦条约。1992年5月末，北奥塞梯关闭了通往格鲁吉亚的管道。

1992年6月24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以解决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为原则，签署了达戈梅斯（索契）协议。维和行动始于7月14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北奥塞梯在该地区部署维和部队，并成立混合监督委员会（Joint Control Commission, JCC），以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在这场战争中，100个村庄被烧毁，千余人遇难。武装冲突继而被“冻结”，第四阶段开始，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4年5月。

不同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从未经历过格鲁吉亚人的大规模民族清洗。直至2008年8月以前，格鲁吉亚族人和奥塞梯族人和平生活，相安无事。自称为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宪法承认格鲁吉亚语为少数民族语言。交火、封锁以及挑衅宣告结束，相对和平的阶段开始。2004年之前第比利斯和茨欣瓦利之间有直达的公交线路；在埃尔格涅季（Ergneti）等地有格鲁吉亚族人和奥塞梯族人一起做买卖的市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彼此承认对方的汽车牌照。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走私成为这片“地位未决”的领土的经济支柱。两个民族均参与了走私。这种灰色经济促使南奥塞梯强烈依附于格鲁吉亚，并且也成为这两个冲突群体间主要的——尽管是非正式的——恢复信任的手段。

1998年当选的北奥塞梯总统亚历山大·扎索霍夫（Alexander Dzasokhov），经常通过与之前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同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直接的、非正式交往，在缓解紧张状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而得到信任。此外，在过去的12年里，和解过程中的一些建设性的契机得以发掘。首先，维和任务由俄

罗斯和格鲁吉亚军队共同执行；第二，为冲突领土的重建作准备而签署了一批重要文件。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各方于1996年5月16日签署的“安全与信心建立措施备忘录”，以及2000年12月3日俄罗斯—格鲁吉亚政府间签署的关于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地区经济重建及难民回归的协议。

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冲突的“解冻”阶段。这一阶段始于第比利斯改变在南奥塞梯的力量平衡及和解的政治—法律安排的尝试。无论是2003年10月至12月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还是2004年1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总统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获得了97%的选票），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相仿，均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在演讲中，萨卡什维利及其副手不断呼吁民众要重建统一的格鲁吉亚并且洗雪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遭受的“国耻”。

2004年5月31日，格鲁吉亚在未与混合监督委员会磋商的情况下，以打击走私为借口，派遣300名特种特遣部队进入南奥塞梯。混合监督委员会成员谴责该行动违背了1992年的达戈梅斯协议。格鲁吉亚则指责俄罗斯维和者的种族偏见和种种罪行。2004年7月20日，格鲁吉亚总统公开声明他不排除废除达戈梅斯协议的可能性：“我不打算承认那些禁止我们在格鲁吉亚的中心悬挂国旗的协议。即使谢瓦尔德纳泽已签署这些协议，我也随时准备着取消这些条约”。<sup>①</sup>萨卡什维利的声明传递出他努力要实现三个目标：i）通过美国和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方式，将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国际化；ii）将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重新定位为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表现；iii）拒不承认俄罗斯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和平保证人的角色。

实现这些目标成为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第五阶段的要旨。2004年8月8日至8月19日，第二场战争发生在南奥塞梯的土地上。对抗双方不仅采用轻武器，而且还使用了火炮。尽管交战双方在月末短暂停火，但在2004年8月冲突的决定性阶段出现了新一轮炮击、挑衅以及对至关重要的通讯方式的封锁。之后，军队的小型“过度反应事件”在南奥塞梯司空见惯。

这次短暂的战争成为俄罗斯对这一地区政策的转折点。2004年之前，俄罗斯渴望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力求维持现状，并且视维持现状为最好的解决方式。2004年以后，俄罗斯意识到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有赖于南奥塞梯的局势，因而事实上站到了自称为共和国的这一边。首先，莫斯科开始将茨欣瓦利看作是影响第比利斯的工具——当时第比利斯已开始执行极度亲美反俄的路线。第二，南奥塞梯的失守被视为对俄罗斯自身的威胁。悬而未决的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与该自称为共和国

---

<sup>①</sup> See “Georgia 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the Treaty on Ossetia” [in Russian], BBC Russia, 20 June 2004, [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russia/newsid\\_3911000/3911101.stm](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russia/newsid_3911000/3911101.stm).

的周边局势紧密相关。

2005-2006年，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sup>①</sup>，这些决议将俄罗斯的维和任务描述为“极其消极的”，并且认为俄罗斯联邦的行为是“以吞并格鲁吉亚为目标的持久努力”。<sup>②</sup>

2006年秋，第比利斯发起了一项所谓“另一个南奥塞梯（an alternative South Ossetia）”的计划，该计划由南奥塞梯前总理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萨纳科耶夫（Dmitry Sanakoyev）领导实施，而萨纳科耶夫在茨欣瓦利控制区内却毫无声望。该计划旨在重新安排谈判进程，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茨欣瓦利进行直接对话。

2007年3月，第比利斯在南奥塞梯领土上建立了临时行政当局，这一行为得以终止其与茨欣瓦利的对话。第比利斯力图巩固萨纳科耶夫的国际合法性。萨纳科耶夫曾参加在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论坛，并被视为是不同于爱德华·科科伊季（Eduard Kokoity）的奥塞梯方面的“积极的、合作的”代表。

“解冻”政策以将格鲁吉亚的维和部队移交至格鲁吉亚国防部的掌控之下（之前由混合监督委员会领导）而告终。格鲁吉亚统一事务部长捷穆尔·雅科巴什维利（Temuri Yakobashvili）再三号召退出和平解决的现有安排。此外，2006年7月，格鲁吉亚违反了1994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停火和部队隔离的莫斯科协定”，在阿布哈兹科多里河谷的上端部署陆军和警察，而众所周知，根据莫斯科协议该地区并非军事区。现状就此打破，冲突各方放弃谈判。

要理解格鲁吉亚在2004年到2008年的强硬但并不充分的行为，就必须考虑一些外部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2003年，格鲁吉亚社会对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大失所望，提出旨在维护领土完整的强国努力。但是，对第比利斯的支持主要来自美国，比如军队技术支持、外交互惠以及与北约建立友好关系，这些支持使得格鲁吉亚领导层相信，西方会认可他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

第比利斯越发自信，因为美国及其盟友对格鲁吉亚违反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

① 2005年10月11日的“关于格鲁吉亚领土上冲突地区的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行动”决议，2006年2月15日的“关于前南奥塞梯自治州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进程”决议，2006年7月18日的“关于驻扎在格鲁吉亚领土上的维和军队”决议。

② 参照格鲁吉亚议会对于格鲁吉亚领土上冲突地区的现状和持续的和平行动的决议。See Parliament of Georgia, Resolu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Georgia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Conflict Reg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Georgia and Ongoing Peace Operations, Tbilisi, 11 October 2005, [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7268](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7268); Parliament of Georgia, Resolu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Georgia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Former Autonomous District of South Ossetia and Ongoing Peace Process, Tbilisi, 16 February 2006, [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9732](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9732); Parliament of Georgia, Resolu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Georgia on the Peacekeeping Forces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Georgia, Tbilisi, 18 July 2006, [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13089](http://www.parliament.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98&info_id=13089)

签署的和平协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同时，他们对改变国内的民主水平也反应冷淡，比如在2007年11月7日打压反对派，在2004年阿扎尔自治共和国（Adzharia）的选举和2006年地方政府选举中运用行政资源对抗反对派。

2008年，莫斯科同样促成了格鲁吉亚冲突的“解冻”。3月21日，国家杜马声明其可能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两个条件为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以及对这两个自称的共和国使用武力。

4月，即将离任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示联邦政府向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此外，普京还设想建立起莫斯科与茨欣瓦利和苏呼米之间的直接联系。西方反应迅速而强硬，声称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是其优先考虑事宜。

不过，2008年8月7日之前，南奥塞梯的现状被扰乱，阿布哈兹亦然。在4年前的武装冲突中，大约有70人丧生，而随后几年里各方的伤亡人数总计约100人。2008年8月，量变发展成质变。暴力升级的战术导致了对茨欣瓦利的袭击和俄罗斯的强硬反应（很明显，第比利斯和西方对此均始料不及）。因此，萨卡什维利的军事—政治冒险和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的直接干预，源于之前的“冲突解冻”阶段。

#### 四、告别九十年代

南奥塞梯发生的新型螺旋式对峙不仅从政治和法律上改变了独联体两个热点地区的面貌及其力量结构；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整个欧亚地区的民族—政治形势。在乌克兰研究员维塔利·库利克（Vitaly Kulik）看来，“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区域安全体制不能有效地应对新挑战。因此，前苏联空间明显缺乏安全感。”<sup>①</sup>

自此以后，高加索（同时也可能包括整个黑海地区乃至独联体国家）见证了旧游戏规则的逐渐失灵。而20世纪90年代初所达成的协议和法律标准则完全是徒劳的。当然，可能偶尔被提及，但它们却不再具有独联体内外各参与者所承认的合法性。

套用程序员的术语，2008年8月经历了欧亚大陆冲突的重新洗牌。维持现状和稳定局势的法律和政治协议不再适用。无论是格鲁吉亚——完全拒绝关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达戈梅斯协议和莫斯科协议——还是俄罗斯，他们的领导人对于维和行动都有着更为广泛的见解，都不愿意遵守协议。如若我们统计一下参与迫使格鲁吉亚停火的阿布哈兹黑海海域的海军人数，则会发现总数显然已超过维和人员的定額。

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派驻冲突区域的特种部队的使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维和

---

<sup>①</sup> Vitaliy Kulik, “The Trap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for the Post-Soviet Space” [in Russian], Politika, 24 October 2008, [http://politika.org.ua/cgi-bin/b2.pl?sh=pub\\_singl&num=1754](http://politika.org.ua/cgi-bin/b2.pl?sh=pub_singl&num=1754).

人员)，而且俄罗斯部队还跨越了1992年和1994年协议规定的安全区的地理边界——哥里、波季(Poti)、塞纳基(Senaki)。当然，俄罗斯所采取的诸多行动是对格鲁吉亚所发起的“冲突解冻”以及冲突升级的回应。但无论如何，它们客观上违背了游戏早期的规则。

2008年，独联体内部的对抗在质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对抗主要是由苏联解体引起的，如今，过去的惯性不再发挥作用，而是受到当前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和建设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初的冲突是对“邪恶帝国”债务的“延迟支付”，而当前的冲突则是要求付款的新申诉。“冲突被冻结”已是过去十年的事，已与叶利钦一代一起消失。现在的冲突则交由后苏联一代的政治家来解决，这些政治家在游戏过程中制订了新的规则。

2008年时，无论是南高加索国家，还是乌克兰均表达了他们要废弃早期协议的愿望。基辅不允许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战舰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基地，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各种协议给予重重一击。显然，关于“俄罗斯海军在乌克兰存在”的协议暗示着俄罗斯有权为了其国家利益而派驻特遣部队。

苏联解体后，曾经是同一个国家的边界需要进行修订。这未必合法。苏联沿着苏维埃共和国边界的解体——似乎合乎常理——触发了前自治地区内部颇有争议的反应，它们从未将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视为其理想。因此，一系列的民族冲突被引发，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胜者和败者。

许多不满意第一次“修订”结果的国家寻求再次分配，因此它们尝试着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帮助之下进行“第二次修订”。失败者憎恨“冲突冰冻期”后的现状，竭尽全力要改变现状，但却未对维持现状的各种政治法律基础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今，政客和专家们并不清楚南奥塞梯在五日战争中确切的伤亡人数。对于相关各方而言，这些数字只是政治数学。这场战争实际上破坏了“未获承认公民”的基础设施而非“科科伊季的政权”。没有俄罗斯的干预，格鲁吉亚的前自治州将会蒙受与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同样的命运。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在1995年被克罗地亚（它为领土完整而斗争）和居住在该国的塞尔维亚人一起彻底击败。约有2万至3万名奥塞梯难民涌入俄罗斯南部。这些难民构成该自称的共和国的人口的一半。

对于第比利斯而言，八月的“五日”也成为其真正的灾难。“统一格鲁吉亚”项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暴力的新螺旋（特别是在南奥塞梯）使得分离出来的共和国无法实现和平统一。过去17年中的第三次战争后，“未获承认的公民”不太可能听从第比利斯的任何提议。此外，格鲁吉亚从南奥塞梯接收了大约两万名新难民。南奥塞梯不同于阿布哈兹，格鲁吉亚族人甚至在1991—1992年第一次战争后还与奥

塞梯族人共同生活。如今，生活在南奥塞梯的格鲁吉亚人突然发现自己已被驱逐。

同时，大家也注意到2004—2008年所谓的利亚科维走廊（Liakhvi corridor）<sup>①</sup>上装备了稳固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且配备了武装。格鲁吉亚还在走廊上安装了雷达设备。正是这些村庄封锁了茨欣瓦利，切断了它的供应以及跨高加索的公路。

2008年，这些村庄的格鲁吉亚族人不得不为第比利斯的冒险主义付出代价。不仅是那些袭击南奥塞梯的，而且连无辜百姓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前自治州的格鲁吉亚族人遭受了和生活在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人同样的命运。正如一位格鲁吉亚反对派政客所提及的：“这是一场灾难，数千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最高统帅的年少轻狂而被剥夺”。<sup>②</sup>从官方口径看，俄罗斯以胜者姿态出现。考虑到北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与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休戚相关，俄罗斯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均看似合理。俄罗斯成功地防止了南奥塞梯军事—政治基础设施的完全被破坏。而且，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还炸毁了对自称“共和国”造成威胁的、所谓利亚夫比走廊的村庄的这种格鲁吉亚要塞。

短时间内，俄罗斯成功地控制了过去两年中格鲁吉亚突击的前哨哥里镇。第比利斯在哥里建造了一所军医院，其太平间和后勤设施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城镇所需的数目。格鲁吉亚部队被驱逐出它们两年前进的潘基西峡谷上端。

因此，莫斯科的行动也促成了“冲突的解冻”和现状的改变。与西方对峙的益处尚不明显，但损失却太清晰。随着高加索局势不再安全，国际上干涉的努力将会增强。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将会为与俄罗斯对抗提供先例。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其竞选活动中建议，调整华盛顿及其盟友对车臣和南高加索共和国自决的态度。

## 五、西方对高加索的态度：矛盾和异见

南奥塞梯战争表明“统一的西方”并没有扎实的根基。在某种意义上说，“统一的西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约或欧盟成员国（或者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这一概念并未反映出复杂的现实。通过以经济潜力和政治影响力来衡量的世界诸大国对俄罗斯联邦持不同的态度。仅仅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标准而言，土耳其不应属于西方；而如果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土耳其则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北约的成员，另外，如以人数衡量，它还拥有联盟成员国中的第二大

---

① 四个格鲁吉亚村庄：塔马拉申尼（Tamarasheni），克卡维（Kekhvi），阿卡贝提（Achabeti）和库尔塔（Kurta），位于茨欣瓦利与兹哈瓦（Dzhava）间公路上长达30公里的一段。

② 23 Ivlian Khaindrava, “For Western Europe Countries Saakashvili Turned into ‘Enfant Terrible’” [in Russian], News-Azerbaijan, 19 August 2008, <http://www.newsazerbaijan.ru/analytics/20080819/42446221.html>

军队。“五日战争”突出了西方领导力量（美国、北约、欧盟）观点的分歧，同时也表现出各个组织成员国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和立陶宛，或者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波兰之间对于当前的高加索地缘政治持有迥异的态度。即使在“新欧洲”，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立场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者罗马尼亚的态度也不一致。

美国、老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新成员国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很显然，西方资源有限，无以影响局势。他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实用主义。相反，他们的态度相当情绪化，采取了老套的意识形态的固定模式。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烈·里亚博夫（Andrei Riabov）在比较西方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潜力时的精确描述：不同于其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西方社会对于南高加索有着很多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与日俱增，但是它们的资源——外交、政治和经济——却明显不足以影响各方对冲突的看法，也无法让他们达成共识”。<sup>①</sup>相反，在高加索问题上，他们有着太多的雄心，而具体的政策却又太少。

对于美国而言，之所以它会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支持格鲁吉亚，正是出于以高加索地缘政治促进其国家利益的考虑。高加索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一个部分（占据后方位置）。因此，它被视为利用地缘政治的跳板。同时，南高加索还是大黑海地区的一个部分，该地区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甚至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一地区远不具备军事战略意义，而主要被看作是传播欧洲价值观的沃土。所以，欧盟态度的重点在于“软安全”。这也解释了为何欧盟力求理解俄领导层的意图，更愿意对莫斯科作出妥协和让步，并且拒绝实施对俄罗斯不利的制裁。

这也是2008年12月欧盟委员会起草一份包括三个高加索国家在内的“东方伙伴关系”基本目标的文件的原因。<sup>②</sup>从2007年至2010年，亚美尼亚从这个项目框架中获得9840万欧元的经济援助，阿塞拜疆的为9200万欧元，格鲁吉亚则是1亿2千零40万欧元（另外还有多达5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其克服“五日战争”的影响）。“东方伙伴关系”特别关注于如何克服“五日战争”的影响。欧盟特别强调“能源安全”问题，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能源共同体的谈判，同时也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缔结能源方面的谅解备忘录。欧盟还准备增强其对阿塞拜疆的政治干预，阿塞拜疆是唯一向欧盟出口碳氢化合物的伙伴国家。人们常常将“东方伙伴关

---

① Andrei Ryabov, “The Conflicts’ Division” [in Russian], Gazeta.Ru, 23 July 2008, <http://www.gazeta.ru/column/ryabov/2790424.shtml>

② 参见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astern Partnership: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COM (2008) 823 final, Brussels, 3 December 2008,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astern/index\\_en.htm](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astern/index_en.htm)



系”与2004年欧盟东扩前夕其与立陶宛和波兰签署的类似协议相类比。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细微而基本的区别。虽然高加索国家领导人试图将“伙伴关系”解释为其加入欧盟的前兆，但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直接邀请加入欧盟。

相比于美国，北约同样对俄罗斯采取了更为建设性和谨慎的态度，尽管这看似矛盾。最近的事件表明北约不应等同于美国。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和北约发言人詹姆斯·阿帕苏莱伊（James Appathurai）的所有声明都比美国国务院代表的声明更体现出“政治准确性”的风格。9月16日，北约秘书长在访问第比利斯时称，“评判俄罗斯”并非该组织的目标。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宣传机构忽视了来自北约的积极信息<sup>①</sup>。总体而言，2008年夏秋之交，俄罗斯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并没有致力于发现其与西方观点的不同，而是忙于将格鲁吉亚“妖魔化”，这恰好转移了欧洲政治家对于格鲁吉亚总统进取意愿的注意，在客观上帮助了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

不管怎样，多面的“西方”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上演新的“冷战”。如今，新“冷战”并不会出现，但它的确是2008年8月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如果莫斯科在南高加索的“特殊利益”（主要受到俄罗斯南部的安全问题的驱使）得到承认，俄罗斯还是会限制自身的反西方主义的。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莫斯科没有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出口社会主义，也没有保护当地的王朝利益。当然，利益冲突、重大误解依旧存在；过去的陈旧模式以及恐慌心理依旧占主导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挑战必须面对：阿富汗和中亚的局势，伊朗和朝鲜的态势，能源、国际恐怖主义。如果要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彼此的共同努力和相互了解。我们依稀能看见一些微弱但却真实的希望，但愿人们能够为未来的世界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规则而努力。

## 结语：高加索危机的国际影响

“五日战争”标志着另一个过程的终结，这个过程在全球而非仅仅是欧亚的框架中展现出来。该战争表明一个公正的、有效的、合法的国际仲裁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国际法出现深层次危机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雅尔塔一波茨坦模式出现深层次危机的结果。同时，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华沙条约解散以后建立单极世界的尝试失败的结果。就在冷战结束、两德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

<sup>①</sup> 例如北约和欧洲理事会议会(the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PACE)于2008年11月18日在巴伦西亚(Valencia)通过的关于恢复与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决议。

共和国（SFRY）解体之后，很多专家和政治家都发现了国际法正在出现危机。然而，1989年至1991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仅仅标志着“结束的开始”。随着对科索沃的承认和俄罗斯以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形式所做出的回应，国际法的雅尔塔一波茨坦模式不再作为一套合法的、被广泛承认的规则而存在。2008年初，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成为单极世界中权力的一次展示。美国单方面宣布这一前塞尔维亚自治区是“民族-政治自决的一个独特案例”，并且启动了其形式和法律上的合法化进程。

但是，作为对于华盛顿及其盟友挑战的回应，莫斯科于8月26日打破了“承认的垄断”。现在，由于缺乏共同的态度或标准，单个的权力中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承认（或者不承认）任何实体。2008年2月，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其中还包括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均承认了科索沃这个前塞尔维亚自治区的独立。之后，2008年8月，另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核俱乐部”成员的俄罗斯，承认了前格鲁吉亚两个自治区的主权。与此同时，俄罗斯高调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然而即使在2008年8月之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也不愿意放弃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原则。

因此，共同规则、标准和准则并不起作用。相反，世界政策是建立在政治的权宜之计基础之上的。很自然的，这也并非新近才出现的原则。1991年，在违反领土完整原则的情况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前苏联共和国获得承认；同时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统一”成为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的基础。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原则在1991年开始崩溃，并且随着2008年2月科索沃获得独立的承认而彻底瓦解。2008年8月，俄罗斯根据美国和欧盟半年前设立的先例，宣称自己是世界一个新的力量中心，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志承认任何它愿意承认的国家。“五日战争”凸显出世界结构中后二战模式持续消亡的过程：如今，联合国仍在正式运转，国际法主要为美俄两国所参照。然而，在现实中，国际法中充斥着各种争议性的论题和呼声，华盛顿和莫斯科皆使用着“双重标准”。因此，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均面临着如何为世界秩序设计新型模式的问题。在新模式真空的状态下，替代方案是建立起“国际丛林”、自信地向世界展示力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行为体正在采取这些方式，这一点值得关注。

就此而论，俄罗斯有机会参与到详细制定新欧洲和全球安全结构基本原则的进程中。从俄罗斯外交的角度看，2008年的8月事件是对于从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废墟中产生的、只有一个世界大国即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模式认识失败的结果。

2008年10月8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法国埃维昂（Evian）国际论坛上讲话时，提出了他对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新安全结构的构想。他重申“以前的安全体系已经过时并且无效。现在的协议不能反映现实中全球局势的真实变化。伊拉克、科索沃、高加索和阿富汗的局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看来，当今局

势表现出“单极综合症”所带来的整个欧洲-大西洋政策持续危机已进入白炽化阶段。同时，他还强调有必要与西方一起寻找走出危机的方法。此外，梅德韦杰夫主张有必要缔结新的欧洲安全条约。他指出新条约的五个关键点：i) 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ii) 不允许使用武力；iii) 对于军事建设进行合理限制；iv)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没有在欧洲维持和平和稳定的专有权利；v) 保障公共安全，各国有责。他声称任何新的安全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纯粹”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不应受到意识形态动机的扭曲，而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组织也应有机会加入。<sup>①</sup>这一观点后来在2008年11月5日总统首次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时也得到重申。<sup>②</sup>

莫斯科的新倡议引发了不同的观点和评论。其中很多似乎与克林姆林宫的行为不相一致<sup>③</sup>。然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倡议依旧让人热血沸腾。单方面的行动——无论是科索沃，抑或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承认——都对特定地区（比如巴尔干半岛或高加索地区）或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促进有效合作，同时，建立起评估各国利益和愿望的共同准则、标准和方式乃当务之急。无论如何，一个全新的高加索区域已然出现。

（胡彦译，张红校）

---

**【Abstract】**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he focal poi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Russian-Georgian “five-day” war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Territory of the three republic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s become arena for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In this region, Russian “stabilization project”, American “Greater Middle East” project and the EU’s “Europeanisation” policy game with each other. The big Caucasus region is undergoing complet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long-simmering conflict between Georgia and South Ossetia escalated to a five-day war in August with Russian deep involvement and led Russia to change its position from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to supporting publicly separatist regimes. This did not just reconfigure, politically and legally,

---

① See “Russian President to Promote New Security Treaty for Europe”, RIA Novosti, 7 October 2008, <http://en.rian.ru/russia/20081007/117507229.html>

② President of Russia,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5 November 2008, [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8/11/05/2144\\_type70029type82917type127286\\_208836.shtml](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8/11/05/2144_type70029type82917type127286_208836.shtml)

③ 比如必须支持国家领土完整的观点与单方面承认两个前格鲁吉亚自治区的独立不相一致。

two hot spots in the CIS and change the setup of forces, and also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ntire situation in Eurasia. The five-day war demonstrates that common rules, standards and criteria do not work and main actors of world politics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of devising a new model of world order. Medvedev's vision of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has given rise to different views and comment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effective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 common criteria.

**【Key Words】** Russia, Georgia, the South Caucasus, “Five-day War”, Great Power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с «пятидневной войно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рузией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Абхазии и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как основными проявлениями активности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все чащ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дним из регионов,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 наибольшее внимание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ерритория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с тремя бывшими советскими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стала основной аре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гд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стоянная игр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а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ей Большого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европеизацией»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егион Большого Кавказа сейчас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тотальн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Давний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Грузией и Южной Осетией в августе 2008 года привел к глубокой в него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повысился до уровня «пятидневной войны»,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ил позицию России от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татус-кво до открыт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изменило облик СНГ в двух горячих точках, изменило силов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но и серьезн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на всем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ятидневная война»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общие правила, стандарты и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принципы потеряли сво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ейчас основные субъекты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оят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опроса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нов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дведева вызвала различные реакции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Содейств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и выработка общих стандартов стала актуальной задач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Грузия,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пятидневная вой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

(责任编辑 常喆)

## 俄罗斯地缘政治构想与异化的格俄关系\*

马尔哈兹·马茨阿别利泽\*\*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格俄关系的走向，主要由俄罗斯政府及其政界对格鲁吉亚所持的态度决定。俄地缘政治家的思想和观念长期形塑着俄罗斯的政策，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抑制格与西方的接近，分裂格鲁吉亚，最终消除俄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障碍。在格鲁吉亚方面，虽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恢复其领土完整是不变的目标。俄格不同的定位，使得后苏联时期双方的关系异化，并导致了2008年的冲突。糟糕的是，这场冲突并没有改变俄格任何一方的立场，反而强化了各自固有的目标。

**【关键词】**格俄关系 俄罗斯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2-0068-(13)

### 导 言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目前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自2008年8月俄格冲突以来，俄罗斯占领了格鲁吉亚五分之一的领土，并视这些领土上既有的苏呼米（Sokhumi）<sup>①</sup>和茨欣瓦利（Tskhinvali）<sup>②</sup>为独立政权。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苏联解体后格俄关系的走向主要由俄罗斯政府及其政界对格鲁

\* 本文系作者向2010年7月26-3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世界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发表。论文原题为“The Russian Geopolitical Conceptions-Challenges for Cooperation: Metamorphosis of the Georgian-Russian Relations”。

\*\* 马尔哈兹·马茨阿别利泽（Malkhaz Matsaberidze），政治学博士，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① 苏呼米：阿布哈兹首府，文中指代阿布哈兹。——译者注。

② 茨欣瓦利：南奥塞梯首府，文中指代南奥塞梯。——译者注。

吉亚所持的态度决定。

在俄罗斯反格鲁吉亚的诸多成见中，主要的一种是将格视为一个无持续生存力的国家。根据这一思维定势，俄罗斯可以轻易肢解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从未尊重过格鲁吉亚的主权，而是积极支持格境内的分离政权，并在 2008 年“八月战争”后承认其独立。目前，俄正激烈争论进一步瓦解格鲁吉亚的方案。但必须提及的是，“肢解格鲁吉亚”计划的始作俑者无法回答以下问题：如果计划失败，后果将会怎样？在此情况下，俄格关系将如何发展？

无论是尝试获得俄罗斯的适度尊重抑或是努力与之疏离，格鲁吉亚政府的目的一直是力求恢复其领土的完整。正是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手段使得后苏联时期的俄格关系出现异化。

##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后苏联时期俄格关系

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目标及其实施手段，已公开见诸俄地缘政治家们的种种言论中。多年来，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一直形塑着俄罗斯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兴起了一股地缘政治热潮。一些政客甚至将其与 20 世纪 20-30 年代德国出现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该学科也大受欢迎。这种相似性主要源于帝国瓦解后的共同背景，同时地缘政治要服务于新帝国的野心，并激起复仇的意识。

从一开始，高加索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中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俄罗斯认为高加索地区是维持其在后苏联空间影响力的关键区域；其次，高加索是俄罗斯成功进行“地缘政治重建”的地区。俄罗斯关于高加索的现代地缘政治构想，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再次）成功地巩固了其在南高加索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在 1993-1994 年，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重组的新型格局得以形成。

西方仅仅关注这些进程，但却从未表现出要干涉扭转整个事态发展的意向，更不用说对其抱有任何的期望。稍后，待西方意识到其在南高加索的利益所在时，俄罗斯早已在这种地缘政治重组中占据先机。一方面，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莫斯科仍坚信南高加索的所有局势发展均在其掌控之中，而另一方面，对俄而言，“不利情况”也频频出现：

第一，尽管后苏联地缘政治的重新布局伤害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但这两个国家并未因此走向极端，这也使得它们没有考虑彻底推翻时势发展的相关结果。

第二，西方对该地区的兴趣正渐次增加，这主要通过其尝试复兴“丝绸之路”

和实施大多绕过俄罗斯联邦的里海石油出口项目的举措体现出来。

第三，作为后苏联时代联盟的古阿姆集团（GUAM）也得以建立，并被莫斯科视为反俄的地缘政治架构。

俄罗斯（南高加索）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阻止和避免类似的意料之外过程的出现。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地缘政治已脱离现实，而仅仅全然关注其“地缘政治引擎”，表现为重组高加索的种种方案：俄一批地缘政治家曾在这一活动中任想象自由驰骋并展示其影响力。杜金（A. Dugin）、米特罗法诺夫（A. Mitrofanov）、日里诺夫斯基（V. Jirinovski）、博罗代（A. Borodai）、扎图林（K. Zatulín）及米格拉尼扬（A. Migranian）均参与其中。他们思想的巨大差异可见一斑：通过高加索人控制高加索的想法，这通过在俄罗斯联邦支持之下制造族际冲突以及创造“共同高加索家园”（Common Caucasian House）的行动得以实施；利用土耳其一波斯的竞争态势，激活东正教元素，“统一两个奥赛梯”，建立与亚美尼亚联结的走廊，保持对阿扎尔共和国（Adjara）的控制权，利用多种情况反对并扰乱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Baku-Ceyhan pipeline），策划肢解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可以说，俄罗斯地缘政治最热衷于“分裂”格鲁吉亚。首先，这一目标看似更易实现；其次，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消失，将消除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及整个后苏联南部建立新帝国计划的所有威胁。

### 格鲁吉亚分裂的前景预测

在一些俄罗斯分析家看来，格鲁吉亚的存在只会是昙花一现。它曾被沙俄吞并且被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并只有在苏联的框架中才能成功地保持其国家的统一。因此，没有俄罗斯，格鲁吉亚势必彻底分裂。根据他们的观点，一旦格鲁吉亚政府实行不受欢迎的政策，俄罗斯联邦应准备好积极支持格的解体过程。

描述此类情境的材料常见诸俄罗斯报端。1998年11月28日出版的亲政府的《俄罗斯报》（Rosssiiskaya Gazeta）令人印象深刻。该报同时刊发了两篇文章，分别是美国保守派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俄罗斯和欧亚问题专家亚里尔·科恩（Ariel Cohen）撰写的“高加索冲突威胁美国利益”，以及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官、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斯图皮欣（Vladimir Stupishin）的“美国威胁着俄罗斯在高加索的利益”。正如科恩所言，美国在高加索的利益，是要求强化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及亚美尼亚的主权。它们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应得到保障。出于对美国渗透高加索的担心，斯图皮欣则提出要抑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亲美策略”。

在斯图皮欣看来，如果俄罗斯“更为坚定地支持阿布哈兹（Abkhazia）及南奥赛

梯 (South Ossetia), 这将更为合理”, 而且俄罗斯有必要支持“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 因为这些地区并不认可自己是卡特利 (Kartli)<sup>①</sup> 的一个部分, 而是选择了联邦秩序”。斯图皮欣宣称, 俄罗斯的这一行动可以建立在“任何民族自决的天赋权利”的基础之上, 这一原则得到了国际文件的认同和支持。

对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家而言, 分裂格鲁吉亚的想法颇具诱惑力。例如, 加吉耶夫 (K. Gajiev) 指出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对于俄罗斯的期待, 同时他对明格列尔语 (Megrelian) 和斯万语 (Svan) 的独立的书写系统根本不存在表示关切。<sup>②</sup> 在加吉耶夫看来, 由于格鲁吉亚国力衰弱, 密集居住在格鲁吉亚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易于”受到邻国的影响。<sup>③</sup> 加吉耶夫列举了有关阿布哈兹族、奥塞梯族、亚美尼亚族 (Armenians)、阿塞拜疆族 (Azerbaijanians)、阿瓦尔族 (Avars)<sup>④</sup>、基斯特族 (Kists)<sup>⑤</sup>, 以及阿扎尔人 (Adjarians)<sup>⑥</sup> “分裂立场”的争论并分析其前景<sup>⑦</sup>。

伊林 (V. Ilin) 指出, “阿布哈兹、南奥塞梯, 以及阿扎尔人均涉及到俄格双方利益, 为此展开的争夺是俄格冲突的速率与频次的主要决定因素。”伊林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直觉推动着我们探寻解决创造双重从属保护领地的方案。”<sup>⑧</sup>

弗拉德·德尔加乔夫 (V. Dergachov) 重申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中反格成见的主要观点。在他看来, “与亚美尼亚不同的是, 部族和部落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均得以保留。分裂主义情绪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根据德尔加乔夫的评估, “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均势的维系, 被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尚未结束的国家形成过程所强化。例如, 在格鲁吉亚, 除了最普及的格鲁吉亚语外, 还有

---

① 卡特利 (Kartli), 格鲁吉亚古国名, 588-1008 年为卡特利亲王国; 1490-1762 年为卡特利王国。——译者注。

② Гаджиев К.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сс. 228-229. 明格列尔语和斯万语均使用格鲁吉亚字母表述, 无本民族的独立书写系统。作者暗指加吉耶夫关注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是这两个格鲁吉亚境内的少数民族应该在各方面, 包括在语言上表现出独立的一面。——译者注

③ Гаджиев К.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с. 69-70.

④ 阿瓦尔人 (Avars) 在古代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名称。他们约在 6 世纪时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到 9 世纪初以前, 一直统治潘诺尼亚平原。阿瓦尔人的遗民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山区, 人口大约六十万, 平原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另外还分布于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车臣共和国等联邦主体, 以及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格鲁吉亚境内有少量分布。——译者注。

⑤ 基斯特族 (Kists) 是格鲁吉亚境内居住在潘吉西峡谷的少数民族, 与车臣和印古什有族际联系, 总人数约为 5000 人。——译者注。

⑥ 阿扎尔人 (Adjarians), 格鲁吉亚族的一个分支, 语言为格鲁吉亚语阿扎尔方言, 主要生活在格西南部的阿扎尔自治共和国, 格境内部分省份和土耳其境内有少数阿扎尔人聚居。1921 年 7 月 16 日曾建立独立的行政单位——阿扎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解体后高度自治, 2004 年经激烈冲突后完全臣服于“玫瑰革命”后上台的萨卡什维利政府, 但保留了自治地位。——译者注。

⑦ Гаджиев К.С.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авказа.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сс. 164-168.

⑧ Ильин В.В.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узов.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9. с. 407.



三种相关语言：明格列尔语、斯万语及拉兹语。明格列尔人（Megrelians）的首府自古以来就是祖格迪迪（Zugdidi），他们一直生活在拜占庭和土耳其政府统治之下”。<sup>①</sup>

显然，又一个问题马上出现了：如果格鲁吉亚愿意进入“俄罗斯的轨道”，新帝国论者是否会放弃“分裂格鲁吉亚的尝试”呢？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之一亚历山大·杜金的著作在格鲁吉亚也曾出版<sup>②</sup>，在他看来，格投向俄怀抱的后果可能会遵从杜金提出的高加索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并非政治的，而是地区的族群——文化差异在起作用”，鼓励“民族地区的纵向融合和横向隔离。”<sup>③</sup>在杜金看来，改变的结果是，阿布哈兹应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而“统一的奥塞梯”也应该建立。但余下的“东正教格鲁吉亚”将被定位为具有“控制高加索家园”的功能。杜金认为，车臣将局限于地缘政治的困局，可能受到“东正教格鲁吉亚”的统治。此外，“格鲁吉亚应附属于达吉斯坦共和国（Dagestan）和印古什共和国（Ingushetia），这将可能促使北部高加索自治体的出现。它在经济上将十分发达，但在战略上完全受制于俄罗斯。”<sup>④</sup>对杜金而言，缔造“高加索联邦”的前景一片光明。这一新型联邦将整合“独联体的三个共和国”，并使之成为“俄罗斯内部的自治实体”。<sup>⑤</sup>

## 通过与苏联领导协商的方式恢复格鲁吉亚国家独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恢复格鲁吉亚民族独立的观念逐渐形成。它致力于让莫斯科承认对格鲁吉亚的占领和侵吞，同时寻求通过国际社会来消解相应的后果。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是苏联政治体制自由化，对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18-1921年）的记忆重新活跃。这一时期，出版物充斥着非正式的格文版本。这强化了格鲁吉亚独立的愿望，同时也催生了人们对未来独立的格鲁吉亚国家的共识。

根据1920年5月7日签署的条约，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得到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认可，尽管几个月后，苏俄红军侵入格鲁吉亚，并在1921年2至3月的战争后将其占领。苏维埃的原则被强加于格。随后，苏维埃格鲁吉亚被并

---

① Дергачев В.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иев: ВИРА-Р, 2000. сс.251-252.

② A.Dugin,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bilisi, Mtatsmindeli, 1999.

③ 此处作者指的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等地区应与格境内其他地区相隔离，而更多地与俄进行深度融合。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横向的格分离地区均处于俄罗斯的南部，与俄相互间构成纵的关系。——译者注。

④ Дугин А.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М.: Артогеа-центр, 1999. с.351-352.

⑤ Там же. с.352.

入苏联。大量文献对这一历史进程有所论述。<sup>①</sup>通过与苏联领导人协商的方式来恢复格鲁吉亚国家独立的尝试建立在上述史实基础之上：俄罗斯应承认这一事实，即红军占领及事实上对格鲁吉亚的吞并，并强行将格鲁吉亚纳入苏联。根据既定计划，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消除侵略的后果并恢复格鲁吉亚的国家独立。

在以加姆萨胡尔季阿为首的“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的竞选联盟（Zviad Gamsakhurdia-Rounda Table-Liberated Georgia）赢得 1990 年 10 月 28 日选举胜利后，这一构想成为其政治实践的主题，它正式设定了一个至格鲁吉亚恢复国家独立的过渡阶段<sup>②</sup>。

莫斯科对于第比利斯呼吁其承认占领和吞并格鲁吉亚的事实，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苏联政府也不打算承认格鲁吉亚的国家独立，并不断给格制造诸多麻烦<sup>③</sup>。对苏联政府承认占领并且吞并格鲁吉亚的期待化为泡影，因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1991 年 3 月 17 日将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保留联盟国家。

### 恢复独立及与俄罗斯的冲突（1991-1993 年）

格鲁吉亚抵制了 1991 年 3 月 17 日的联盟公投，并将 3 月 31 日定为恢复国家独立议题的公投日。格鲁吉亚公民应回答“您是否希望在 1918 年 5 月 26 日独立法案的基础上恢复独立？”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预设是：格鲁吉亚恢复国家独立是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延续。1991 年 4 月 9 日，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格鲁吉亚宣布恢复独立。在法律上，格鲁吉亚自认为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事实上它依旧属于苏联的一个选区。作为对独立宣言的回应，苏联及解体后的俄罗斯领导层均积极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加姆萨胡尔季阿政府被推翻，恰好与苏联解体的时间相一致。格鲁吉亚开始内战，紧接着是阿布哈兹的战事。“在种族冲突的面具之下，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侵略被物化，所谓的‘北高加索志愿者’积极参与其中”。

---

① 在此必须提及托依泽（L.Toidze）的专著：L.Toidze, *Intervention, Occupation, Forcible Sovietization and Factual Annexation –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of February-March*, Tbilisi, 1991.

② 1990 年 11 月 14 日，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加姆萨胡尔季阿提出：“苏俄占领和吞并格鲁吉亚后”，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并没有签署投降协议。这解释了缘何“从司法角度看，格鲁吉亚的国家独立及其宪法依然有效”。“格鲁吉亚是一个附属国，它已开始清算兼并后果和恢复国家独立的进程。”“承认格鲁吉亚是一个被占领国则是完全不同的议题，这使苏军地位变为外国军队，并推动将占领军从格鲁吉亚领土上撤走的问题进入国际法议程。与联盟中央及西方国家进行谈判是这些事态发展的强制性先决条件”。（*Politics*, Tbilisi, 1990, No.2, p. 11）。

③ *History of Georgia – the 20th Century: Textbook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Faculty of History*, Tbilisi, 2003, p.231.

①

加姆萨胡尔季阿政府被推翻后，格鲁吉亚新政府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E. Shevardnadze）逐渐习惯于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的分裂政权，以及俄罗斯联邦在维和名义下对这些领土的控制。尽管与反对派矛盾重重，谢瓦尔德纳泽依旧把格鲁吉亚带入独联体。<sup>②</sup>而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计划并不令人满意。据谢瓦尔德纳泽回忆，在其 1993 年前往莫斯科访问的过程中，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P. Grachov）向他展示了一张地图，该地图描绘了格鲁吉亚的分治政权：加姆萨胡尔季阿占领着西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则统治着东格鲁吉亚。彼时格鲁吉亚领导人在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K. Kravchuk）的帮助之下，成功地避免了这一计划的实施<sup>③</sup>。除了军事失败之外，谢瓦尔德纳泽还考虑了大部分原属于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倾心于莫斯科，认为加姆萨胡尔季阿统治时期与俄罗斯对立是一种错误。

当时的感觉是，独联体就是改造过的苏联（modernized Soviet Union），其成员身份等同于俄方对格鲁吉亚的新占领<sup>④</sup>。但是，不同于 1921 年 2 月至 3 月的是：一方面独联体不是苏联的简单翻版，另一方面，格鲁吉亚也没有在政治上完全失败。尽管似乎格鲁吉亚要被带回到后苏联俄罗斯轨道。

---

① 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不宣而战的俄格战争”，并列出了俄罗斯联邦公然侵略格鲁吉亚的大量事实。据他评估，“在阿布哈兹与俄罗斯人进行的战争是最肮脏、最无情、反人类的战争之一，它带来的是对一个民族的仇杀和折磨；他们的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许多人被迫离开阿布哈兹”。参见 E. Shevardnadze, *Pikri carsullsa da momavalze—memuarli* (Thoughts on the Past and on the Future. Memoirs), Tbilisi, 2006, p.430.

② 鉴于这些事态的发展，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局势陷入困境，俄罗斯做了一件丑事，国家面临一场灾难。别无选择，目前的情况让我只能妥协：格鲁吉亚须学会成为俄罗斯控制的独联体的成员。参见 E. Shevardnadze, *Thoughts on the Past and on the Future*, pp.432-433. 谢瓦尔德纳泽一直为格鲁吉亚社会所诟病，因为他宣布效力于俄罗斯，力图将格拉回到俄罗斯的轨道，为俄罗斯效力并被委以重任，这使格鲁吉亚濒临失败。例如，在人民阵线领导人诺达尔·纳塔泽（Nodar Natadze）看来，谢瓦尔德纳泽只为俄罗斯联邦服务，“与阿尔津巴（Vladislav Ardzinba，阿布哈兹领导人）不相上下，带来了人为的战争和失败。”参见 Nodar Natadze, *What I Know*, Tbilisi, 2002, p. 298.

③ E. Shevardnadze, *Thoughts on the Past and on the Future*, pp.434-435.

④ 1995 年 10 月，格鲁吉亚著名公众人物巴克拉泽（Akaki Bakradze）提到：“独联体是俄罗斯试图夺回因苏联解体而丧失的所有特权和财产的努力。这显然是在新形势下重构俄罗斯帝国的一次尝试。”参见 A. Bakhradze, *Selected Essays*, Vol.7, 2005, p.638. 据他所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并不存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只有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有利益诉求，正是由于这些利益，俄罗斯占领了上述领土。顺理成章地，俄利用了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既有状况，推动他们反对格鲁吉亚，但这一过程完全受到俄罗斯的掌控。俄罗斯为了将其政治目标付诸实施需要这一点。参见 A. Bakhradze, *Selected Essays*, p.640.

## 借助俄罗斯恢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尝试(1994-1998 年)

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以及批准与俄罗斯的所谓“友好协议”，标志着俄格关系新阶段的开始。参照历史上的相似事件，这份协议就是与俄罗斯签署的新型“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条约”(Georgievski Treaty)<sup>①</sup>。格鲁吉亚同意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部署军事基地，而作为回报，则要求俄在格建设军队，重新恢复其领土完整。如果说 1783 年俄罗斯援助格恢复领土完整意味着对土耳其和伊朗的抗争，那么在当代，它理应是拒绝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政权的支持。这势将使他们对谈判持有更开放的态度，使得在格管辖之下对这些领土的地位作出决定成为可能。当时，格领导人常常会提到，“解决阿布哈兹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

一批政界人士认为，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案将来自莫斯科，但也有一些人声称这一步并不现实甚至是致命的。之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后者的主要观点。格鲁吉亚的“亲俄”定位由于俄罗斯自身的立场和行为而动摇了。俄的态度过于简单粗暴：对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利益熟视无睹。

寻求有利于莫斯科的立场被证明只是纯粹的幻想且不会成功。俄罗斯没有支持格增强军力，而借助俄谈判也只是徒劳。俄国家杜马并未批准其与格鲁吉亚的“友好条约”。莫斯科没有考虑格鲁吉亚的利益，并臆断格恢复领土完整将会使俄失去影响该国的手段。当时，俄罗斯政客们的声明指向是，否认格鲁吉亚作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国家这个事实。俄地缘政治学家们曾揣摩过格鲁吉亚随后瓦解的情形。

随着 1998 年 5 月加利(Gali)地区局势的发展，化解冲突的种种努力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据传，格鲁吉亚寻求在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重建其在加利地区的影响力。但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已有的预案，大批难民再次从该地区逃离。即便是在加利事件发生后，谢瓦尔德纳泽政府也在莫斯科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但这些努力都越发无法实现，愈益辜负期许。自 1999 年起，俄格关系急剧恶化，这些变化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

其一，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格鲁吉亚在这场战争中并未支持俄方；

其二，里海能源项目的启动或落实；

其三，俄开始撤除驻格军事基地。这并非俄罗斯联邦的自愿行动，而是在 1999 年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峰会上被迫接受的。<sup>②</sup>

---

①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条约于 1783 年由沙俄与东格鲁吉亚的卡特利—卡赫季王国签署。根据此条约，沙俄保证格的独立并拥有国家主权。——译者注。

② *The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Diplomacy*, Tbilisi, 2003, pp.632-633.

## 俄罗斯与西方操控政治的尝试(1999-2003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骑墙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政策中表现得日益明显。实际上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但在初始阶段，格与西方的接近有限，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其份量逐渐加重。这一方面是由于期待借助俄罗斯化解冲突的希望落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逐渐加大。1999 年，巴库—苏普萨（Baku-Sufsa）石油管道开始运营；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Baky-Tbilisi-Ceyhan）的建设正式启动；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aky-Tbilisi-Erzurum）天然气管道计划初步形成。正如谢瓦尔德纳泽所言，途经格鲁吉亚的过境项目“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俄竭尽所能企图一劳永逸地破坏这些计划。”<sup>①</sup>

格鲁吉亚政府当时正积极努力将西方引入到解决冲突以及其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中来。格鲁吉亚在古阿姆集团中非常活跃。而在 2002 年 11 月，谢瓦尔德纳泽宣布格希望加入北约。而事实上，所有向西方靠拢的举动都以格方的妥协让步为代价。骑墙政策被解释为出于保持地区稳定，以及在该地区有自身利益的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需要。但谢瓦尔德纳泽的反对者们却认为，这一政策是谢当局治理失灵的原因之一。在谢瓦尔德纳泽政府外长亚历山大·奇克瓦伊泽（A. Chikvaidze）看来，“谢瓦尔德纳泽可耻地退出政坛，受到其统治最后 10 年格外交政策的影响：他这一时期的政策不连贯、无原则且无目标。”<sup>②</sup>

## 玫瑰革命及快速融入西方的尝试（2003-2008 年）

在谢瓦尔德纳泽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他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左右摇摆的行为饱受批评。有人提出，正是由于他优柔寡断的政治，该国的西向外交受到封锁和层层阻碍。玫瑰革命后，萨卡什维利（M. Saakashvili）政府宣布了快速融入西方架构的必要性，同时积极支持独联体国家的天鹅绒革命。这自然让俄罗斯大为光火，尽管

---

① 参见 E. Shevardnadze, *Thoughts on the Past and on the Future*, p.451. 谢瓦尔德纳泽回忆了在恐怖主义分子刺杀他后的第二天，即 1998 年 2 月 9 日，他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Eltsin）的电话谈话：俄罗斯总统要求格鲁吉亚放弃经其领土开通石油管道的尝试，但谢瓦尔德纳泽断然予以拒绝。（Ibid, pp.455-456.）

② A. Chikvaidze, *Political Chess*, Tbilisi, 2004. 根据奇克瓦伊泽的评估，“过去的五年中，谢瓦尔德纳泽不断地‘改变’着外交优先方向。”当俄美之间危险的博弈及持续不断的谎言……与优先方向变化的序列不相一致时，“改变”一词只能销声匿迹。自然而然地，不严肃的伙伴同时遭到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摒弃。（Ibid, p.318.）

萨卡什维利希望格俄关系正常化。他向俄罗斯提出“白纸”政治 (blank page politics) 的方案，<sup>①</sup>并希望引进俄罗斯资本。这可以算是一种“补偿”，以使俄罗斯更易接受格鲁吉亚融入西方架构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俄格关系正常化与复杂化同时并存。既有针对格鲁吉亚的经济制裁，同时，该国冲突地区的局势也日趋恶化。格鲁吉亚政府对俄徐徐展开的入侵，以及对吞并自身领土的种种尝试，回之以声明谴责。

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所宣布的迅速融入西方架构的进程遭到失败。尽管在得到西方支持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但明显的西倾并未使格鲁吉亚恢复领土完整。

## 2008 年 8 月俄格冲突之后

2008 年“八月战争”使俄格关系陷入僵局。这并非如莫斯科官方所描述的，是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侵略行为”的自然反应。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蓄谋良久，并尽力将之归咎于格。正如欧洲政治家在战时所指出的，“非对称使用武力” (non-proportional use of force) 并非旨在“保卫奥塞梯”，而是意在肢解格鲁吉亚。俄罗斯地缘政治家们断言，格鲁吉亚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实体，很容易被击溃。

根据普京的前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Andrei Ilarionov) 所言，俄旨在获得对格的控制，如果该计划落空，则俄将选择肢解格鲁吉亚。<sup>②</sup>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 (Pavel Felengauer) 持相同观点。费尔根豪尔指出，俄想让格成为一个仅由 7 至 9 个地区组成的脆弱邦联；该邦联没有任何军事潜力，其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紧张，在安全及经济方面理应完全依赖于俄罗斯联邦。<sup>③</sup>

2008 年的“八月战争”并未使上述期盼如愿。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的“独立”，而此举只得到三个边缘国家的附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被视为“被占领区”。格鲁吉亚的国际努力，旨在获得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领土“被占领”的官方认可。

莫斯科承认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的独立，将俄格关系带入僵局。按照格方思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应是俄罗斯军队根据 2008 年 8 月 12 日的停火协议撤离。而莫斯科官方则争论是否应接受 2008 年“八月战争”所产生的“新现实”。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们更起劲地讨论“肢解格鲁吉亚”的计划。俄格冲突后，

---

① 指从零开始重建新时期的格俄关系。——译者注。

② Илларионов А. Грузия –тяжелый выбор--прич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http://noviny.narod.ru/smi-00000637.html>

③ Фельгенгауэр. О целях нов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Грузии, <http://aillarionov.livejournal.com/91918.html>

与此相关的文章大量涌现。鲍里斯·鲍里索夫（Boris Borisov）声称，只有格鲁吉亚“去主权化”，并且在它分崩离析之后，俄罗斯才能“解开格鲁吉亚心结”。<sup>①</sup>

安德烈·艾比凡采夫（Andrei Epiphancev）在其作品“格鲁吉亚国内的边缘地区”中，认为其他一些部分也有可能从格鲁吉亚中分裂出去。<sup>②</sup>2008年9月，阿列克谢·巴利耶夫（Aleksei Baliev）和阿列克谢·莫罗佐夫（Aleksei Morozov）宣称格鲁吉亚解体的进程已经开始。据他们所言，在萨梅格列罗（Samegrelo）<sup>③</sup>出现了当地的货币（local currency）。此外，该文还附有表现格鲁吉亚四面楚歌的地图。<sup>④</sup>

无论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还是政客们对该问题均没有答案：如果格鲁吉亚的整个去主权行为失败，俄罗斯的选择将是怎样？至于格鲁吉亚，它在等待“机遇之窗”的来临，希望恢复其领土完整。

应该强调的是，“肢解”格鲁吉亚并不仅仅是一些地缘政治学家的想法。格鲁吉亚政府公开宣称分裂格鲁吉亚是俄罗斯政府的当前政策。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于2010年7月9日发表的声明也是在该框架中被认知的。拉夫罗夫提及，如果格鲁吉亚能谨慎处理其与本国少数民族的关系，势将更有利于格鲁吉亚。“这包括亚美尼亚族、阿塞拜疆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拉夫罗夫如是说。<sup>⑤</sup>

格鲁吉亚外交部在格被占领土上的政权发表“独立”宣言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时发表特别声明。据此声明，在苏联解体和格鲁吉亚独立以来，俄罗斯刻意推行对格鲁吉亚的侵犯性政策，意在削弱、肢解格鲁吉亚，并最终使格鲁吉亚受控于俄罗斯联邦的新帝国野心。<sup>⑥</sup>

## 俄格关系的前景

格鲁吉亚因为俄罗斯联邦的挑衅性政策而与之疏离。回溯历史可以发现，21世纪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形势与18世纪末期所面临的情势颇为相似。彼时已遭削弱的

---

① 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 Десуверенизация Грузи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Грузии — роскошь, которую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себе позволить,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article21290.htm>

② Андрей Епифанц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краины Грузии. Условия распада, [http://www.eurasianhome.org/doc\\_files/epif.pdf](http://www.eurasianhome.org/doc_files/epif.pdf)

③ 萨梅格列罗，或称明格列尔，是格鲁吉亚西部历史久远的地方行政单位。——译者注。

④ Алексей Балиев, Алексей Морозов. Период полураспада.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кой Тбилиси начинают высказывать регионы Груз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8.25сентября.

⑤ <http://www.civil.ge/eng/article.php?id=22498&search=Lavrov>, 07.09.2010 拉夫罗夫说，“格鲁吉亚当局应该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包括奥塞梯族、阿布哈兹族以及其他民族，比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而不再是派遣使节前往世界各地、诽谤俄罗斯或者在国际组织中提出格鲁吉亚‘解除占领’的事宜。”

⑥ [http://www.mfa.gov.ge/index.php?lang\\_id=RUS&sec\\_id=30&info\\_id=12622](http://www.mfa.gov.ge/index.php?lang_id=RUS&sec_id=30&info_id=12622)

土耳其和伊朗都害怕俄的扩张，因此竭力介入格鲁吉亚来避免俄罗斯在该地区地位的强化，尽管结果却恰恰相反。由于卡特利—卡赫季王国（即东格鲁吉亚）的亲俄取向，伊朗对格发动致命一击。然而，这却加速了俄罗斯征服格鲁吉亚的进程，使得俄罗斯在整个南高加索取得了主导地位。

两个世纪后，俄罗斯发觉自身面临相似的处境。俄正在丧失其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并竭力去阻止这一进程，一个强大的格鲁吉亚在该地区的存在完全被俄罗斯排除在可能之外。尽管显而易见的是这并没有使俄恢复对格鲁吉亚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一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出现：莫斯科愤怒于格鲁吉亚的亲西方定位，但俄的政策却又在事实上增强了西方在该地区的地位。

下列情形有可能出现：俄罗斯以破坏与格鲁吉亚的关系为代价，继续承认格鲁吉亚分离政权的“独立”。相应地，格鲁吉亚也不会放弃其亲西方定位，并努力敦促俄方承认对其领土的占领。

（张红译，杨成校）

---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the post-soviet Georgian-Russian relations wa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existing attitude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Russian political circles towards Georgia. The thoughts and ideas of Russian geo-politicians have been shaping Russian policies for a long period mainly through keeping Georgia from approaching the West, splitting Georgia in order to eventually eliminate barriers against Russia in the South Caucasus region. For Georgia, it has been sticking to the goal for restoration of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spite of i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t different times. Russia and Georgia's different orientation led to metamorphosis of their relations and the conflict in 2008 as well. Even worse is that this conflict has not changed either Russia or Georgia's position but instead strengthened their own inherent aims.

**【Key Words】** Georgian-Russian Relations, Russia, Geo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в основном определя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Гру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его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кругов.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мышления и концепц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еополитиков, чьими главными идеями было сдерживание сближения Грузии с Западом, раскол Грузи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убрать вс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дл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уз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нятие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воей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оставалось и остаётся непоколебимой цель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нятий в России и Грузии привело к ухудш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и к конфликту 2008 г. Более того, да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рузией не изменил позиций ни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а наоборо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 укреплению 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цел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

(责任编辑 常喆)

## 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 ——评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

罗伊·埃里森\*\*

**【内容提要】**对于2008年的俄格战争，俄罗斯从法律和规范的角度，为自身的行为提出了辩解。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更大的政治动机：即俄罗斯想利用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转型期和自身实力上升的机会，挑战现有的国际规范，从而为自己在未来的行动，特别是在独联体地区的行动，创造有利的条件。然而，俄罗斯的这些辩辞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共识，相反其言行反而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担心，从而使得其挑战西方主导的秩序更加困难。

**【关键词】**俄格战争 辩辞 法律 规范

**【中图分类号】** D068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2-0081-(13)

对决策者而言，2008年的俄格战争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是否降低了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大规模使用武力的门槛？是否表明俄罗斯在推进地区政策中，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重新找到了自信？俄罗斯在维护其“特权利益”方面，是否必然寻求对其主导的独联体范围内的“地区国际社会”（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的承认？俄罗斯重新极力强调保护其“公民”的做法，是否表示俄在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上采取强制外交？

在短短两年里，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得出充分的、学术性的结论为时尚早；甚至有人会质疑以上这些问题本身是否存在。但通过考察俄罗斯官方对战争的话语，

\*本文系作者向2010年7月26-3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世界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发表。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 罗伊·埃里森（Roy Alliso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们可以悟出一些道理。俄罗斯力图证明其侵犯行为正当性的法律立场、人道主义诉求和政治修辞本身，都不能明确表明俄领导人使用武力的核心动机。然而，为了证明莫斯科的军事行动在法律、规范和政治上（硬实力运用的外交手腕）都属正当之举，俄领导和官员提出了一些论点。而这些论点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视角，去洞察俄罗斯对其边界之外（至少在相邻的独联体地区）使用武力的行为。<sup>①</sup>

本文首先评估俄罗斯用哪些惯用的国际法，来证明干涉的正当性和可信性；进而分析俄罗斯的规范性辩辞（这些辩辞并非像法律那样完备），和这些法律主张的可信性；本文还特别关注俄罗斯超越于格鲁吉亚主权原则之上的、对于自决和“补救性分离”（remedial secession）的强调。

本文认为俄罗斯一直在挑战既有的法律诠释，并致力于提出有关合法使用武力的规范。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做法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即莫斯科相信，可以在独联体地区秩序中选择性地运用法律规范以维护利益，并且也希望自己的解释能获得某种承认。这种对法律和规范挑战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俄罗斯的一个更广泛的、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努力（这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试图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一种努力）。

## 一、俄罗斯的法律辩辞（Russian legal arguments）

俄罗斯外交官已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辩辞，以努力标榜俄最初在南奥塞梯的军事侵犯具有合法性，并进一步证明后来在格鲁吉亚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也是正当之举。其核心法律主张围绕着自卫权展开。然而如下所述，这些辩辞不仅不能适用于领土防卫，在保卫俄罗斯人员/公民方面的适用性也相当薄弱。

### 辩辞一：格鲁吉亚“侵略”南奥塞梯就是“进攻俄罗斯”

俄罗斯坚持“我们首先遭到攻击”的说法，并援引 1974 年联合国大会 3314 号决议对侵略行为的定义。<sup>②</sup>莫斯科引述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官员的观点，声称格鲁吉亚已制订了类似入侵阿布哈兹的详细计划，但是第比利斯强烈否认这一点。

在这个层面上，争论直接围绕着在南奥塞梯的军事行动上，即是谁先采取敌意行动而展开。俄罗斯声称，总体而言是格鲁吉亚“侵略”南奥塞梯。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为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或其他形式的作战行动提供法律基础，因为俄罗斯本

---

<sup>①</sup> 在国际关系中，关于武力使用的法律和规范是一个庞大的、有争议的论题。一本有关国际法和武力使用的手册提出了衡量标准，我们在本文中也据此来评估俄罗斯官方提出的一些论断，参见 Christine Gr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②</sup> 参见梅德韦杰夫总统在表彰俄罗斯军人的仪式上的讲话，8 August 2009, Vladikavkaz, in <http://www.kremlin.ru/eng/text/speeches.2009/08/08/1845>

土并未受到攻击。格鲁吉亚攻击茨欣瓦利是否构成侵略（即便假定俄罗斯“侵略”在先的有力证据没有找到），也不能改变这一点。<sup>①</sup>由于南奥塞梯这个实体从未真正被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统治过，所以格鲁吉亚进犯的政治合理性也是有疑问的。<sup>②</sup>尽管这会引发关于格鲁吉亚行动的更深层的疑问，但没有为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行动提供任何法律上的正当理由。

俄罗斯军事行动也无法按照国际法中有关“集体自卫”的立场来加以合法化。南奥塞梯当局不具备有效的权力，来邀请俄罗斯用军事手段提供支援。国际刑事法院认定，在当代国际法中，在别国内部为支持反对派而进行干涉的普遍权力是不存在的。南奥塞梯作为一个缺乏国家地位的实体，可以依靠单边自卫来抵御格鲁吉亚的攻击，但不允许联合俄罗斯进行集体自卫。<sup>③</sup>

实际上，在2008年8月以前，俄罗斯作为相对于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第三方国家，是应该对其卷入南奥塞梯事务的活动加以节制的，尽管该地区与俄接壤。但是俄罗斯的国家行为却忽略了这一点。多年来，俄罗斯广泛参与该地区的事务，表现在其安全人员在南奥塞梯行政部门中广泛存在，并为其境内的北奥塞梯“志愿者”和非正规军频繁越境到南奥塞梯提供便利。

## 辩辞二：保卫俄罗斯维和人员

俄罗斯提出了某种更强硬的自卫辩辞，即格鲁吉亚在茨欣瓦利的军事行动期间，攻击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的维和分队及其在南奥塞梯的“公民”。<sup>④</sup>莫斯科声称，格鲁吉亚在茨欣瓦利攻击俄维和人员，可以被理解成对俄罗斯的武装进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为俄罗斯此后的全面军事行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sup>⑤</sup>因为也可以提出，俄罗斯维和分队与南奥塞梯非正规军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勾结。

---

① 在后半部分的论述中，为格鲁吉亚行动辩护的人认为，禁止侵略性使用武力的国际规范把侵略看作是一个国家对抗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但南奥塞梯不能被视为国家，俄罗斯在干涉期间也不能称其为国家。南奥塞梯这块分离主义者的飞地，甚至不具备“类似国家”的特征。格鲁吉亚的行为只是中央政府采取强制军事行动对付分裂主义实体（尽管这包含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诸多问题——见下文）。当然，在广泛分析的基础上，欧盟真相调查委员会并不认同格鲁吉亚以其方式进攻城市茨欣瓦利的合法性。“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on the Conflict in Georgia”, Vol. II,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from <http://91.121.127.28/cejig/Report.html>[accessed 30 September 2009]

② 1991-1992年，第比利斯和南奥塞梯地方当局发生冲突，导致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其余地区的实际分离。有位俄罗斯专家说，他承认格鲁吉亚有国际法权力以军事手段打击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者，但他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关于主权、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普遍国际标准都不起作用、不足为信（暗指科索沃），这种权力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无限的。Georgy Bovy, “A black and white world”, *Russia Profile*, 20 August 2008.

③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p.280-283.

④ Russian letter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13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⑤ 格鲁吉亚称，进入茨欣瓦利的格鲁吉亚军队遭到了俄罗斯维和部队的攻击，他们不得不还击。对于这些不同的陈词，还没有对此进行独立考察的可信报告。参见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221.

武力保护以维和人员身份出现的俄罗斯军人，还可以被说成是仿效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类似做法。维和人员的自我防卫可以等同于军队在紧急状况下的自我防卫。除此之外的情况，如国际紧急援助（或许甚至包括存有争议的俄罗斯紧急援助）、或从外国领土上撤离维和人员（特别是快速的、有限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是需要有足够理由的。<sup>①</sup>但俄罗斯的行动理由不充分，比如，其实际的反应规模过度，把战事延伸到格鲁吉亚没有争议的领土上，无限制使用武力（即使有 10 名俄罗斯维和人员丧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仅有 2 名在格鲁吉亚起初进攻茨欣瓦利中丧生，且是在有争议的环境下丧生的）。相比之下，在其他地方，担负国际使命的许多维和人员在复杂的地区冲突中丧生，并没有招致其“母国”数万军队的直接干预。

### 辩辞三：保卫“俄罗斯公民”

俄罗斯的自卫声明，已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关注，即：“无论我国公民身处何方，其生命和尊严都会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加以保护”。莫斯科坚称有权使用武力保护其在南奥塞梯及以外的国外“公民”，并称“不让同胞白死”，这种声明是相当无限制的、和具有惩罚性的。<sup>②</sup>

这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声明，因为从法律上讲，攻击一个手持俄罗斯护照的人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俄罗斯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并不存在保护或救援一国在国外的公民这样明确的习惯法权利，而外交保护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国际社会所广泛公认的是，对一国国民遭到攻击后的反应，应当完全限于当地的、适当的救援范围之内。而超出这种使用武力的最低标准，即使是俄罗斯基于先前各国经验提出的政治理由，也都无法令人信服。

事实上，国家对居住在国外的公民只有有限的司法权限，如提供领事保护等。尽管一国可能会关注那些与他们有共同亲属关系或具有该国公民身份者的人权和福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享有国际法上权利，无论俄罗斯如何选择界定其宪法责任，也是如此。（俄）不能援引国内法来推卸国际法加于国家的责任。国际法并不支持莫斯科的基本论点，即威胁和侵犯一国公民的权利等同于对该国的“武装攻击”。<sup>③</sup>

在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条件下，更广泛的国家共同体有责任实施保护。这种新的国际规范正在出现，但这是另一回事（如后文所述）。

因为俄罗斯如此强硬地宣布保护国外公民的政治决心，所以南奥塞梯人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实质上，当一个国家首先在相当短

---

① 重要的是，适度性的要求“是一种阻碍报复或惩罚行动的屏障，即制裁或‘教训’攻击者”。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271.

② Statement by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8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③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p.285-288.

的时间内，把公民身份授予其边界之外的大批民众，并且没有得到这些民众所居住的合法国家的同意（正如俄罗斯在南奥塞梯所做的那样），便声称有权强行介入去保护他们，然后以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规定的“自卫权”来证明其正当性，实际上缺乏说服力。

对于那些只是最近才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按照宽泛的俄罗斯政策以一种简化的程序授予俄罗斯国籍——的公民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明显。关于这类居民，欧盟冲突真相调查团(EU fact-finding mission on the conflict)言辞犀利地总结道，“这是滥用需要保护之名作为干涉的理由，因为俄罗斯本身已经通过其政策为干涉创造了这个理由”。<sup>①</sup>换句话说，俄罗斯给生活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人普遍发放护照，其中大多数甚至不是俄罗斯裔，这是挂在俄罗斯声称的“保护权”（这种权利缺乏合法的基础）之上的一块遮羞布。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人们可以质疑，南奥塞梯的俄罗斯公民身份在国际法意义上是否有效——“货真价实的公民”是不是被俄罗斯捏造出来的？<sup>②</sup>国际法所认可的公民身份，是出于外交保护的目，而且只有在当事人与相关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真实、确切的联系时才有效，但这一点并不存在于南奥塞梯的俄罗斯“公民”案例中。如果赋予公民身份的目的，是去预先和间接证明武力保护一个无法被直接保护的对象的的话，问题就更大了。（由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非国家地位，俄罗斯不能声称这是对它们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自卫提出请求的回应。）

很显然，这些是俄罗斯的政治手段。某个国家或其所属地区的大多数公民拥有邻国的护照，此事非同寻常。而且，“护照化”（passportisation）政策，旨在授予那些与本国的确没有真实联系的他国公民以国籍，特别是如果该政策大规模实施，就像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它“首先违反了明确禁止域外集体归化（extraterritorial collective naturalisations）的规定，也违反了国际法的一些普遍原则”。<sup>③</sup>

#### 辩辞四：俄罗斯的维和授权

俄声称是按国际法律被授权对格鲁吉亚采取行动，而非进行一场俄格战争。为此，梅德韦杰夫总统把格鲁吉亚对茨欣瓦利的进攻，说成是“公然冒犯国际社会在

---

<sup>①</sup>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p.288-289.

<sup>②</sup> 从法律上对该问题进行全面审查的报告认为，2008 年 8 月俄罗斯与南奥塞梯之间的武装冲突爆发时，那些依据 1993 年格鲁吉亚公民法而获得格鲁吉亚公民资格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居民，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仍然是格鲁吉亚公民。该报告还指出，从国际法的视角，俄罗斯是不能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直接发放护照的（在格鲁吉亚许可的领事机构除外）。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p.182-183.

<sup>③</sup> Ibid, pp.167-171.

和平进程中对俄罗斯的授权”。<sup>①</sup>在南奥塞梯大规模部署俄罗斯第 58 集团军及其他部队的行动，被说成是“增援俄罗斯维和分队”。也就是说，俄罗斯并非是冲突方，而只是履行 1992 年 6 月的《索契协定》(Sochi[Dagomys] agreement) 规定的和平使命，该协定是为了解决 1991-1992 年发生在南奥塞梯的冲突而签署的。

因俄罗斯的攻击延伸到南奥塞梯之外，莫斯科为证明其正当性而声称：“俄罗斯的艰苦战斗，是以武力来实现和平的行动”。在这场行动中，“为了让军队能够正常行动，直接支持敌方作战的军事防卫设施必须予以中立化”。<sup>②</sup>俄罗斯所指的不仅是南奥塞梯，而且也指不存在争议的格鲁吉亚领土的“缓冲地带”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是在由国际授权的军队的临时监管之下的。

武力行动，包括在格鲁吉亚的激烈交战和纵深打击，这在任何维和行动中都备受质疑。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俄格签订的《索契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都限定了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的维和角色：即俄罗斯仅仅是联合维和部队中的一员，而并未获得扩大武力维和行动的授权。同时还规定，可以使用联合维和部队，但不是单方面（比如俄罗斯）的维和部队，更不用提其全副武装的正规军了。单一方面的行动，不能被视为维和行动。

《索契协定》的补充协议、备忘录和相关文件，都详细规定了该地区维和分队和军事观察员的权限。所涉及到的权限，主要是对小规模的、违反停火的行为加以反应和调查。有关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和平与秩序方面的一些含义不清的条款，并不包含以武力达到维和目的的全权委托。而自 2008 年 8 月以来，俄罗斯却一直坚持这一点。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点，《联合国宪章》第 103 条规定，不允许各国拥有比《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使用武力权利范围更大的权利，所以无论俄罗斯如何解释关于南奥塞梯联合维和部队角色的文本，也都不得超出此范围。<sup>③</sup>

## 二、俄罗斯的规范辩辞 (Russian normative arguments)

俄罗斯为其在格鲁吉亚军事行动辩护的一个难处，在于是否诉诸人道主义干涉的规范，并由此声称俄罗斯的行动反映了国际共识的原则。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

① “Statement on 8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statement by Russia’s envoy to the OSCE, Vladimir Voronkov”, *RIA Novosti news agency*, Moscow, 8 August 2008,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ormer Soviet Un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bbc.monitoringonline.com> (henceforth BBC) Mon FS1 FsuPol yy.

②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Grigory Karsin, 10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③ 在此，欧盟的报告支持了我的分析，它明确指出，维和使命“不能由重装‘援军’来加强或替代。更大规模使用武力违反了《索契协定》的精神，也违反了维和理念”。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Mission, Vol. II, p.276.

因为自 1999 年为反对北约打着人道主义旗号进行军事行动、在科索沃问题上打击塞尔维亚以来，莫斯科将这些新出现的规范斥之为外交伪装。俄罗斯还担心这些规范也适用于抨击俄罗斯同年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接下来的几年，俄罗斯几乎没有动摇其在主权问题上的“国家中心多元主义”（state-centred pluralist approach），也没有动摇其对人道主义所推动的域外责任（extraterritorial responsibilities）观念的怀疑。2003 年后，俄罗斯领导人把人道主义干涉和受西方支持的独联体国家中的“颜色革命”（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联系在一起，因为促进人权是这些政治剧变的价值取向之一。

到头来，俄罗斯决定把南奥塞梯的“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一张王牌，去说服其他国家承认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正义性。而且，俄领导人把在南奥塞梯“人道主义”行动的目标，确定为俄罗斯“公民”，如此来动员和取得俄罗斯国内民众对在边界外采取强硬行动的广泛支持（虽然在南奥塞梯的俄罗斯人的处境并不差）。事实上，对俄罗斯国内的民众而言几乎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莫斯科发现，只要强调“为保卫俄罗斯公民而反侵略”就足够了，就能在俄罗斯国内赢得人心。

#### 辩辞一：“种族灭绝”和人道主义

2008 年 8 月，对于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的行动，俄罗斯在其法律主张上加上了一个人道主义辩白。为了唤起人们对巴尔干种族清洗的印象，俄罗斯领导人明确把格鲁吉亚的侵略与“种族灭绝”结合起来。这个术语在危机之初由普京提出，此后得到俄罗斯官员和政客的多次重申。随着这个非常严肃的指责带来的紧张气氛的加剧，俄罗斯官员指出，他们的使命首先是阻止一场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次是拯救那些俄罗斯有义务拯救的人。<sup>①</sup>莫斯科指责格鲁吉亚一系列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俄罗斯重复了 20 世纪 90 年代干涉巴尔干的理由。

俄罗斯的基本依据是，格鲁吉亚攻击茨欣瓦利导致了 2000 余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奥塞梯人，多数具有俄罗斯公民身份。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立即对此大加宣扬。然而到了 2009 年 12 月，官方记录死于冲突的南奥塞梯平民中的俄方人数已降至 162 人<sup>②</sup>，少于格鲁吉亚死亡的平民（约 228 人）。<sup>③</sup>俄罗斯从未解释，是如何得出这种高度敏感的、极端夸大的南奥塞梯平民伤亡的数字。这让人怀疑：它不是通过

---

① 拉夫罗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12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梅德韦杰夫与杜马议会党团领导人的会谈，11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② 2008 年 9 月中旬，南奥塞梯检察部门的调查证实，在格鲁吉亚的攻击中，（仅）有“500 多人”遇难，先前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询问了当地医生后表明，在茨欣瓦利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有 44 个平民死亡，不到 300 人受伤；Interfax news agency, 17 September 2008, BBC Mon FS1 MCU 170908 hb/yb; Kavkas-Press, Tbilisi, 14 August 2008, BBC Mon TCU 140808 ra/nk. 2008 年 12 月，俄罗斯检察部门的调查委员会“基于档案文件”的精确数据，报告称南奥塞梯平民只有 162 人死于军事冲突。Ekho Moskvyy radio, 23 December 2008, BBC Mon Alert FS1 231208 yk/oz.

③ 俄罗斯前政府官员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Andrey Illarionov）指出，俄罗斯对种族灭绝的调查显然被政治化了。Interview on Ekho Moskvyy news agency, 4 July 2009, BBC Mon FS1 FsuPol iz.



战争的烟云而传播的（起初是由普京提出的），而是作为一种蓄意的计谋来证明迅速大规模报复的正当性，以及被用来支持随后的政治目的（见下文）。<sup>①</sup>

尽管所公布的平民死亡人数大幅度减少了，但俄罗斯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委员会主席（Head of the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prosecutor's office）坚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格鲁吉亚当局的种族灭绝行为——以种族或民族为范围的、对于种族群体或民族的彻底毁灭。<sup>②</sup>俄罗斯已把 28 卷材料递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提请控告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至 2009 年夏天，数千份南奥塞梯居民的诉状也呈递给了国际刑事法院。<sup>③</sup>

如果说有关种族灭绝的指控在开始时构成了俄罗斯开战的部分借口，那么不久后，俄罗斯就以此来为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是独立于格鲁吉亚的国家的行为提供辩解。这些指控还有另一个目的：把萨卡什维利总统诋毁成一名“战犯”，从而使他无法在政坛立足，显然这是让人联想到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Milosevic）。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对萨卡什维利启动犯罪调查程序是不太可能的。奇怪的是，俄罗斯的立场似乎与其强烈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苏丹总统巴希尔（Omer al-Bashir）的种族灭绝的指控一事相矛盾。战争结束后一年，尽管已向国际刑事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俄罗斯还想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一种更偏向感情而非法律上的对第比利斯的指控。<sup>④</sup>

与俄罗斯声称格鲁吉亚实施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形成对比的，是那些确凿的证据：包括摧毁格鲁吉亚村庄（有卫星图像），以及南奥塞梯民兵强行驱赶数千名格鲁吉亚人。这些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军队进入南奥塞梯境内之后（有段时间甚至发生在格鲁吉亚腹地）。<sup>⑤</sup>奥塞梯领导层通过宣称格鲁吉亚制造了种族灭绝，以证明把格鲁吉亚平民驱逐出南奥塞梯行动的正当性。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详细报告强调，莫斯科没有尽到防止效忠于南奥塞梯的民兵进行杀戮、报复和严重践踏人权的义务。该报告也对格鲁吉亚在攻击茨欣瓦利时由武器系统造成的平民死亡

---

① 对俄罗斯诸多新闻报告中所使用的、针对“种族灭绝”的材料分析，参见 Yuliya Latynina in *Novaya gazeta*, 2 October 2008.

② Aleksanda Bastrykin in Interfax news agency report, 3 July 2009, BBC Mon Alert FS1 FsuPol gyl.

③ “Interview of Russ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Grigoriy Karasin”, *Rossiyskaya gazeta*, 4 August 2009, and for Interfax news agency, 4 August 2009, BBC Mon Alert FS1 FsuPol gyl.

④ 副外长卡拉辛（Karasin）说，南奥塞梯人一直认为格鲁吉亚人想灭绝他们的文化，“出于感情而非法律，他们有权反对第比利斯对少数民族和南奥塞梯人制定的种族灭绝政策”；“How Russia defines genocide down”, *New York Times*, 9 August 2009.

⑤ 卫星图片显示，南奥塞梯领土上的格鲁吉亚村庄不复存在了，在缓冲地带的格鲁吉亚村庄内发生了同样的“劫掠行为”，这些图片早在 2008 年 9 月 8 日刊于 *Novaya gazeta* 上，后来在 UNOSAT 的门户网站也能轻易找到。参见“Village damage summary: Kekhvi to Tskhinvali, South Ossetia, Georgia”, *UNOSAT*, 29 August, [http://unosat.web.cern.ch/unosat/freeproducts/Georgia/Russia\\_ConflictAug08/UNOSAT\\_GEO\\_Village\\_Damage\\_Summary\\_Tskhinvali\\_19aug08\\_Lowers.pdf](http://unosat.web.cern.ch/unosat/freeproducts/Georgia/Russia_ConflictAug08/UNOSAT_GEO_Village_Damage_Summary_Tskhinvali_19aug08_Lowers.pdf)

提出批评。其结语称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均在战争中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sup>①</sup>

## 辩辞二：“保护责任”

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下面的更为明确的规范主张表示怀疑。俄罗斯领导人声称同情南奥塞梯，这场正在降临的人道主义灾难迫使俄罗斯作出军事反应，因为俄罗斯宪法和法律使“我们不可推卸保护责任”。<sup>②</sup>在这里，俄罗斯诉诸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该责任得到联合国大会认可，并写进 2005 年世界首脑峰会文件中（World Summit Outcome Document），提议各国联合起来，保护大规模践踏人权或种族灭绝造成的可能的受害者。这项倡议明白无误地涉及到各国的国内管辖权限。甚至俄罗斯官员也以治外法权的术语来表达俄罗斯“作为和平与人道主义安全的有效捍卫者”的权利。<sup>③</sup>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实际上是由保护责任倡议所驱动，至少没有受到 2005 年各国所倡议的责任驱使。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南奥塞梯受到威胁的严重性和俄罗斯反应的适度性。虽然俄罗斯声称存在威胁，但没有证据能充分证明该地区存在着大规模暴行或紧迫、真实的威胁（这是保护责任倡议的合理防御标准）。而且，俄罗斯的干涉并没有确保对民众的人身保护，干预规模也大大超出了履行保护责任的需要。有关保护责任的适度性要求虽然未在 2005 年的峰会文件中得到明确规定，但这种要求是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相一致的。<sup>④</sup>

其次，并非像保护责任观念所期望的那样，俄罗斯对南奥塞梯的干涉实际上没有保护平民，而是保护“俄罗斯”国民。用拉夫罗夫（Lavrov）的话说，“无论我国公民身处何方，其生命和尊严都将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得到保护”。<sup>⑤</sup>俄罗斯驻北约代表更直言不讳：“使用武力保护我国公民，这是个原则问题”，虽然需要将其“纳入以拯救民众为目标的人道主义框架之中”。<sup>⑥</sup>俄罗斯的官员没有分清如下责任：国

---

① *Civilians in the Firing Line: The Georgia-Russia Conflict*,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ondon, 2008, especially pp.60-61.关于俄罗斯外交部的反应，参见 [www.mid.ru](http://www.mid.ru), 26 January 2009. 欧盟真相调查委员会支持大赦国际调查报告的重要结论（包括用来反对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进行种族清洗的重要证据），报告得出结论说，“没有证据证实对奥塞梯的种族灭绝”。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act-Finding Report, Vol. II, pp.430-431.

② Interview of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by BBC, 9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在联合国第 63 次大会上，拉夫罗夫再次援引这个原则，27 September 2008, <http://www.mid.ru>

③ Ibid., (Lavrov 9 August 2008); First Deputy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Andrey Denisov, Interfax news agency, 26 September 2008, BBC Mon FS1 MCU 260908 sw/er; Interview of Lavrov to Abkhaz magazine Apsny, <http://www.mid.ru> 5 February 2009.

④ “The Georgia-Russia Crisi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Background Note”, the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http://www.globair2p.org/pdf/related/GeorgiaRussia.pdf>.

⑤ Statement at press conference, 8 August 2008, <http://www.mid.ru>

⑥ Interview of Dmitriy Rogozin on Zvezda TV, Moscow, 12 August 2008, BBC Mon FS1 MCU 30808 im/js.

家在国界内保护其民众的责任与在国界外对民众负有的责任。

显然，“保护责任规范涉及到：一国在自己的国界内保护民众的责任，国际社会为协助该国保护其民众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当该国明显无法保护其国界内的民众时，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的责任”。保护责任规范并没有授权单个国家采取直接行动，以保护居住在自己国界之外的国民。保护责任规范的一位起草者观察到，保卫国民“一直是以往各种非人道主义干涉的根据”。<sup>①</sup>而且至关重要，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就没有任何基于保护责任之上的军事干涉的合法授权。俄罗斯进军南奥塞梯，后来进军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这些行动都缺乏授权。<sup>②</sup>鉴于俄罗斯领导人十分想把其军事行动与安理会授权联系起来，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 辩辞三：主权和分离：相争议的两个概念

在我们看来，对俄罗斯以上这些辩辞的一种解释是：它们只是反映了国家利益，表明为了政治和战略目的，把法律和规范话语当作工具来使用。因此，这可能是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应对没有先例的需要时的临时反应，以证明其对格鲁吉亚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正当性。然而，事情可能更为复杂，可能还包含着更大的野心：莫斯科可能正在挑战国际法对武力使用和主权含义的习惯性解释（至少是对于独联体地区的国家而言），也在其认为自身实力上升、并在周边出现机遇的时候，试图围绕着核心原则塑造对于此类行为的共识。

俄罗斯为其对格鲁吉亚干涉所作的辩辞，凸显了当前俄罗斯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的不确定性，至少在涉及相邻的小国时是如此。当俄罗斯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国家地位时，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加突出了。

莫斯科声称格鲁吉亚 1991 年的独立声明侵犯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自决权利（依据 1990 年 4 月关于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苏联法律），并且提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意志”是压倒一切的原则。2008 年 8 月 26 日，莫斯科承认这些地区的国家地位，赞同少数派关于领土完整的自决权（见下文）的解释。莫斯科指出，格鲁吉亚攻击茨欣瓦利本身破坏了本国的领土完整，迫使俄罗斯正式承认这些分离的地区。

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按照国际法，族裔群体或少数民族可以援用所谓的内部（防御性）自决权（这影响到国家秩序的安排）。另一方面，至少在原则上有一种共识：即这些群体并不享有外部（攻击性）自决权，这会导致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

---

① Gareth Evans, former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cited in “Russia’s reversal: where next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Financial Times*, 23-24 August 2008.

② 对俄罗斯“保护责任”借口的详细分析，见 “Russia vs Georgia: The Fallout”,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o. 195*, 22 August 2008, pp.28-29.

国家，即实现分离，因而侵犯到母国的领土完整。这两种权利的区分是必要的，事实也表明是合理的（尽管存在科索沃案例）：除了殖民的情形之外，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单方面分离出去的做法。

诚然，国际法学界的少数派反对这种主流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在涉及到大量违反人权的极端情况下（“补救性分离”），族裔群体应享有分离的权利。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国家机构是一个制造痛苦与恐怖的根源”。<sup>①</sup>然而，格鲁吉亚并非如此，尽管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南奥塞梯人有过痛苦的经历，据称也受到了压迫。

俄罗斯官员似乎试图诉诸诸如此类的补救性分离辩辞，频繁提及科索沃先例（尽管其“合法性较低”，因为莫斯科淡化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暴行，并拒绝承认科索沃）。<sup>②</sup>然而，那些承认科索沃的国家，不仅指出了适用于该案例的许多标准（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时并未提及这些标准），还把科索沃视作另类案例，而不作为先例，明确地排除了这一案例对国际法具有任何持久的、有约束力的影响。<sup>③</sup>莫斯科将会意识到，先例不能成为（变更）国际法的来源，先例只是预示了习惯法中新规则的出现，因此俄罗斯的方针更像是一个权宜之计，旨在证明其格鲁吉亚政策的正当性，也可能被更广泛地用于应对独联体邻国中的某些问题。

与主要的国家实践和法学界多数派相反，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了“体现人民意志的主权”（sovereignty as the will of the people）的构想，来证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有权选择分离的政治行为。在政治层面上，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对同样关注国内分离主义的主要周边国家——土耳其、伊朗、中国，以及独联体地区的亲密伙伴国，提出了挑战。梅德韦杰夫的构想还与俄罗斯自己对待车臣的政策、大概还有对其他北高加索自治共和国的政策相冲突。

### 三、结论与展望

多年来，莫斯科依靠对主权的多元解释，来诉诸国际法阻止或限制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干涉。然而在围绕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中，俄罗斯官员却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他们认为 2008 年 8 月对南奥塞梯的“果断行动”，增强了俄

---

① Heiko Krueger, “Implications of Kosovo,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for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duct of the community of states in current secession conflicts”,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 No.2, Spring 2009, <http://www.cria-online.org>. 文章第 128 页指出，反对观点的主张“只是个别人的推测，在理论或实践上没有被普遍承认”。

② 比如，俄罗斯的联合国代表 Vitaliy Churkin, cited by ITAR-TASS news agency, 7 August 2009, BBC Mon FS1 MCU 08089 ym. See Dmitri Medvedev also in *Financial Times*, 27 August 2008.

③ 事实上，无论对科索沃的承认是否合法，“都不能说科索沃事件中各国的行为，会在未来对分离主义者的国际权利有明确的影响”；Krueger, “Implications of Kosovo”, p.141.

罗斯“作为和平与人道主义安全的有效捍卫者”的声望。<sup>①</sup>俄罗斯外交官试图为格鲁吉亚战争建构一种法律和规范的案例，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选择法律资料上灵活处理，并努力在“保护责任”规范尚不完备的部分中发掘灰色地带。

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这种行为对主要大国而言并不罕见。大国对主权的坚持和解释是受利益驱使的，如果出于利益上的需要，规范也可以被践踏。<sup>②</sup>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领导人（如普京）关注的焦点，是国际体系中相对权力的变化，他们确信目前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所以俄罗斯的国家行为受到政治的驱使，并有选择地遵照和解释规范。这不奇怪。事实上，莫斯科把规范之争看成是国际政治权力转型期的表现（莫斯科认为这是对俄罗斯有利的转型期）。

俄罗斯干涉格鲁吉亚的案例表明，俄罗斯的打算是：如果自己不能用国际法律术语向国际民众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那么它依然有法律外衣的掩护，即把注意力转移到格鲁吉亚进军南奥塞梯的合法性之上，从而转移国际批评的重心。莫斯科不能单方面修正国际法律在武力使用、自决和承认国家独立等方面的标准，然而俄罗斯的官员似乎相信：他们的主张（尽管使用了法律语言）颇有魅力，特别是在关注平民保护方面，能被当作外交资源来使用。这种自信反映了一种信念：作为国际体系中独立的“一极”，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其产生了严重影响，俄罗斯仍应该尽力使用自身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还需要进一步去评估：这是否预示着俄罗斯将更加坚定地按照自身利益去解释和修正正在形成的、但尚未定型的关于武力使用的规范（或“防御性自卫”）？如果俄罗斯果真如此行事，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自己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应对与后苏联邻国之间的各种危机。俄罗斯将来也可能致力于使硬实力合法化，以确保自身的全球地位以及在独联体地区中的支配地位（包括已脱离独联体的格鲁吉亚）。

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一方面，在如何维持主权和国际秩序的问题上，俄罗斯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也可能重新出现一条不稳定的裂痕。另一方面，俄罗斯的邻国对格鲁吉亚战争和俄罗斯在该国支持分裂势力，也很担忧。因此，俄罗斯并不能与独联体国家或欧亚国家集团一道，就合法使用武力的法律和规范之事来挑战西方国家。

（李冠杰 译 潘兴明 校）

---

<sup>①</sup> Lavrov in interview to “Apsny”, Abkhaz magazine, 1 February 2009, BBC Mon FS1 FsuPol(akv)/osc.

<sup>②</sup> 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参见：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s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9, 228-231.

---

**【Abstract】** From a legal and normative point of view, Russia justifies its own actions for the 2008 Russia-Georgia conflict. Aiming at proving the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its ac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lso implying greater political motives, namely, Russia hopes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opportunity of its increasing power in order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future a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IS region. However, Russia's arguments will not get widely recognized but on the contrary its words and deeds will wor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challenge the West-led order.

**【Key Words】** Russia-Georgia Conflict, Argument, Law, Norm

**【Аннота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ойны 2008 год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рузией, Россия с правовой и нормативн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ла оправдания своих действи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 целью доказать их законность 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за этим скрывались больш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отивы: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своих целях перио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и увеличить шансы на увелич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бросить вызов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норма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ть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своих действий в будущем, особенно действий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НГ. Однако эти оправдания России не могут получить широ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а напротив эти заявления и поступки привели к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что дел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росить вызов руководимому Западом порядку ещё более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ы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ая война, оправдания, право, нормы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苏联·苏共

## 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 ——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

崔海智\*\*

**【内容提要】**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在战后同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战后美英经济政策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在这两份报告中，迈斯基对战后美英的经济政策以及苏美和苏英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苏联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构想，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构想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奉行的大国合作战略以及关于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的一些思考是一致的。

**【关键词】** 战后世界安排 经济重建 英国经济政策 美国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19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2-0094-(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对德战争的胜利，苏联领导人开始关注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1941年12月16日，在莫斯科与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进行会谈的时候，斯大林就明确阐述了他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轮廓。<sup>①</sup>1943年9月到11月，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停战问题委员会以及苏联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冷战起源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1）基金、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优秀博士生培养基金的资助。感谢沈志华先生对本文的写作提供的帮助。

\*\*崔海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博士生。

① М.М.Наринский.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8.

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领导的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对苏联造成损失的赔偿委员会，<sup>①</sup>来研究关于停战的问题和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直接领导之下，这些机构开展了积极的工作。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7月，葛罗米柯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1944年底到1945年初，李维诺夫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三份报告，即《关于同美国的关系》（1945年1月10日）、《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1944年11月15日）和《关于区域和势力范围问题》（1945年1月11日）。这些报告主要从维护苏联安全的角度，对战后世界安排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这些档案的相继解密，学者们对这些报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使得人们对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后期关于战后世界安排问题的构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sup>②</sup>

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在战后同英国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1942年5月，在莫洛托夫对英国进行访问期间，苏英两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其中除了对两国在战时进行合作的一些问题作出规定之外，还规定了两国要承担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的义务，包括相互给予经济援助。在希望战后与英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特别希望在战后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和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1943年10月，斯大林向来访的美国战时生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表示，苏联人民比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更热爱美国人民，苏联希望得到品质优良的美国产品，美苏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sup>③</sup>1944年7月21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商会主席约翰斯顿时又表示，苏联期待美国为战后苏联的经济恢复提供一些援助，包括向苏联提供矿山机械、筑路机械、制造设备、工厂设备、铁路设备等。<sup>④</sup>1945年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提出向苏联提供贷款的要求，贷款总金额为60亿美元，用于购买机器制造品和工业设备。<sup>⑤</sup>

---

①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 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72-673页；AVPRF, f. 06, op.6, p.16, d.166, l.9-10.转引自 Aleksei M. Filitov, “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p. 4.

② 关于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的成果见：Aleksei M. Filitov, “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pp. 3-22; Vladimir 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WHIP Working Paper, №.13, 1995.

③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4. С.380, 383.

④ Там же. С.141.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45, Vol. 5, pp. 942-947.



在世人看来，苏联领导人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学说，经常强调的是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即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么，在二战后期，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还要希望在战后同英美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并希望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呢？

这首先同苏联面临的艰巨的战后经济重建任务有关。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战后重建问题日益提上了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在战后同英美进行经济合作，特别是希望从美国获取巨额贷款，以便恢复和发展经济。正如迈斯基在1944年1月11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将依靠以下三个来源：（1）苏联自身的资源；（2）战争赔偿；（3）美英的经济援助。在迈斯基看来，战争赔偿即使实现最理想的方案，也只能补偿苏联因战争而遭受损失的一部分，而对于战后重建来说，美国和英国的援助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迈斯基建议应尽早着手同美国人和英国人就经济问题进行会谈，促使美国和英国（特别是美国）从对自己盟国的义务的认识出发，保证在战后5-10年内向苏联提供对其经济恢复至关重要的商品。<sup>①</sup>迈斯基关于在战后与英美发展经济关系的见解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兴趣。战后不久，受莫洛托夫的委托，迈斯基开始对战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分别于1945年11月1日和14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战后英国的经济政策》和《关于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

在《关于战后英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迈斯基首先对战后英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迈斯基认为，二战期间，英国被迫撤回了在国外的投资，运费收入也由于美国的强大竞争而急剧下降，这导致了英国的“无形输出”急剧减少。为了保持贸易平衡，英国将不得不急剧减少贸易进口，增加贸易出口。这将导致英国更加积极地开展斗争，保持和扩大原有的市场，特别是保持和扩大英帝国的内部市场，防止美国的介入，并夺取新的市场。在对战后英苏经济关系进行的分析中，迈斯基认为，在战后苏英两国的贸易发展中将会存在两大障碍：一是英国难以向苏联提供贷款，二是关于英国对苏联发展贸易的形式问题。同时，迈斯基在报告中还指出了影响苏英贸易发展的政治因素，他认为，战后英国对苏政策有两个趋向：一个是以战时签署的英苏同盟条约为基础的趋向，另一个是推行“均势政策”的趋向，并且后者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这两种政策趋向，迈斯基认为，战后英国的对苏经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英国希望尽可能地发展英苏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出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考虑，英国将同苏联进行斗争，“就像双方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进行的激烈斗争一样”。但是，迈斯基认为，对影响苏英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的评

---

①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03-704页。

价不应过大，在他看来，苏英两国对于“发展贸易关系的兴趣最终仍然将使得矛盾因素的影响得以克服”。<sup>①</sup>

在《关于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迈斯基对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战后美苏、美英和美欧经济关系也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迈斯基认为，战后美国经济的特点是“经济过剩”。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实行对外经济扩张政策，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在国外的投资，并通过租借的形式，“用看似有理的借口以及华丽的词藻来掩盖自己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通过对战前美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重点进行的分析，迈斯基指出，战前，经济上对美国最为重要的地区是美洲大陆和欧洲。至于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重点，迈斯基认为，受国际局势的影响，欧洲的作用将会有所下降，而中国、东亚和拉美的作用将会明显上升。并且，迈斯基认为，美国的扩张会给英国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美英将在贸易、投资、空中和海洋等领域展开激烈的斗争。美英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在美欧经济关系问题上，迈斯基认为，美国首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贸易市场进行关注，为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将会反对西欧联盟的建立。尽管迈斯基认为，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政策会对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大国产生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他却认为，这些扩张不会影响到苏联，战后美苏能够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在迈斯基看来，“苏联和美国没有领土上的、经济上的、贸易上的、海洋上的、殖民地问题等方面的重大矛盾”，苏联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苏联市场对美国的工业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不远的将来，一旦爆发经济危机，苏联市场对美国的工业将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且，在美英存在经济矛盾的情况下，美国还更容易被说服处理好同苏联的贸易关系问题。苏联拥有良好的投资条件，美国希望在战后建立各种世界性的经济组织，没有苏联的参与，这些经济组织将不可能起到有效的作用。迈斯基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美国在战后同苏联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并且苏联可以从美国获得许多东西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尽管迈斯基也注意到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对战后美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但是，在他看来，“在战后的数年内，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还不至于紧张到不能发展正常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程度”，“有足够的客观条件为今后数年苏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保证”。<sup>②</sup>据此，迈斯基对战后苏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乐观的预测。

事实证明，迈斯基对战后苏美和苏英经济关系的预测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在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不仅苏美与苏英经济合作没能实现，而且美国逐渐同英国以及西欧其他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最终于1950年1月9

① АВПРФ.ф. 06.оп.7.пал.18.д.184.л. 22, 19,18.

② АВПРФ.ф.06.оп.7.пал.18.д.184.л.41, 58-59, 67-68, 64-67, 34, 27.

日成立了“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管制。“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揭开了两大阵营经济冷战的序幕。<sup>①</sup>而且，战后美英矛盾最终也没有像迈斯基所估计的那样发展。

尽管如此，迈斯基在这两份报告中就一些问题提出的看法事实上已是当时苏联国内的共识，并且这种看法对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上述两份报告中，迈斯基认为，美国和英国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是有利于战后苏美和苏英经济合作的因素。在《关于战后英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迈斯基的预测是，英国将在两年内爆发经济危机。而在《关于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尽管迈斯基认为，两年之内美国可能不会爆发经济危机，但他同时指出，经济危机将在“不远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市场将会对英国和美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迈斯基的这种认识也不是偶然的。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sup>②</sup>根据这种理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必然也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事实上，这种认识与战后苏联官方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认识也是一致的。战后初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经常发表一些关于美国很快将爆发经济危机的评论文章，并且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威胁正与日俱增，实际上已是各方一致的意见”。<sup>③</sup>正是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认识，才使苏联领导人比较易于相信能够从美英获取经济援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正因为如此，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之后，受外交部的委托，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在就这一计划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正濒临深刻的经济危机的边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处理掉其过剩物资，马歇尔计划对于美国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苏联可以从中获得利益。<sup>④</sup>这种认识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参加商讨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巴黎会议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在这两份报告中，迈斯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美国与英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领

---

① 详见崔海智：“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79页。

③ Правда// 1947. 25 июня.

④ АВПРФ.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9. инд.213. папка18. д.191. л.4-18. 转引自 Пихоя Р.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0. С.26.

域的矛盾，并且认为，这种矛盾的实质是他们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进行的斗争。根据这种矛盾，迈斯基认为，战后英美矛盾将会得到发展，并且，苏联外交要积极地利用这种矛盾。在迈斯基看来，战后英国要尽力保持原有的市场，而美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对外经济扩张，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并且，这些矛盾“最终将会年复一年地对英美关系带来越来越大的障碍”，“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代中，英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向仍将是相互竞争和斗争的不断加剧”。<sup>①</sup>应该说，迈斯基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的，<sup>②</sup>与苏联学者和领导人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一致的。1946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瓦尔加院士的文章的主旨，便是强调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并且作者认为，这些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引起的。<sup>③</sup>1946年9月4日，在与季米特洛夫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日丹诺夫也明确指出，英美之间的矛盾即将显现。<sup>④</sup>作为斯大林对外政策多年的执行者，即使在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仍然认为，苏联主要的对外政策，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够削弱积极反对我们的美国”。<sup>⑤</sup>苏联学者和领导人得出的西方国家之间、特别是美英之间存在矛盾的结论，深刻地揭示了分析苏联对外政策时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实形势决定了苏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采取利用现有的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外交手段，<sup>⑥</sup>其中包括利用美英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同他们发展经济关系，特别是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不仅如此，迈斯基在上述报告中提出的同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看法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奉行的大国合作战略也是一致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新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使苏联与英美的关系迅速得到了改善。与盟国进行合作，不仅是取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维护苏联战后安全利益的最佳选择。

---

① АВПРФ.ф.06.оп.7.пал.18.д.184.л.58.л.60.

② 这种理论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489页。

③ Ra'anan.G.D.*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 Factional Debates during the Zhdanovschchina*, Hamden, 1983, p. 62.

④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⑤ ЦХСД.ф.2.оп.1.д.143.л.19-20.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угроза” НАТО в оценках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Под ред. И.В.Гайдука,Н.И.Егорова,А.О.Чубарьяна.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С.57.

⑥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Под ред. Г.М. Адибеков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Текст]: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 РОССПЭН, 1998.С.34.

因此，二战后期，苏联领导人尽力维持与盟国的关系。为此，他们解散了共产国际，并通过 1943-1945 年与盟国进行的一系列协商，逐步确立起了雅尔塔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使得苏联最为重要的地缘利益，特别是在东欧和远东的主要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因此，虽然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在关于战后安排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与西方盟国保持合作，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以维护苏联的既得利益，仍然是苏联外交的最佳选择。因此，苏联领导人逐渐确立了在战后同西方大国保持合作的大国合作战略。而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正是苏联领导人实行这一战略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领导人选择了在战后与美英保持合作的大国合作战略，尽管他们强调两种制度能够“友好竞赛”，希望与美英在战后进行经济合作，并获取经济援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与美英的合作能够长久持续下去。作为一名务实的政治家，斯大林是不相信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能够长久地和平相处的。1945 年 1 月，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已经预见到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他说：“在把资本家分化为两个派别——法西斯和民主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暴露出来。我们之所以同民主派结成同盟，是因为民主派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种残暴的统治会把工人阶级推向极端，以至于推翻资本主义。目前，我们同其中一派结盟来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就会反对剩下的另一派。”<sup>①</sup>1945 年的秋天，斯大林就警告自己的战友：与西方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战后“缓和”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sup>②</sup>但是，为了实现苏联的安全战略，为了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壮大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时避免一个反苏集团的出现，同西方盟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建立和维持一个有利于苏联的战后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莫洛托夫后来回忆所说，保持这种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sup>③</sup>

在战后与美英保持合作关系，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关系，不仅仅是维护苏联安全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与苏联领导人对战后世界局势以及对苏联经济重建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在对战后世界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根据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理论强调，形势发展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各国革命非常有利，但苏联国力尚

---

①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С. 16-29, 17.

② 见：1946 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就对外政策问题来往的信函，Печатнов В. На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мы ломаем их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е упорство...// Источник. 1999. №3. С. 92-104.

③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第 77 页。

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发动对苏联的袭击或武装干涉仍然可能发生，所以苏联必须加紧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尽量推迟战争，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正如他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所说：“我们不能忘记列宁的话，他说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推迟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资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的时候。”<sup>①</sup>因此，苏联共产党在宣告苏联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时强调，必须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而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保障世界革命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世界的和平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sup>②</sup>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任务，斯大林在同外国人士进行的谈话和接受的访问中不断声称苏联寻求继续和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妨碍苏联与西方国家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两种制度能够“友好竞赛”，并多次表示了愿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希望从美国获取经济援助的愿望。<sup>③</sup>1947年4月15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进行会谈的时候讨论了苏美关系面临的一些障碍，其中斯大林再次提出了关于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就曾向苏联政府询问，战后苏联需要什么形式的贷款，美国应该为苏联分配多少订货。这是1945年1月的时候加里曼向我们询问的。苏联政府提交的备忘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答复，其中指出，如果可能并且条件合适的话，苏联政府希望从美国得到30—60亿美元的贷款或者更多的贷款。但是，两年过去了，苏联政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答复。”<sup>④</sup>在得到正式的邀请之后，苏联政府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商讨马歇尔援助计划。只是在了解了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实质之后，苏联才拒绝了这一计划。因为“苏联代表团洞悉了美国的这一企图：它只是企图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将美国自己的方案强加给欧洲国家，美国希望以此将自己的战争剩余物资随心所欲地倾销到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46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ПСС.Т.5.Кн.2.М.,1980.С.63.转引自：Нежинский Л.Н., Чельшев И.А. О 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 1.С. 6.

③ 关于斯大林类似的谈话，见1946年9月17日在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的讲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6—478页）；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与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斯大林文选》，第484—487页）；1947年4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史塔生时的谈话（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徐先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④ АВПРФ.ф.06.оп.9.пор.71.д.1104.л.29-39;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Россия. X 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 МФД, 2004.С.286.

欧洲，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依附美国利益而存在”。<sup>①</sup>由此可见，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同他们对战后苏联经济重建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考虑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为苏联战后的经济重建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尽力从西方国家获取经济援助，但不会为此允许西方国家干涉苏联的内政。

因此，迈斯基在这两份报告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当时苏联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他们基于这种认识在关于苏联战后经济重建问题上的一些思考。这两份报告对于我们了解战后初期苏联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的构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然而，在目前研究冷战起源以及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学者中，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迈斯基提交的这两份报告。<sup>②</sup>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曾提到过这些报告，但在其相关的学术成果中缺乏对报告内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和研究。<sup>③</sup>显然，这两份报告的学术价值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现把这些两份档案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sup>④</sup>

## 附件（一）战后英国的经济政策<sup>⑤</sup>

### 七、英国和苏联

英国和苏联经济关系的特点众所周知：一方面，英国非常希望最大限度地发展英苏贸易；另一方面，英国人把苏联看作是自己在东欧地区强大的竞争对手，认为

---

① ЦГАБКП（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国家档案馆）.ф.146-6.оп.4.а.е.639.л.1-3.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8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资料室藏。

② 如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Melvyn P. Leffler,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Печатнов В.О. От союза-к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5-1947 гг. Москва: МИД РФ, 2006;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③ 见 Vladislav M. Zubok, *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④ 这两份档案都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本文依据沈志华教授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带回的俄文复印件翻译。

⑤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所藏档案中缺少报告的前半部分。此部分翻译经施海杰校对，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译者注。

苏联在企图积极地把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从东欧排挤出去。因此，可以预料，今后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将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对发展苏英贸易的兴趣最终仍然将使得矛盾因素的影响得以克服。*<sup>①</sup>关于这一点有足够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述，英国现在极其需要扩大自己的出口。战前，英国实业界对苏联市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苏联市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战后，苏联市场的作用自然还将增长。在广大的英国无产阶级看来，苏联市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可以预料，两年之后就会产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苏联自然不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世界市场全面萧条的情况下，苏联市场的作用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出于上述考虑，尽管英国与苏联在东欧或其他地区将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摩擦，但是英国无疑将会尽力发展同苏联的贸易。而这种征兆现在已经有了：10月22日英国贸易部长科尔姆普斯（Крмпс）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希望发展英苏贸易，英国政府愿意同苏联进行谈判，制订两国发展贸易的基础。（塔斯社，1945年10月22日，第54页）

但是，在发展英苏贸易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障碍。

首先，英国难以向苏联提供贷款，而这一点则是他们完全应该考虑的。

其次，英国或许希望改变同苏联发展贸易的形式。以前，苏联只通过商务代表处这一机构同英国进行贸易。但是，英国的对苏贸易却是通过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单独的私人贸易公司进行的，这些私人贸易公司相互之间经常进行着竞争。这样对苏联有利，但却不利于英国。因此，早在战前，英国就试图设立与苏联的商务代表处相对应的机构，并只通过这一机构同苏联进行贸易。但是他们的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战时，英国人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所有的对苏贸易几乎都是通过“联合王国贸易公司”和保障部进行的。可以预料，今后在同苏联举行的贸易谈判中，英国将会坚持保留这种贸易形式，对英国的对苏贸易进行集中的领导。

这两个障碍怎么解决，以后将会知晓。

## 八、政治因素

尽管我的任务是阐述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终，我认为需要简要地谈论一下同两国的经济问题有关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政治因素。

主要的问题在于，英国的政策经常在两种趋向之间进行斗争：一种趋向是坚持

---

<sup>①</sup> 文中的斜体字是原档案中用下划线强调的部分，下同。



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其核心是为期 20 年的英苏条约；另一趋向是遵循“旧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主旨就是对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战时当然是第一种趋向占据优势地位，尽管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战后，第二种趋向开始积极地表现出来，并企图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也得到了像贝文这一类极其仇视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人的强烈支持。要说明这一点，仅举以下的例子就足够了：1942 年以前，贝文一直“在原则上”拒绝到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去，尽管其他的工党领袖和工会领袖（阿特里、马尔利松、道通、拉斯基、戈林乌特、亚历山大、奥伊特林等）经常访问苏联大使馆，并且把我们向他们发出的任何邀请都看作是一份荣耀。只是在 1942 年 11 月 7 日，在苏联 25 周年国庆纪念日，当时担任劳动部长的贝文才第一次跨进苏联大使馆的大门，因为，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很难不前来参加由我在当天举办的盛大的招待会。但是，贝文在我们大使馆只呆了 15-20 分钟就匆匆离开了。

“均势政策”的实质一般在于：英国要反对欧洲大陆上那个过于强大的国家。二战后，德国被摧毁了，法国成了一个二流的大国，现在欧洲大陆上唯一强大的国家是苏联，而且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英国的反动派们现在企图破坏苏联，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

因此，英国将会反对苏联在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影响力的增长。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建立西方集团的计划。因此，在德国，他们就企图挽救所能挽救的一切，其中包括挽救德国的工业。因此，他们就采取了一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和怀疑苏联的行为，这些行为或大或小。

顺便说一句，对这些政治因素的意义的意义的评价不应过高，它们只会加剧上述经济趋向的发展。

## 九、总结

1、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尽管英国一直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英国的贸易通常都能保持良好的结算平衡，这是英国的货币保持稳定的基础。这种良好的结算平衡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英国有大量的“无形输出”，其主要形式就是运费收入和从国外的投资中得到的收入。

2、二战期间英国被迫撤回了在国外的投资，运费收入也由于战后美国的强大竞争而下降（现在美国的贸易船只是英国的 2 倍多）。因此，现在英国的“无形输出”应该会急剧减少。而为了保持自己预算的平衡，英国将不得不急剧减少贸易进口，增加贸易出口。

3、这一方面会导致英国人生活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会使英国更加积极开展

斗争，扩大原有的市场，并夺取新的市场。英帝国内部贸易市场在战时占了英国对外贸易的 50%，因此英国首先将坚守这些市场，防止任何一方（特别是美国）的介入。

4、欧洲市场（包括欧洲大国的殖民地）占据了第二重要的地位。战时，这一市场占据了英国对外贸易的 33%。因为欧洲市场在战时是极为混乱的，英国将会努力采取各种手段尽快恢复欧洲市场。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同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荷兰签署了货币协议。因此，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他们就提出了试图恢复德国工业的“西欧条约”草案。因此，英国反对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强制迁出德国人，并努力建立各种协调中心，对欧洲的经济进行协调（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煤钢联盟、欧洲铁路运输委员会等）。

5、从英国对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贸易和投资的实际数据来看，对于同这些地区发展贸易，英国的兴趣不大。英国之所以坚持在这些地区的立场，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考虑。

6、英国对苏经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英国希望尽可能地发展英苏贸易，另一方面，同苏联进行斗争，就像双方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进行的激烈竞争一样。但是第一种趋向将会占据优势。发展英苏贸易的主要障碍将仍然是关于苏联获得贷款的问题，苏联完全有权得到这些贷款。

7、现在英国对外政策的两种趋向仍然在进行斗争，一种趋向是以英苏 1942 年签署的条约为体现的“新的”对外政策，另一种趋向是在欧洲大陆继续实行“旧的”“均势政策”。战时第一种政策趋向占据主导地位，战后第二种政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贝文的支持）开始积极表现出来并企图占据优势。因此，英国将会反对苏联在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影响力的增长。这些政治因素对战后英国将要实行的总的经济政策产生着影响，并且还将继续产生影响。

迈斯基

1945 年 10 月 31 日<sup>①</sup>

## 附件（二） 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

完全准确地确定美国在战后时期主要的经济政策，并不比完全准确地确定英国在战后时期主要的经济政策容易。其中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在这一领域，许多问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对许多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

---

<sup>①</sup> 该份档案原件出处为：АВПРФ.ф.06.оп.7.палка.18.д.184.л.18-24.——译者注。

讨论。稍后他们将会在实践中作出结论，而现在，在确定自己的立场之前，各派的立场都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然而，现在就开始呈现出一些趋向，并且这些趋向可能在美国今后几年的经济政策中占据统治地位。为了便于了解美国的局势，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决定美国过去经济发展和现今经济状况的一些主要因素。

## 一、美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美国经济的主要因素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1、英国经济的发展过于单方面地依赖农业的发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国民经济的特点是：所有经济部门的发展都比较均衡。尽管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占据了75%的份额，而农业产值只占据25%的份额，但是美国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谷物、肉类、食用油、牛奶），而且还可以向国外出口大量的粮食。

2、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而快速增加的人口，不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美国农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美国建立起强大的国内市场，为美国工业的增长提供基础。二战前国外市场在美国经济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战前美国的出口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超过7-8%，进口所占的份额不超过5-6%。然而，进出口在英国的国民收入中则占到25-30%的份额。

3、美国的对外贸易至今仍然保持良性的平衡：商品的出口额通常都要远远高于商品的进口额。因此在美国不存在预算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对英国来说却很重要。

4、最后，依赖国内资源，美国在最近25-30年里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使美国在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之外，仍然可以向其他的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

以上列举的因素都反映了美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美国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而要选择道路。

## 二、美国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

战后，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需求不足”，与英国相比，美国面临的问题则是“经济过剩”。美国的经济过剩在战前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举出如下一些数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战前，美国生产的产品占世界总产品的1/3（在最繁荣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0%）。1938年决不能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特别好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61%，煤的产量占29%，生铁占24%，钢材占27%，发电量占29%，

汽车生产占 63%等等。此外，在这一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相当于世界黄金储备的 59%，而美国铁路的长度相当于世界铁路总长度的 40%。而此时美国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 6%。<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今后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证明美国经济的这一发展进程，把 1929 年和 1943 年的一些数据作一些比较就足够有说服力了。众所周知，1929 年是二战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发展的最高点（1929 年底开始爆发世界性的大危机）。另一方面，1943 年是战时美国经济发展的最高点，因为在 1944 年美国就首次出现了下降的征兆，而 1945 年这种下降的局面更加严重了。这样，如果把 1929 年和 1943 年的一些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工业生产的总指数（把 1935-1939 年的平均值作为 100）在 1929 年的时候是 110，而到 1943 年则是 239，也就是说，是美国过去经济发展的最高点的 2 倍多。*<sup>②</sup>

美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领域的发展指数如下：

	1929 年	1943 年	
煤（百万吨）	609	650	增长 7%
石油（百万吨）	130	193	增长 48%
生铁（百万吨）	43.3	60.8	增长 40%
钢铁（百万吨）	75.3	88.8	增长 55%

证明美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另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的对外贸易。诚然，同 1929 年相比，1943 年美国的进口有了一定的下降（分别为 41 亿美元和 39 亿美元），但是出口却有了很大的增长（从 51 亿美元增长到 143 亿美元），增长了将近 3 倍，这是由于所有的出口都是以租借的形式对盟国进行的。但是，这些出口的数据证明，战时美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这一点也可以由一些最为重要的军事工业部门——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和运输工具的生产指数的增长得到证明（如果 1935-1939 年的指数为 100 的话，现在的指数则分别为 312、431 和 709）。在运输工具的生产中，船舶制造业的生产占据了首要位置。<sup>③</sup>

最后，美国黄金储备的规模为：1929 年的储备为 43 亿美元，而 1943 年的储备则达到 219 亿美元，几乎占全世界黄金储备的 70%。<sup>④</sup>

上述所举数据非常具有代表性。早在战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即使是在很好

---

① 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9/40, *The World Almanac 1945*, New York, 1945. 译文中的注释除标明为译者所注的之外，均为原档案中引用注释。

②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Washington, July, 1945.

③ *Ibid.*

④ 数据来自 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0/1931, *The World Almanac 1945* and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的条件下——尚不足以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主要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经常还要遭受失业和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但是，由于战时美国生产力的扩大，这种现象现在少多了。以上列举的数据完全证明，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广阔的领域内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现在由于另外一些政治、军事和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还将加强。由于胜利而得意忘形，拥有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认识到自己在经济上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在战争中的损失要比美国多得多），目前还没有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下一场经济危机在两年之内可能不会到来），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非常傲慢，过于自信，使得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侵略性。而且，在罗斯福去世之后上台的美国领导人显得比罗斯福及其周围的人更加浅薄、保守和没有远见。

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将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将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在领土上的扩张。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指出，美国正在追求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各种（陆海空）军事基地。（见附件3）<sup>①</sup>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形式将是金融和经济的扩张，也就是说要将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将会采取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的手段来加强这种控制。他们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把他们进行这种扩张的界限预先确定下来。只有在遭受足够强烈的抵制和反抗之后，美国才会有一些地方停止扩张。

### 三、把租借作为扩张的手段

当然，美国会用看似有理的借口以及华丽的词藻来掩盖自己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在这方面罗斯福在1941年开始推行的租借援助政策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根据杜鲁门1945年8月30日给国会的咨文，在租借援助期间（也就是从1941年3月11日到1945年8月21日），美国向盟国租借的武器、物资和食品价值总额达到了430亿美元，其中290亿美元的物资租借给了英帝国（其中135亿美元物资租借给了宗主国），91亿美元的物资租借给了苏联，大约50亿美元的物资分配给了其他国家。而根据美国政府的计算，在战时美国从盟国得到了56亿美元的物资，作为对租借物资的补偿。最终，美国向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值大约为380亿美元。（塔斯社，1945年8月31日）

---

①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附件。——译者注。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关于美国如何收回租借物资的问题就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美国非官方的舆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希望讨论这一问题，并且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官方暂时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直到德国和日本被最终击败之后，美国总统和美国的部长们才谈论这个问题。

因此，1945年8月21日，国务卿伯恩斯（Бэрнс）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正在全力建立和扩大世界经济，其基础是自由原则、个体主动原则、无歧视原则和无贸易壁垒原则。我们赋予这一任务如此重要的意义，是源于我们如下坚定的信念：持久的和平不可能建立在封闭性的贸易集团、贸易歧视政策、贸易保护、独裁和经济战的基础之上”。（塔斯社，1945年8月22日，第46页）

两周之后，杜鲁门在9月5日送交国会的咨文中，在谈到关于结束租借援助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盟国不可能用美元偿还我们租借给他们的物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偿还租借物资的所有义务都被免除。我们应该根据租借援助法以及最近同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中所规定的程序，努力调节我们在战时建立在租借援助基础上的关系，以便建立健康的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和平，加强美国的安全”。

为了搞清楚杜鲁门的上述声明，就必须注意到租借援助法以及在战争期间同其他盟国签署的协议的第七条款所规定的程序。第七条款规定，接受租借援助的国家以及美国都有义务在内外政策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扩大生产，有效利用劳动力以及扩大商品交换与需求。（见附件4<sup>①</sup>）

稍后，杜鲁门在10月26日所提出的著名的十二项对外政策条款的第八项中，确定了美国经济目标的实质：“我们认为，各个盟国都应拥有平等的进行贸易的权利和获取世界资源的权利”。（《真理报》，1945年10月28日）

美国报纸上发表的许多言论以及美国实业界的代表就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发表的言论，都完全符合杜鲁门的上述声明。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民族工业家协会主席罗伯特·盖罗德（Роберт Гейлорд）1945年8月在前往伦敦的时候，在就恢复“国际贸易局”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声称：“大西洋宪章和原子弹使得关于人类在经济上进行和解的问题同关于使用武力消除国际混乱状态的问题一样重要”。<sup>②</sup>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租借援助的补偿问题，目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用华丽而朦胧的辞藻谈论关于保障平等、和平和全面繁荣的话题。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特别的例外。比如，前总统胡佛（Гувер）于1945年9月17日在芝加哥公开声称，

---

①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附件。——译者注。

② The British Export Gazette// август 1945г.С.45.

美国现在应该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金融优势，使其他国家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其中，胡佛反对现在就废除租借援助的债务，并且要求确定为期 5 年的延期归还债务期，在此期间，美国和盟国都可以平静地对待军事债务问题，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胡佛还坚持，在美国向盟国提供贷款的时候，要对盟国对这些贷款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督。胡佛说：“我们不能允许我们提供的资源用作军费，不能允许被用于非生产的目的，被用于偿还对第三国的债务，被用于资助那些旨在同我们在海外的企业进行竞争的尝试，或者被用于资助针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活动”。（塔斯社，9 月 18 日）

作为一名孤立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胡佛的观点当然与政府相距甚远。但是，不排除出于宣传的目的他有意要突出自己的地位。然而，也有这种可能：杜鲁门及其同事将会转而务实地采取一种较为虔诚的具体的做法，并在这种做法的掩饰下迅速地展示其进攻的锋芒。当第一次在实践中尝试着解决战后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时候，这一点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英美目前于华盛顿进行谈判的时候再次表现了出来。但是，在对这些谈判的实质进行详细的论述、对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总目标进行透视之前，必须简单地了解一下战前美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地缘分布情况。

#### 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

首先从对外投资谈起。

1940 年底，也就是在美国参战之前，美国对外长期投资（直接投资和持有证券投资）的总数突然达到了 106 亿美元（26 亿英镑），也就是大约相当于英国对外投资（36 亿英镑）的 70%。这些投资的地缘分布如下：

美洲大陆	76 亿美元
欧洲	21 亿美元
亚洲	6 亿美元
大洋洲	2 亿美元
其他国家	1 亿美元
共计：	106 亿美元

可见，美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地方是美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占对外投资总数的 72%。在美国对外投资中占据首位的国家是加拿大（37.78 亿美元），然后是西印度群岛，也就是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7.53 亿美元），接着是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国家（5.72 多亿美元），阿根廷（4 亿多美元）等等。美国在拉丁美洲的

投资总额达到 37.74 亿美元。

欧洲在美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据第二位，美国在该地区有 20 多亿美元的投资，接近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20%。亚洲和大洋洲占据相对次要的位置，大约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7%。非洲所占比重则完全微不足道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大约为 1.5 亿美元。（见附件 5<sup>①</sup>）

美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如果列举一下 1938 年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会看到如下情况：<sup>②</sup>

	出口 (百万/百分比)	进口 (百万/百分比)	共计 (百万/百分比)
北美	490/24%	740/24%	1230/25%
南美	263/14%	300/10%	563/11%
全美洲	756/38%	1040/34%	1793/36%
欧洲	567/29%	1326/43%	1893/37%
亚洲和大洋洲	586/30%	610/19%	1196/24%
非洲	55/3%	118/4%	173/3%
	1960/100%	3094/100%	5054/10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全部对外贸易的 37%（43%的对外出口）是同欧洲进行的，36%（34%的对外出口）是同美洲大陆进行的。24%（19%的对外出口）是同亚洲和大洋洲国家进行的，而余下的 3%（4%的对外出口）是与非洲进行的。

因此，*美国对外贸易的地缘分布和对外投资的地缘分布不完全一致*。在对外投资领域，美洲大陆无可争议地占据了第一位（占整个对外投资的 72%），但是在对外贸易领域它却占据了第二位（占美国整个对外贸易的 36%或者 1/3 稍多一点）。另一方面，只吸引了美国对外投资 20%的欧洲却占据了美国对外贸易的 37%，其中占据了美国对外贸易出口的 43%。亚洲和大洋洲在对外投资领域只处于附属的位置（占 7%），而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却占据了重要位置（占 24%）。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二战前，经济上对美国最为重要的地区是美洲大陆，其次是欧洲*。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美国在战后的扩张会和战前完全相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完全可以预料，美国现在的扩张将会和以前有所不同。比如，欧洲的作用会有所下降，而中国、东亚和拉美的作用将会明显上升。以后的事实将会证实这个推测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① 该附件没有找到。——译者注。

② *Statesman's Year Book*, 1940.



## 五、英美矛盾

在对战前美国在对外投资领域和对外贸易领域进行的扩张进行了描述之后，我将再次论述现在英美正在就经济和金融问题举行的谈判。

这次谈判的起因是这样的：1945年8月21日，美国未经事先声明，就突然废除了租借援助政策，这使得英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因为英国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购买所需的物资。因此，英国政府在9月初向华盛顿派遣了一个以著名经济学家及英国银行行长凯恩斯（Кейнс）为首的特别代表团，来解决英国面临的困难。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英美在9月11日开始的谈判包括金融问题、租借援助的补偿问题、贸易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剩余军事物资的分配问题。这次谈判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但仍未取得最终成果。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的讨论可以看出，双方的立场都非常有趣。根据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会谈中有如下内容：

英国人请求延长租借援助的期限，再提供数额为35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以补偿在租借援助前的战争初期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支出，这一支出的数额同35亿美元相当。

然后，英国人请求以一次性补助的形式，或者至少是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向英国提供为期30-50年的金融贷款。借款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总数为30-60亿美元。为了论证他们提出的要求，英国人指出，从拥有的资源与贡献应成正比的角度来说，英国对战争作出的贡献要大于美国，因此，英国有权要求取得上述的金融补偿。（见附件6<sup>①</sup>）

英国代表依据自己的立场声称，他们“不是向美国祈求，而是作为美国的盟国提出这些要求”。向他们提供帮助“不仅符合英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他们强调，如果在现在进行的谈判中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同美国进行合作的方法，那么，英国将不得不在所谓的英镑区集团内（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尽可能地发展贸易，这将意味着加强各种壁垒，在经济领域加强限制。（见哈利法克斯（Галифакс）广播电台9月22日播音，塔斯社，1945年9月24日，第5页）

伦敦媒体上的大量报道加强了英国人的这种官方立场，并且媒体上的立场比政府的立场还要强硬。比如，10月6日自由主义报刊《每日先驱报》（Дейли Геральд）就美国对英国提出的要求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对华盛顿说“不”》的非常激进的文章。比弗布鲁克勋爵（Лорд Бивербрук）以及丘吉尔内阁中负责印度事务的前部长艾

---

① 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附件。——译者注。

米利（Эмери）都持非常强硬的立场，并且威胁说，在华盛顿不让步的情况下将向美国发动一场经济战。（见附件 7）<sup>①</sup>同时，在伦敦的金融中心区以及议会里，都在广泛地讨论关于需要采取的各种措施，来对美国开展经济战，包括降低英镑的汇率（从现在的 1 英镑兑 4.03 美元降低到 3.70 美元），以便巩固英国出口的地位。

美国人答复英国人说，他们愿意向英国提供大量的金融援助，但是就此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美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而是有偿的，也就是美国向英国提供的不是补助，而是为期 40-50 年的贷款（宣称有 40-50 亿美元），利息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第二，从美国取得财政援助要同英国进行“经济自裁”联系起来。

美国人提出的“经济自裁”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英国采取措施，取消各种保护关税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宗主国和英帝国范围内实行的。

美国人首先给英国人的打击是要求废除由 1932 年的渥太华协议所确立的帝国特惠制（在英帝国成员内实行互惠）。美国人要求英国人废除这一制度，或者换句话说，要求确立无论是对英国、英帝国成员，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相同的条件。这一要求的意义非常简单：如果美国在英帝国市场支付像英帝国成员一样的税费，那么，由于自己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当然将会使英国这一竞争对手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然后，美国人要求英国减少对英帝国成员以及其他国家（阿根廷、法国、比利时、荷兰等）至少 50% 的英镑借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要求的意义，他们列举了如下具体例子：战争期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价值达 10 亿英镑的各种商品、物资、武器等。英国人用英镑现款支付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是使用英镑向印度打欠条的。因此，对于现在拥有的将近 10 亿英镑，印度人自然是希望在英镑区，也就是首先在英国国内，然后是在英帝国，最后在那些以英镑为导向的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花掉这笔钱。这样，英国对印度的英镑欠款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印度同英镑集团的国家进行商品交换，这样就会促进英帝国内部贸易的发展。英国对各国（包括帝国内部和帝国之外）的英镑借款共计 35-40 亿英镑，因此，美国人要求削减这笔借款，而且至少要削减一半。这是对英国对外贸易前景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最后，美国人坚持要对他们向英国人提供的贷款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且坚决反对英国通过某些国有或者半国有垄断性质的组织开展对外贸易的各种尝试。

在美国，媒体对官方立场的支持要更加强烈些，它们在这件事情上畅所欲言。比如，前不久《圣报》在报道华盛顿向英国人所提的建议的时候直接声称：“英国

---

<sup>①</sup> 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份附件。——译者注。

人将会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尾巴”。（《圣报》1945年9月11日）

当然，在美国报纸的一片喧嚣声中，有时候也会传来其他一些声音。例如，罗斯福政府前财政部长摩根索（Моргентау），在9月初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上的一系列文章中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应该向英国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因为“正如和平一样，繁荣是不可独享的。繁荣应该被所有人所分享”。（见塔斯社，9月13日，第95页）

在前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同英国进行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克莱顿（Клейтон）的发言同样值得关注。关于两国之间在讨论的问题，克莱顿声称，必须理解英国现在的困难，无论如何都要达成协议，否则，英国和美国之间将会爆发经济战，而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塔斯社，10月12日，第55页）然而仍然需要公正地说，现在媒体喧嚣的论调都是在企图向英国施加压力，使英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

现在还很难预料，英美这次谈判的结果将会如何。英国人强调说贷款的利率太高了，坚决反对废除特惠制和缩减英镑借款。双方各执己见。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将千方百计地尽力达成妥协，尽管这种妥协可能还不能马上达成，但是最终将是能够达成的。因为双方对苏联都心存顾虑，并且都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担忧。

但是，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就逐步解决他们面临的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那么这也绝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因此得到解决。最终，这些矛盾将会年复一年地对英美关系带来越来越大的障碍。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在各地的经济竞争还将继续存在，而且不会减弱。即使英国能够保留现在的帝国特惠制，巩固自己在英帝国的市场，英国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市场上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比如在欧洲市场、南美市场、加拿大市场、东亚市场等等。或许这些斗争还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些英帝国的市场上进行。

而且，美国和英国在投资领域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战前，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明显少于英国。现在英国的对外投资几乎丧失了一半，而且因自身衰退，今后（至少在近年）对外投资不会明显增长。但是，英国当然将会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在英帝国、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等地）。相反，受经济过剩的困扰，美国将会千方百计地在最近几年里扩大自己在国外的投资，这当然会同英国在拉丁美洲、加拿大、东亚和其他许多地方发生冲突。美英两大国的竞争还可能会在近东地区加剧，近年美国对近东的关注明显增多，这主要是为了获取那里的石油。因为得到新的石油资源对美国的意义太重大了：正如美国人所承认的，以现在的开发速度，美国本

国的石油资源最多只能维持 15-20 年。

最后，*英美在海洋和空中的矛盾*将会不可避免地增长。战后，美国的海军力量大约是英国的两倍。在第一份关于英国的报告中，<sup>①</sup>我已经举出了这两大国商船吨位对比的数据（美国 5000 万吨，英国 1700 万吨），英国在海洋运输领域面临严峻的竞争和威胁。美英两国在航空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美国人依仗自己强大的航空工业，企图垄断国际航线，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英帝国的许多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对此，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不得不同美国这一竞争对手进行艰难的斗争。

近来，英美关系中的矛盾远不止这些。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两国马上就会发生战争。相反，两大国无疑都将尽力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并寻求妥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在极度的紧张之后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息。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不愿因为他们之间的斗争而使苏联的地位得到加强。可以预料，在今后数年内他们将采取这种妥协政策。但是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代中，*英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向仍将是相互竞争和斗争的不断加剧*。在这一斗争中美国将是进攻的一方，英国将是防御的一方。

## 六、美国和欧洲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将来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根据媒体报道以及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的言论可以看出，美国未来对欧洲的政策目前正在两种趋向之间进行争斗。

代表一种政策发展趋向的代表们主要根据以往没有成功的经验（赔款问题、道威斯计划、一战后的军事债务、20 年代的投资石沉大海）警告说，不要过于积极地介入欧洲事务，并建议更多地关注世界上其他相对比较“有希望”的地区（拉美、太平洋、加拿大、东亚、中国等地）。

但是，代表另外一种政策趋向的代表们争论说，美国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并证明美国积极参与战后欧洲的经济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如果所显示的各种征兆都属实的话，那么美国今后对欧政策的趋向或许将是二者之间的一条中间的路线。

正如上面所说的，战前美国对欧洲在经济上的兴趣相对较大：美国在这一地区

---

<sup>①</sup> 指的是 1945 年 11 月 1 日迈斯基写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有约 20 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同欧洲的贸易占到美国对外贸易的 37%。美国当然不愿放弃这一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地区。相反，他们将会尝试着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加强这一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战后的欧洲对美国人来说是一块难以下咽的骨头。战后的欧洲被破坏得实在是太严重了，需要得到大量而长期的贷款。战后的欧洲明显在向左转，并且在逐渐开始向新型的民主过渡，其特点就是消除大土地所有者，并使一些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国有化。战后的欧洲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致力于恢复自己的工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英国将会是美国在欧洲的一个强劲竞争对手。最后，苏联在欧洲还具有影响，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双重的不幸，因为其结果将使欧洲更加难以控制，而美国在欧洲增强地位的“可能性”将会降低。

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或许会相对积极地参与欧洲经济事务，但在形式上，他们也不会过于积极地进入这一“危险的”大陆。可以预料，美国对欧洲的兴趣首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贸易市场，并将尽力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在战时他们就已经开始作出这样的努力了，并且现在他们仍在继续进行这样的努力。顺便说一下，为此，他们将会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样，美国人将遵循一定的路线：尽可能少地向欧洲出售生产资料，尽可能多地出售消费品（他们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等国家和地区的行动中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趋向）。

至于投资就有所不同了。很有可能，美国人一开始就愿意向欧洲国家提供长期的商品贷款，否则的话，在今后几年将很难同欧洲进行贸易。但是，在对欧洲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提供长期而大量的投资问题上，他们仍在等待。因为他们仍然记得以往失败的经验。但是这绝不排除美国将来有可能会提供少量的长期投资，特别是如果这种投资能够为美国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或其他保证的话。具体地说，美国很可能会马上准备向西欧的一些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或许还有意大利——提供大量的长期的投资。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对东欧国家进行这样的投资。并且，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投资标准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用美国的标准来说是“少量的”投资，在欧洲人看来，它们也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既然现在美国首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贸易市场来看待的，当然，这也是他们对欧洲的政策（其中包括在对德国的政策上也能够发现同英国政策的巨大相似之处）。（见我的第一份报告<sup>①</sup>第 12-14 页）

迄今为止，在欧洲国家中（不包括英国），美国最为关注的是法国。1945 年 3 月 1 日，美国在各项租借援助之外，向法国提供了为期 30 年、总额为 9 亿美元的贷款，

---

① 指 1945 年 11 月 1 日迈斯基写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主要用于法国从美国购买铁路设备、机器、物资等。一些迹象显示，今后美国对法国的兴趣将不会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的经济能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见第八部分）

至于东欧国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兴趣都非常小。实际上，到 1940 年底，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总额还不到 1.3 亿美元，不超过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5%。（见附件 8<sup>①</sup>）而美国对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进口和出口）在 1938 年的时候大概是 2 亿美元，或者说，是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4%。（见附件 9<sup>②</sup>）从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同东欧的贸易并不多，甚至少于英国的相应数据（4-6 亿美元的投资和将近 2.5 亿美元的对外贸易）。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介入东欧，特别是介入巴尔干事务与其说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

## 七、美国和苏联

目前，苏联和美国还没有领土上的、经济上的、贸易上的、海洋上的、殖民地问题上的重大矛盾。今后几年，苏联和美国在国际航线问题上也未必会出现一些不可调和的分歧。从各方面来看，美国主要的扩张政策会对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大国产生非常强烈的威胁，但是却不会影响到苏联。同时，苏联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苏联市场对于美国的工业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不远的将来，一旦爆发经济危机，苏联市场的潜力对美国的工业将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苏联拥有良好的提供贷款的条件（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能提供这些贷款），可以从美国得到许多东西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今后的发展。

美国也希望建立各种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秩序（粮食、石油、棉花等方面）。没有苏联的参与，这些经济组织几乎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个因素也有助于美国同苏联保持正常的关系，制止那些企图阻止两国关系发展的美国人的图谋。

因此，可以从上述得出结论：*美苏之间加强经济关系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但还必须作一点补充说明。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内，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向 *对抗的两极发展——一极是帝国主义，一极是社会主义*。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国间的相互冲突和政治局势上的紧张，其程度与方式将会由于各种偶然因素而起伏不定。

---

① 没有发现这一附件。——译者注。

② 没有发现这一附件。——译者注。

这种影响因素现在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在东欧问题上。这一因素无疑会对美国向苏联提供 60 亿美元贷款的问题产生影响。

这一因素或许还会对苏美就租借援助的“补偿问题”进行的谈判产生影响。继英美就这一主题的谈判结束后，苏美间的谈判迟早都会举行。苏联和美国关于租借援助的补偿问题会怎么解决，现在还很难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英美谈判的结果。当我在 1941-1942 年还在伦敦的时候，我曾多次听到美国人似是而非地说，苏联应废除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偿付租借援助。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战争时期。现在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冒险提出类似的要求。然而，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美国不从正面来攻击苏联对对外贸易的垄断，而是从侧面来进行攻击。将来将会知道这种担心是否将会成为现实。

然而，有许多的理由可以认为，在战后数年内，美国 and 苏联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还不至于紧张到不能发展正常的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程度。其中明显的证据就是，由于租借援助的终止，我们前不久从美国获得了 4 亿美元的贷款，并且美国还将向我们提供 10 亿美元的贷款。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美国在处理同苏联的贸易问题上变得更加通融。因此，从各方面来看，有足够的客观条件为今后苏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保证，用外交的语言来说，这种关系就是“友好关系”。而且，在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时候，美国会希望获得苏联的支持，或者，希望苏联至少能够保持“中立”。苏联外交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这种状况。

## 八、政治因素

最近几年，在美国制定对苏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以下三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就是反苏主义。在上个章节中我已经提到了美国的反苏主义。这种反苏主义一贯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因为美国有 2300 万天主教徒，正如以往将近 30 年的经验所显示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这种反苏主义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至少对苏美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二是反英主义。美国过去有反英主义的传统，现在也有反英主义的兴趣。毕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不仅过去是美国的压迫者，对美国进行过殖民统治（对此的记忆至今仍未消褪），而且还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大西洋对岸的另一个共和国美国的希望是继承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

第三，美国对西欧联盟的各种计划的怀疑态度。因为西欧联盟的建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反对苏联，另一方面是反对美国。那些同西欧联盟计划相联系的大国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通常都是世界上主要的殖民大国。美国的扩张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国家,因此,西欧联盟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反美的阵线。西欧联盟计划的拥护者千方百计地尽力避免谈论他们这一计划的反美目的,但是有时候他们的这种目的还是会偶然表露出来的。比如左翼自由周报《新政治家与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在10月6日的报道中就公开承认说:“无论怎么,英国都应该同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和荷兰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因为英国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同欧洲大陆有紧密的联系。西欧联盟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反对美国的殖民主义,因为美国企图把英国变为自己的仆从国。”

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措施反对西欧联盟的建立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前不久美国向法国提供了贷款,看起来这就是他们为此采取的一种措施。因为没有法国的参与,西欧联盟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美国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怀疑,建立西欧联盟的想法不会引起美国的任何兴趣,这一因素无疑会对美国战后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 九、结论

1、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1) 英国的国民经济是依靠农业来单方面地发展工业。与英国的国民经济不同,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工农业两部门的发展都比较均衡。美国主要的粮食生产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的需求,而且还大量向国外出口。

2) 广袤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而快速增加的人口、不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美国农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美国建立起强大的国内市场,为美国工业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战前国外市场在美国经济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地小。

3) 美国的对外贸易至今总能保持良性的平衡。因此在美国不存在预算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则很重要。

4) 最后,美国依赖自己的国内资源在最近25-30年里如此迅速地积累了资本,致使美国在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之外还拥有大量的资金向其他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

以上列举的因素,都反映了美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美国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而要选择道路。

2、战后,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需求不足”。与英国相反,美国面临的问题则是“经济过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过剩”就已经充分表现出



来了。当时，仅占世界总人口 6% 的美国却占据了世界生产的 1/3。同 1935-1939 年相比，战时，美国生产部门的生产力增长了 2.5 倍，并且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广阔的领域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现在，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这一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在加强。这些因素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掌握了原子弹的秘密，确立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目前尚未出现危机的局面和可以替代美国的领导角色。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更加傲慢、过于自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具侵略性。从各方面来看，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形式将主要是进行金融和经济扩张，另外还会进行一些领土上的扩张（在世界各地区获得军事基地）。

3、当然，美国会用看似有理的借口以及关于平等、和平、繁荣的华丽词藻（今年 8-10 月杜鲁门、伯恩斯以及其他人的发言）来掩盖自己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但是英美现在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就轻易地揭露了美国的真实面目。这场谈判始于 9 月 11 日，是由于美国取消租借援助引起的（8 月 21 日）。根据媒体报道可以判断，在这些谈判中，以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凯恩斯为首的英国代表团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要求：1）延长租借援助的期限，再提供数额为 35 亿美元的租借援助，2）向英国提供一次性补助，或者至少向英国提供为期 30-50 年、数额为 30-60 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4、以外交部部长克莱顿同志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答复英国人说，他们同意向英国提供财政援助，但援助只能是以普通的长期贷款（40-50 年）的形式进行，贷款数额为 40-50 亿美元，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并且，提供这样的贷款的条件是英国要进行“经济自裁”。这里的“经济自裁”美国人指的是：废除 1932 年渥太华协议所确立的帝国特惠制（对英帝国成员优惠关税），并要求英国把其对英帝国以及其他国家（阿根廷、委内瑞拉、法国等）的英镑债务减少一半。美国人还拒绝英国人企图通过国有的或半国有的垄断性质的机构开展贸易的任何尝试。美国方面提出这些要求的目的非常简单：摧毁英帝国市场的贸易保护壁垒，美国想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条件向英帝国成员出口商品。但是，由于美国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必将会给英国的竞争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减少英镑债务只会使英国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

5、英美双方都在坚持进行讨价还价。英国人强调说贷款的利率太高了，坚决反对废除特惠制和减少英镑借款。他们威胁说，如果美国人不作出让步，他们将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英镑集团内（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开展贸易，这将在实际上导致世界经济领域各种限制和壁垒的加强。英国一些比较激进的代表，如比弗布鲁克、艾米利等人甚至以发动经济战威胁美国。而美国方面则

企图最终利用对他们比较有利的局势，而且美国一些激进分子公开声称，要让英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尾巴”。（《圣报》，1945年9月11日）但是，尽管双方都在进行争吵，看起来，双方都要达成某种妥协，因为双方对苏联都心存顾虑，并都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担心。

6、但是，即使英美现在逐步解决了一系列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那么这也绝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现在的矛盾都消除了。相反，这些矛盾将会年复一年地对英美关系带来越来越大的障碍。美国和英国的主要矛盾在于双方在欧洲市场、拉美市场、加拿大市场、东亚市场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贸易竞争，在于他们在国外投资领域的激烈斗争，在于他们在航空和航海领域经常进行的竞争，而且，在各个方面美国都是进攻的一方，而英国则是防御的一方。尽管英美将会尽力寻求妥协，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代中，英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向仍将是相互竞争和斗争的不断加剧。

7、美国对欧洲政策有两个趋向——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事务的趋向和反对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的趋向，这两个政策趋向之间将会相互斗争。实际上，美国将在这两种政策趋向之间选择一条中间的路线。从各种迹象来看，最近数年，美国首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贸易市场进行关注的，并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强有力的地位。顺便说一句，为此他们利用了提供长期商品贷款这种形式。也可以预料，美国会对欧洲的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企业提供长期的大量的投资。特别是向欧洲那些比较“可靠”的地区以及那些拥有非常可靠的政治和其他保障的地区进行长期的大量的投资。具体地说，这主要指的是西欧。如果说，美国现在就希望对东欧国家进行这样的投资，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即使被认为美国可能进行的那些投资，近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规模，当然，这是以美国（非欧洲的）的标准来看的。因为现在美国首先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贸易市场来看待的，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其中包括对德国的政策）与英国的对欧政策有很大的相似。在欧洲国家中（不包括英国），美国现在比较关注的是法国。根据1941年3月1日签署的协议，美国人在租借援助之外，向法国提供了为期30年、总额为9亿美元的贷款。

8、在经济上，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兴趣不大：到1940年底，美国在东欧的投资总额还不到1.3亿美元，不超过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5%。而美国对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口额与出口额）在1938年的时候大概是2亿美元，或者说是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这些数据要比英国的小得多（英国的投资为4-6亿美元，贸易额接近2.5亿美元）。因此，很显然，美国介入东欧，特别是介入巴尔干事务，与其说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

9、目前，苏联和美国还没有领土上的、经济上的、贸易上的、海洋上的、领空

上的、殖民地问题上的重大矛盾。从各方面来看，美国主要的扩张政策都不会影响到苏联。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对建立新的贸易秩序较感兴趣，在具备了一定的贷款的条件下，这种贸易秩序可以使两国建立起牢固的经济联系。在此方面，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特别希望建立各种世界性的经济组织（粮食方面的、石油方面的、棉花方面的等），没有苏联的参与这将很难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和美国在政治上还存在一些基本矛盾。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中，美苏两大国将会越来越向两极对立的方向转化——帝国主义的一极和社会主义的一极。然而，有许多的理由可以认为，在战后的数年内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还不至于紧张到不能发展正常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程度。

10、有如下三大政治因素将会对今后数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重大的作用：

1) 在美国存在强烈的反苏现象，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引起的，此外还有天主教会不时激起的矛盾。

2) 在美国存在强烈的反英现象，这一方面是由过去的传统引起的（美国人现在还没有忘记，他们曾经遭受过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另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利益引起的（美国人非常希望继承英帝国的遗产）。

3) 美国对西欧联盟计划的怀疑，因为这个联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苏联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反对美国的。那些同西方联盟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大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通常都是世界上主要的殖民大国。美国的扩张政策首先反对的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联合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反对美国的战线。美国领导人非常明白这一点，并且会由此得出相应的实践结论。

迈斯基

1945年11月14日<sup>①</sup>

---

**【Abstract】** Late in World War II and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Soviet leaders paid high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U.S.A. and Great Britain while constructing postwar world politics arrangement. It is just in this case that Maisky wrote the two reports on postwar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 which he submitted to Molotov. In these two reports, Maisky analyzed profoundly the postwar British-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 Soviet-American and Soviet-British economic relations. His proposal on Soviet-American and Soviet-British economic relations has had an effect on recognition of Soviet leaders on issues of developing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both the

---

① 该份档案原件出处为：АВПРФ.ф.06, оп.7.палка.18.д.184.л.39-75.——译者注。

U.S.A. and Great Britain after the WWII. In addition, this conception also agrees with Soviet leaders'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with great powers and its domestic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Key Words】** Postwar World Arrangement,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построение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идеры придавали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Доклады Майского Молотову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британ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были разработаны как раз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В этих двух докладах, Майский провёл глубокий анализ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британ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 советско-британ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им концепция о развит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оказала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нимание советскими лидерами вопросов развития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данная идея также совпадала с мышлением совет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начальные период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стратег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мир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

(责任编辑 姜睿)

## 论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曹广金\*

**【内容提要】**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由美国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美国及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这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也改变了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而苏联经济却在此期间取得较快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苏美两国面对经济危机的局势以及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开始在摩擦中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以应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最终两国在隔绝了16年之后确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关键词】**经济危机 美国 苏联 苏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9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2-0124-(14)

1929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仅给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而且还重塑了一战后的世界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分裂，改变了一战后以战胜国和战败国来划分的格局，开始以民主和极权来区分不同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地位则得到了提升。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经济在大危机中风景这边独好，经济实力得到了提升，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最终承认了苏联，双方在1933年1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在当年的剩余时间里，苏联还与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三十年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是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发生的。

### 一、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下的世界及苏美经济

#### (一) 经济危机下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

在大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致使其工业生产普遍

\*曹广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下降。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较1929年减少了37%以上，退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sup>①</sup>失业人数及比重也迅速上升，如：英国1929年的失业人数是121.6万人，失业率为11.0%，而到1933年上升到了252.1万人，失业率上升至21.3%；<sup>②</sup>美国的失业率从1932年的3.2%上升到1933年的24.9%。<sup>③</sup>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呈下降趋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分别下降了40.6%、32.9%、23.8%、34%、36.7%。<sup>④</sup>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同样下降：英国进口贸易额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了44.7%，出口下降了49.7%<sup>⑤</sup>；德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分别下降了63.8%和68.7%<sup>⑥</sup>；法国进出口贸易额同样呈下降趋势，分别为51.2%和63.2%<sup>⑦</sup>。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情况可以从下表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状况<sup>⑧</sup>

年份	工业生产指数下降到 (%)	工人失业人数 (万人)	国际贸易减少到 (亿美元)	
			出口	进口
1929	100	590	351	325
1930	86	1170	285	260
1931	75	1920	202	185
1932	64	2640	136	126
1933	72	2600	123	115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发展陷入了严重的无序状态，激化了各种矛盾。在各国国内，表现为社会情况愈加复杂，政治局势不稳，各种政治势力乘势崛起；在国际上则表现为战败国与战胜国、战胜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一战战争债务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家为了转嫁和摆脱危机，加紧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经济战。最明显的是美国在1930年通过对890种商品提高征税的法案，引起了资本主义世

①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新编世界经济史》（下），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00页。

③ 同上，第190页。

④ 伊·阿·基里林主编：《国家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

⑤ 英国1929年进口贸易额（到岸价格）为1221百万英镑，1933年为675百万英镑；1929年出口贸易额（离岸价格）为729百万英镑，1933年为367百万英镑。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870页。百分比为笔者算出。

⑥ 德国进口贸易额1929年为13483百万帝国马克，1933年为4871百万帝国马克；出口贸易额1929年为13447百万帝国马克，1933年为4204百万帝国马克。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651页。百分比为笔者算出。

⑦ 法国进口贸易额1929年为58221百万旧法郎，1933年为28431百万旧法郎；出口贸易额1929年为50139百万旧法郎，1933年为18474百万旧法郎。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756—757页。百分比为笔者算出。

⑧ 樊元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界的关税战。德、意、日法西斯势力也开始兴起，试图利用人们因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来转嫁危机，解决本国问题。这就使得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受到冲击，国际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势力均衡受到破坏，世界局势开始发生动荡。面对这种新情况，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利益及稳定国际局势的需要，必然要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局势。

## （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经济形势

经济危机发源地的美国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GDP从3147亿美元下降到2394亿美元，5年时间下降了24%；1933年的CPI比1929年下降了24.6%。<sup>①</sup>危机期间（1929—1933年），美国主要工业部门的降幅分别为：采煤65.6%、生铁86.7%、炼钢84.7%、汽车92.1%、机床制造96.3%、住宅建设95.5%。<sup>②</sup>出口下降了68.0%，进口下降67.0%<sup>③</sup>，都超过了一半以上。美国在危机爆发后的前三年，外贸从90亿美元跌至30亿美元<sup>④</sup>。另外，1929至1932年，美国私人投资总额从158亿美元下降到9亿美元。<sup>⑤</sup>危机还导致美国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纷纷被逐出工厂和农场，仅登记在案的全国失业人数就从1929年的155万人增至1933年的1283万人，失业率由3.2%增加到24.9%。这样，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使美国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进行“调节”的信念。

由于危机的打击，不仅美国国内的情势出现不稳，而且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开始趋于紧张。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美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金本位、一战战债等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同时德意日等国也开始在外围挑战美国的利益。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美国开始改变对苏联的看法。美国态度的改变，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苏联在危机期间经济实力不降反升不无关系。出于经济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开始认真对待苏联所提出的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

## （三）经济危机时期苏联经济的状况

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经济危机困扰的时期，也正是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

---

① Bernstein,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 New York,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Inc., 1960, p.304.

②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5页。

③ 美国进口贸易额1929年为43.99亿美元，1933年为14.51亿美元；出口贸易额1929年为52.41亿美元，1933年为16.75亿美元。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333页。百分比为笔者算出。

④ David.R.Contosta, Robert Muccigrosso,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ming of Age*, New York: Harper& Row, 1988, p.155.

⑤ *The Handbook of Basic Economic Statistics*, Vol.5.No.4, Economic statistics Bureau of Washington D. C, Washington, 1951, pp.224, 114.

期。苏联此时的经济非但没有受到这一波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借助资本主义国家在困境中急于寻找产品的销路和技术转让的出路，奠定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从而使苏联经济在这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苏联占世界工业产值的比重在 1928 年为 5%，1937 年则上升到了 10%<sup>①</sup>，这说明了苏联经济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了快速增涨的势头，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一五”计划头四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1913 年为 100%），1932 年同 1928 年相比增长了 202%（1928 年同 1913 年相比只增长了 132%）。<sup>②</sup>工业生产指数（1913 年为 100）1929 年为 132，之后逐年增加，到 1933 年增长至 281。<sup>③</sup>这些成就与苏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有很大关系。“一五”期间，苏联各年度基本建设投资额分别为：1929 年 8.3 亿卢布、1930 年 13.9 亿卢布、1931 年 20.2 亿卢布、1932 年 23.5 亿卢布、1933 年 19.4 亿卢布。<sup>④</sup>同时，1928-1932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工业占 38.0%，居首位，比农业（15.6%）和运输邮电（17.7%）的总和还要多。<sup>⑤</sup>到 1932 年底，工业总产值比一战前增长了 334%，工业已占到国民经济比重的 70%，由此苏联跨入了世界工业国的行列。<sup>⑥</sup>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期间，苏联进口机械设备在当年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929 年为 30.1%，1930 年为 46.8%，1931 年为 53.9%，1932 年为 55.7%，1933 年为 43.0%。<sup>⑦</sup>苏联的机械进口在 1931 年占全世界出口机械的 1/3 左右；1932 年，1/2 左右的出口机械都是发往苏联的。<sup>⑧</sup>这也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各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出口、争取资金回笼、摆脱经济困境的一种表现，而贸易对象的问题不再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也正因为如此，苏联才能大规模地采购经济建设中所需的机械设备和技术，这也是苏美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不但克服了 20 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而且还在 20 年代中后期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因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而急于出售过剩的产品设备和寻找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使苏联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如美国人所想

---

①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第 39 页。

② 同上，第 126 页。

③ 《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第 27 页。

④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408 页。

⑤ 同上，第 406 页。

⑥ 曹广金：“试析苏俄建国后影响苏美建交的几大障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⑦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661 页。

⑧ К.М. Боголюбова, М. С. Смирнюкова.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ССР. Том Третий - создание фундамент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СССР(1926-1932г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7. с.389.



象的那样很快垮台，反而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中，开始充分利用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来调整其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从而为苏美两国关系的进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二、经济危机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 （一）苏美经济贸易关系

经济危机对苏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交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又使得双方这种经济交往加强的势头受到了压制，双方经济关系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态势。

苏联在没有得到美国的政治承认之前，一直是以加强经济联系来推动双方的政治关系，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如此。

苏维埃政府曾多次主动要求同美国建立经济联系。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经济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这种贸易经济关系，不仅对苏维埃国家有利，而且也对美国有利，拒绝同苏维埃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政策，将使美国本身遭受损失”<sup>①</sup>。

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就是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苏联极力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资金、技术等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苏联也试图通过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来发展两国的政治关系，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更好地进行苏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6-7月）的决议中，对此就有所表述：关于完成工业五年计划的条件，决议认为“必须进一步推广……聘请外国工程师、技师和熟练工人到苏联工作的做法，保证使苏联的企业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在利用现有技术援助合同，和吸收外援来改造工业和建立新的生产部门的同时，必须努力做到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让我国工业在最短时期，掌握最好的经验和最重要的先进技术成就”。<sup>②</sup>“在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大大地扩大了对外贸易联系，从而为改善苏美关系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苏联也尽量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多次建议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sup>③</sup>1929年10月1日，苏联政府批准了70个有关外国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24个协议在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55个合同是与美国和德国的商

---

① А.Громыко, Б.Н.Пономарева.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45. Том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1980. с.142.

② К.М.Боголюбова, М.С.Смиртюкова. Реш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1929-1940 годы. Том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7. с.408-409.

③ В.Иванов, В.Леонян. В Интерессах Народов. Москва, 1957. с.6.

号签订的。如苏联同福特公司签订的关于为下诺夫哥罗德建设汽车工厂的咨询和供应设备的合同<sup>①</sup>；美国勃兰德塔商行（帮助改造莫斯科汽车厂）和马基商行（设计和建造马格尼托格爾冶金联合企业）等都在苏联投资设厂。<sup>②</sup>另外，在经济危机前半期的 1929 年、1930 年和 1931 年，苏联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都维持在高位（这三年的进口额分别为：1.39 亿卢布、2.073 亿卢布和 1.803 亿卢布），仅次于德国（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数额在 1929-1931 年分别为：1.526 亿卢布、1.967 亿卢布、3.22 亿卢布）<sup>③</sup>，甚至在 1930 年还超过了德国。但苏联对美国的出口一直是低水平的，而且从 1929-1933 年的苏联对美、英、德的贸易出口额来看，苏联对美出口额小于对英、德贸易出口额。<sup>④</sup>

美苏之间贸易的这种情况不仅与苏联对美政策的变化有关，而且主要还与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发生变化有关。正如前面所述，苏联致力于发展同美国的经济关系，而美国国内也有相呼应的，所以在经济危机早期的 1929-1931 年，双方的经济贸易——如上所述——有很大的进展。而苏联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也是促进苏美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 1932 年，苏联的大工业（标准工业）总产值达到 343 亿卢布（1926/1927 年价格），比 1928 年增加了 1.2 倍，国民收入达 455 亿卢布，增加了 82%。<sup>⑤</sup>苏联工业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跃居世界第四位。<sup>⑥</sup>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机器设备、燃料和原材料，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相当部分的过剩商品找到了销路，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容纳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虽然这一时期美国针对苏联实行了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但苏美之间的贸易还是一度发展得比较迅速，如 1929-1930 年度，苏联从美国的进口占到了苏联总进口额的 25%<sup>⑦</sup>。

但苏美之间良好的贸易形势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相反，在这之后双方的贸易大幅度下滑，特别是在 1931-1932 年度和 1932-1933 年度。1933 年苏联对美国出口额只相当于 1929 年的 32.7% 强，而从美国的进口只相当于进口最高年份 1930 年的

---

① К.М.Боголюбова, М.С.Смиртюкова.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ССР. Том Третий -создание фундамент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СССР(1926-1932гг). с.157.

②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58.№5. сс.25-50.

③ 《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 131-132 页。

④ 苏联对英、德、美的出口贸易额从 1929 年到 1933 年分别为：1929 年 1.588 亿卢布、1.687 亿卢布、0.335 亿卢布；1930 年 2.195 亿卢布、1.613 亿卢布、0.321 亿卢布；1931 年 2.086 亿卢布、1.014 亿卢布、0.178 亿卢布；1932 年 1.086 亿卢布、0.788 亿卢布、0.135 亿卢布；1933 年 0.628 亿卢布、0.672 亿卢布、0.11 亿卢布。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 136-137 页。

⑤ 宋则行等：《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6 页。

⑥ 琼图洛夫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第四卷），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96 页。

⑦ В.С.Зинченко.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за 1918-1940 г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М, 1960г. с.158.

6.3%还弱；<sup>①</sup>苏联对美国出口的锰矿石，由1930年的120.8亿卢布锐减到1933年的25.23亿卢布。<sup>②</sup>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美国在三十年代初为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而对苏联执行更加强硬的政策，并在国内掀起对苏联商品的抵制运动不无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胡佛政府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从1932年起对苏联展开经济战，试图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到苏联政府身上，指责苏联政府借助于“倾销”商品来破坏世界经济秩序，把苏联的出口说成似乎是资本主义世界全部灾祸的根源。如1932年11月2日，苏联驻美全权代表斯克维爾斯基在给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信件中，就谈到了胡佛的言论，信中写道：“其中，10月16日胡佛在克利夫兰的发言中表明，苏联在全世界的倾销，以及苏联与中国的革命，是引起世界危机的原因之一”<sup>③</sup>。美国说，“苏联通过在美国倾销其商品，来获得五年计划所需要的大量资金。”<sup>④</sup>正是基于这样的言论，美国借口苏联倾销的产品是用“强迫劳动”和“犯人劳动”生产出来的，要求停止从苏联进口或对苏联关闭本国市场。虽然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商务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但美国最终通过了一个针对苏联的“禁止进口用‘强迫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到美国市场”<sup>⑤</sup>的决议。从而使得美国国内反对从苏联进口的利益集团有了依据，开始极力阻挠苏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1930年5月18日，李维诺夫在致斯大林信件的附件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禁止从苏联进口木材和无烟煤的宣传正在加强”<sup>⑥</sup>。胡佛政府还规定对苏联许多商品征收“反倾销”特别关税。1930年7月，美国政府以所谓“犯人劳动”为借口，禁止苏联木材的输入。同年11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禁止“使用犯人劳动”和“强制劳动”生产的商品输入美国的法令。美国政府还对苏联商品采取其他的限制和歧视性政策，如提高苏联船只的入港税（比其它国家的多数倍）；对从苏联进口的食品进行特别卫生检查等。美国之所以敢于如此，与双方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在“黄金时代”，苏联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必需市场。例如，苏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最多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0.8%（1929年为最高年份），而苏联从美国的进口最高也仅占美国出口的1.3%（1930年为最高年份）。<sup>⑦</sup>因此，“美国不担心苏联的商品撤出美国。因为苏联商品同美国的交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意义不大，……从来

---

① 笔者根据 В.С.Зинченко.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за 1918-1940 г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М, 1960г. 第37页表格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出。

② В.С.Зинченко. Указ. соч. с. 159.

③ АВП РФ. Ф.0129. Оп. 15. П.128. Д.327. Л.161-167. Копия.

④ АВП РФ. Ф.0129. Оп. 12. П.120. Д.306. Л.56-60. Копия.

⑤ АВП РФ. Ф.0129. Оп. 12. П.120. Д.306. Л.64-69. Копия.

⑥ АВП РФ. Ф.05. Оп. 10. П.56. Д.1. Л.1-7; 10-12. Копия.

⑦ АВП РФ. Ф.0129. Оп. 14. П. 127. Д. 323. Л. 44-59. Копия.

没有超过 1-1.5%”。<sup>①</sup>这也是美国长期不承认苏联、对苏联的和平政策置之不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面对美国的“倾销”指责，1931年3月，苏联政府指出，“犯人劳动”与苏联的出口没有任何联系，这本身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困难的原因。<sup>②</sup>因为，这一时期的苏联产品在世界出口中只不过占 1.4%（1929年）—2.3%（1932年）。<sup>③</sup>这个数字说明苏联的对外贸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另外，就苏联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总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百分比而言，即使在最高的 1929/30 年度也只达到 0.8%，美国出口苏联也只占其出口总额的 1.39%，<sup>④</sup>而单一品种除了锰矿石所占比例较大（1927/28 年度为 60.2%<sup>⑤</sup>）外，其他的都不超过 10%<sup>⑥</sup>。这对美国经济同样也不可能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如此做的目的，除了是为了转移国内公众的视线外，还有就是为了“破坏或阻挠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及恢复经济封锁”<sup>⑦</sup>，是“期望孤立政策或许可以加速那个违反常规的政府的垮台”<sup>⑧</sup>，从而能开拓更为广阔而自由的市场，为美国的产品增加销售寻找出路。由此，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1930年10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国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完全停止、或尽量缩减在采取阻挠苏联商品进口的歧视性办法的国家里的订货和采购；停止利用这些国家的船只；对这些国家的过境商品规定特殊的限制条例；采取措施完全不用或尽量少用这些国家的港口、过境运输线和堆栈进行过境或再输出业务。<sup>⑨</sup>这样，苏联有意识地减少从美国进口，缩减在美国的订货，将其转移到其他国家，至使苏美间的贸易几近中断：美国商品在苏联进口总额中从 1930 年的 25% 降到 1932 年的 4.5%。<sup>⑩</sup>

但随着罗斯福总统的上台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苏美两国开始试图改善双方的经济关系，以谋求两国政治关系的正常化。为此苏联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对美国总统一罗斯福邀请苏联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倡议，给予积极的回应。特别是 1933 年 6 月，在伦敦经济会议上，苏联提出了准备在近期向资本主义国家订购 10 亿美元商品的提议。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通过此次会议双方加强了联系，为 1933 年

① АВП РФ. Ф.0129.Оп. 14. П. 127. Д. 323. Л. 60-62. Подлинник и копия.

② Белов Г.А., Гармаш Е.С.т.д.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III. Москва, 1959, с.365.

③ 桂立：《苏美关系 7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 页。

④ АВП РФ. Ф.0129. Оп. 14. П.127. Д.323. Л.44-59. Копия.

⑤ АВП РФ. Ф. 0129. Оп. 13. П.127. Д.321. Л. 22-27. Копия.

⑥ 笔者根据 А.Н.Яковле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1927-1933. Серия: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2002)第 293、301、308、334-346 页相关数据得出。

⑦ В.А.Вальков. СССР и США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65. с.161.

⑧ [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147 页。

⑨ В.А.Вальков. Указ.соч. с. 161.

⑩ АВП РФ. Ф.0129.Оп. 14.П.127.Д.323.Л.44-59. Копия.

11月双方的建交打开了通道。经济局势的变化和各国的经济需求，最终促使两国接近，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美国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推动双方的联系。193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指出：“由于苏联政府是稳固的，由于所有国家都承认苏俄政府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由于美国拒绝了苏俄政府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使美国公众失去了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同苏联正在顺利进行的那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换的机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特决定请求美国总统指示国务卿，就美国和俄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问题，同俄国的苏维埃政府进行会谈”<sup>①</sup>。在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李维诺夫就涉及两国经济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苏美关系史上第一次如此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之后，美国政府向美出口商提供4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向苏联销售棉花所需要的资金<sup>②</sup>。就连拥有134个垄断组织成员、一直持反苏立场的美俄商会，这时也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于1933年7月公开声明放弃以前的立场，主张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sup>③</sup>认为“承认苏联是从美苏贸易中获得任何重大利益的先决条件”<sup>④</sup>。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美国转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寻求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 （二）经济危机对苏美政治关系的影响

苏联和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在经济危机时期所表现出的状况，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是紧密相联的。

经济危机期间，胡佛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试图转嫁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继续对苏联实行“不承认政策”<sup>⑤</sup>。胡佛本人就曾表示过，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消灭布尔什维克。1930年12月国务卿史汀生又宣布，在苏联政府没有执行科尔比和休斯曾经宣布的“先决条件”以前，即苏联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没有取消关于国有化等法令之前，美国不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非但如此，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胡佛政府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人们的视线，还掀起了反苏狂潮，其表现除

---

① 特鲁哈诺斯基：《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39》（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351-352页。

② В.А.Вальков. Указ.соч. сс.189-190.

③ В.Иванов, В.Леонян.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ов. Москва, 1957, сс.61-62.

④ В.А.Вальков. Указ.соч. с.190.

⑤ 美国的这种不承认政策在1920年8月国务卿科尔比回复意大利政府就苏波战争问题要美国表态的备忘录中，得到全面的阐述。备忘录首先指出，苏维埃政权不是基于普遍支持之上，而是借助于“暴力和欺诈”上台的，并靠“残暴镇压苟延残喘”。科尔比还在备忘录中指控苏俄“拒绝履行国际义务”，并“苦心孤诣地企图煽动世界革命”。又说：“他们的用心昭然若揭，就是企图利用各种方式，当然包括利用外交机构，在他国煽动革命运动”。科尔比最后宣称：“对于一个坚决而势必要策划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代理人，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与之保持联系，或给予友好接待”。参见：*FRUS Russia 1920 III*, pp.464-468.

了上文所述的经济方面对苏封锁外，在政治方面也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在时任苏联驻美全权代表斯克维尔斯基给李维诺夫的多封信件中都有所描述。<sup>①</sup>美国政府在一切官方言论和外交行动中始终强调不承认苏联的原则性立场。

但随着罗斯福总统的上台，苏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出现了转机。罗斯福对那些反对承认苏联的人表示“不理解”，他认为不承认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因为既没有使苏联归还债务，也没有迫使它减少对美国共产主义活动的支持。罗斯福的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也提出，“对美国来说，对像苏联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保持冷漠是非常愚蠢的，而且没有益处。”<sup>②</sup>罗斯福进一步提出，美国应该承认苏联，因为承认苏联对美国是有利的，它“可能会帮助有麻烦的美国经济”。<sup>③</sup>罗斯福表示，“要想真正改善世界现状，必须实现美苏关系正常化”<sup>④</sup>。于是他决定将“整个俄国问题，公开地在客厅里，而不是要在后院、在厨房里讨论”<sup>⑤</sup>。罗斯福的这种态度改变，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内要求改变对苏联的政策不无关系。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致使世界经济下滑，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德、日为此走上了法西斯道路，积极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导致国际局势趋于紧张，对美、英、法和苏联等大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而其他各国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是各自为政，不但没能解决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相反却使原来的经济环境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使得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使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胡佛政府面对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的局面束手无策，国内对胡佛政府的不满和矛盾也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了胡佛总统的下台。在国内外局势存在很大变数的情况下，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直至罗斯福上台才最终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致力于美苏关系的改善。

同时，苏日关系趋于紧张，也促使苏美两国开始接触以改变现状。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扬言：日本必须武力占领滨海、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地区。1933年7月，美国国务院报告称：日本可能侵略苏联。<sup>⑥</sup>在苏日关系日益紧张和罗斯福上台后对苏政策出现松动迹象的情况下，苏联力图趁机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期两国

---

① 这些信件包括1930年3月9日、4月11日、8月20日，1931年1月31日、6月29日，1932年3月25日，参阅A.H.Яковлев.Указ.соч.

② Leo V.Kanawada, *Franklin D. Roosevelt's Diplomacy and American Catholics, Italians, and Jews*,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2, p.5.

③ M.Wayne Morris, *Stalin's Famine and the Roosevelt's of Russia*,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130.

④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页。

⑤ P.B.Robert,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01.

⑥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4页。

在对日问题上能够有所作为。美国著名外交活动家哈里曼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当时，他见到的许多苏联人民委员都非常渴望得到美国的承认。<sup>①</sup>正是由于日本在远东的侵略，促使苏联加强了同美国的联系，希望借助美国来达到稳定远东局势的目的。

同样，在苏联对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的情况下，美国也因德国在欧洲的行动，开始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在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德国走向了法西斯化。希特勒 1933 年初上台后便公开扩军备战，“谋求生存空间”。欧洲局势的动荡，使得美国在德国的投资和贷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亚欧大陆这种日益紧张的局势，使美国感到十分不安。这时美国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苏联，而且苏联在当时国际舞台上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这时的苏联已经加入了《非战公约》，并且与周边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 1927 年开始就参加了世界裁军会议；1933 年又参加了世界经济会议。苏联这种积极地、广泛地加入国际社会的举动，对当时的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赫尔指出：“总的看来，俄国一直倾向于和平。欧亚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时期，而俄国却能够大大有助于稳定局势”<sup>②</sup>。但由于“缺乏外交关系使得两国无法就遏阻德、日扩张进行协调”，<sup>③</sup>为此，调整对苏政策，谋求美苏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

同时，美国国内的情况也加速了美国对苏联态度的改变。首先，美国民众在 30 年代初掀起的承认苏联的运动，对推动美苏建交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美国的一位学者所说：“这可以间接和直接地对参与决策的政治官员起到制约作用”<sup>④</sup>。美国工人在国内掀起了承认苏联的运动。他们认识到，美苏关系正常化必将使两国间的贸易有所发展，这样就会带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就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能使更多的美国人生活改善和工作压力减轻。在这些运动中，以 1933 年 5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大陆会议”最具影响。会议以工人团体为主，通过了必须承认苏联的决议。此外，从 1933 年起，美国工商界对美苏关系正常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1933 年 3 月 21 日，一些“有支配地位的经济集团”与赫尔会面，呼吁政府承认苏联。<sup>⑤</sup>除了前面所说的美俄商会外，在 1933 年夏，以工商界为主的美苏关系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工商界人士中大多数对于承认苏联的问题都极感兴趣，并抱

---

① 陈从阳：“1933 年美苏建交中的日本因素”，《咸宁学院学报》，1996 第 4 期。

②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297.

③ 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

④ [美]杰里尔·A·罗塞蒂等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349 页。

⑤ Willian Appleman Williams, *American Russian Relations, 1781-1947*, New York: Rinehart & Co. Inc, 1952, p.236.

同情态度<sup>①</sup>。再次，在对美国外交有着决定影响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承认”运动也在逐渐扩大。支持承认苏联的人士包括参议员威廉·博拉，以及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活动家约瑟夫·罗宾逊等。他们都曾在国会的发言中公开提出要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sup>②</sup>。最后，美国一部分主流报纸在宣传上改变了对两国关系的看法。一向拥护对苏联采取“强硬方针”的大部分美国报纸，从1933年春夏开始转而赞成美苏关系正常化。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1933年美苏关系委员会就是否承认苏联的问题向1139家报纸征询意见，其中718家即63%明确表示赞成承认；29家即2.6%赞成承认，但态度不明确；86家即7.5%既不赞成也不反对；306家即26.9%表示反对。<sup>③</sup>争取与苏联建交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这种要求承认苏联的趋势，无疑推动着美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罗斯福正是借助于这些条件，开始实施他在上台之前所说的“必须实现美苏关系正常化”。他绕过国务院<sup>④</sup>指派自己最亲近的助手摩根索、布利特等人详细研究美苏关系问题，并亲自研究办理同苏联的一切贸易和政治关系。1933年4月，罗斯福收到了67万多份马萨诸塞州选民的请愿书，和对329位知名人士进行的民意测验的大批材料。这使他确信，美国人已普遍赞成承认苏联<sup>⑤</sup>。这样，在1933年5月，罗斯福呼吁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的信件，直接送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加里宁那里。这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美国政府首次直接送给苏联政府的书信。加里宁立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表示赞同罗斯福总统的提议。而且，在这次世界经济会议上，两国代表还就两国关系展开了会晤。所有这些，对苏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作用。1933年10月10日，罗斯福又通过斯克维尔斯基，向加里宁发出了建议美苏两国直接谈判的历史性文件。<sup>⑥</sup>苏联对此给予了积极响应，欣然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并指派李维诺夫为谈判代表，到美国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谈判。罗斯福的这些努力为美苏建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最终双方在一些问题，如债务问题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于1933年11月16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sup>⑦</sup>，结束了长达16年之久没有外交关系的非正常状态。

① В.Иванов, В.Леонян. Указ.соч. с.62.

②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8页。

③ P.B.Robert,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65.

④ 以罗伯特·凯利(Robert F. Kelley)为代表的国务院提出三个反对承认苏联的理由：一是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实践等问题；二是苏联所欠美国债务和没收美国公民财产的问题；三是美苏之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参见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pp.7-10, 另外，有关苏美建交的障碍，请参见拙作：“试析苏俄建国后影响苏美建交的几大障碍”。

⑤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6-57页。

⑥ ДВП СССР. Т. XVI. Док. 315. сс. 564-565.

⑦ ДВП СССР. Т. XVI. Док. 364. сс. 644-649.



## 结 语

苏美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正是在经济危机时代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双方在经济危机的触动下，搁置争议，以解决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迫切问题为主旨，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改变了苏美 16 年的隔绝状态，加强合作，以达到各自最主要的目的。这对苏美双方及国际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苏美建交后不久，就有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哥伦比亚、比利时等近十个国家与苏联建交，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建交的第二个高潮，扩大了苏联的国际联系，进一步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同时对稳定国际局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国际关系方面，某种影响全球的事件往往是推动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关键是各方如何把握和利用，从共赢的角度来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苏美在经济危机期间，搁置分歧和争议，从国家利益与维护世界局势稳定的角度出发建立的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战略，对于当今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不无借鉴作用。

---

**【Abstract】** The 1929-1933 economic crisis first broke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promptly stalked through the entire capitalist world, hitting hard the economy of both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U.S. A.. Thi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chang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U.S. as well. In contrast, the Soviet economy developed rapidly with its world economic status enhanced during this period. Fac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hanges of the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both the Soviet and the U.S. began to seek means to improve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fric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chan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ultimately thes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normal relations after isolation of 16 years.

**【Key Words】** Economic Crisis, the U.S.A., the Soviet Unio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спыхнувший в 1929-1933 гг.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перешёл на весь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мир, отчего вс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экономика США, си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а. Это оказа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ир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ило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внутреннюю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СШ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быстро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и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СССР повышался. СССР и США,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ситуаци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изменившей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мире,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злич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стали искать пути улучш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редства реагирования на изменившуюся внутреннюю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осле 16 ле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обе страны пошли на нормализацию отношен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США,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致歉声明

因照排公司工作过失,本刊 2011 年第 1 期第 108-109 页出现套色、第 128 页正文头两段段首发生未空两格的重大错误,《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在此谨向广大读者,特别是相关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各位俄苏问题研究者、各方面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我们承诺今后将以更细心的工作、更高学术质量的刊物回报大家的厚爱。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学术对话

# 关于苏联、民族国家与“人”-“地”关系的对话

施展 冯绍雷\*

施展：冯老师，我最近写了两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sup>①</sup>，文中有些非常规性的设想，可能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俄罗斯研究者因无知而无畏吧。但也正因此，心中难免惴惴，想听听您的批评意见。

冯绍雷：这两篇文章我读过了，都还比较有意思。你的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俄罗斯的帝国性，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了，它与俄罗斯内在的巨大矛盾性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我注意到你也引述了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俄罗斯内在的矛盾性正是他孜孜求索的谜题。你这篇文章有意思的部分在于最后关于“欧亚合众国”的设想，设想通过这样一种政体结构，化解掉俄罗斯的帝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张力。严格来说，这种探讨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经验性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政治学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

施展：谢谢您的肯定。第一篇文章所探讨的帝国性—现代性等等张力结构，与列宁、斯大林他们建立苏联的理论拟想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

冯绍雷：这也正是我要提到的。你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苏联大陆帝国之间的关系，它可以作为第一篇文章的一个很有趣的续篇来读。这第二篇从“人”—“地”统一的角度来观察中亚地区，解读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把苏联解体归之于“人”—“地”两空的解释，有一定意义。但是，这样的分析总的来说，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都还不是新的研究。在欧美的苏联帝国研究、以及中亚研究中，都有过这样一类分析。

我倒是有兴趣与你再探讨一下这篇文章的论题之一：“人”—“地”关系问题。

---

\*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① 详参施展：“欧亚？帝国？欧亚合众国！”，《大观》第3期，法律出版社，2010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大陆帝国”，《大观》第5期，法律出版社，2011年。

这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等的核心议题——“民族”由使用相同语言、信奉相同宗教、基于相同文化心理认同的“人”构成，“民族国家”则必须依托于具体的“地”。然而，“人”—“地”却又始终是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在紧张所在。“人”、“地”分离比比皆是，也未见有圆满解决之可能。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各个阶段政治环境与政治目标的影响。比如，正像你文中所言，对于斯大林来说，为了实现终极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普遍性超越，民族现状只是一个过渡；原因之二，还是受历史发展不平衡和文明多样性的深刻影响，任何一种“人”—“地”关系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一个极端的假设：可能“人”、“地”互相吻合和一致仅仅是一种偶然，也许仅可能出现在欧洲部分民族国家。在那里，疆域与民族恰好得以重合。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也许欧洲式的“人”“地”一致或同一的原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亚地区这样的被一些理论认为是“边缘”和“非正常”的“人”“地”交错格局，反而是值得作为“典范”来加以研究的。尤其是当作为标准型民族国家建构的欧洲自己也已经逐渐转化为“后民族国家”之时，这一类思考是否应该进一步推进呢？

**施展：**“人”—“地”关系的确是政治问题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现代尽皆如此。但是，古代与近代在组织原则、理念依托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就我的理解，您方才所探讨的正是近代以来的问题。我以为，近代以来的所谓“人”—“地”关系，只不过是政治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已。其核心目的在于，如何将已经从古典帝国叙事结构下脱出、在“国家理由”理念下构造出了自立之根据的绝对主义国家，转化为人民主权叙事所可以统合的政治体。

**冯绍雷：**实际上还不止是近代国家，这涉及到了古典帝国、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等几种不同的政治统合方式。

**施展：**是的。在古典帝国时代，它所依凭的理念是有着最直接的普遍性的——它要作为一个宗教或是文明的道德理想的现世承载者而存在。政治不关乎特定的“人”与特定的“地”，唯关乎德性。至于它具体的疆域与人民，并不是帝国的本质性构成要素。帝国因此而必定是普世的，或者换成另一个词，帝国本身便是一种绝对性的表现——就现世而言，帝国给出了终极意义，构成了人们的终极效忠对象……

**冯绍雷：**我得提醒你，此种帝国只存在于理念当中，现实当中的帝国必定要有其人民与土地的具体限制的。并且，东方与西方在此问题上是否完全一致？也是需要注意思考的。

**施展：**谢谢您的提醒。的确，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区分的。我先来说说西方的演变吧。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一些大领主带着一群小兄

弟征讨四方，然后分封手下，封土建邦。经过多年的折腾，欧洲在第一个千年之后逐渐开始进入相对成型的封建社会。

**冯绍雷：**这个封建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因其生产方式而获得确认的，因此，还不如说它更多地是因为其分封式的政体结构，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东周列国，包括秦汉大一统帝国以后还局部地出现的分封割据局面。

**施展：**没错。西欧封建社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特定的“地”开始作为领主们的财产权对象存在了。他们的影响力与法理意义都在于其是某一块土地的领主，而那些居住或是被固着于该块土地上的人，则因依托于领主的地产而要服从其管辖。

**冯绍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帝国如果将自己局限于特定的土地，便会丧失其普遍性，不再成其为帝国了。所以，在古典帝国时代，完备意义上的政治体是与“地”无直接关联的；而封建领主，本来便不追求什么完备性，于是，反倒是“地”成了其统治的构成性要素。

**施展：**西方近代兴起的绝对主义国家，其将特定的“地”的因素纳入国家的构成性要素之中，就是从中世纪作为财产权对象的“地”的观念衍生出来的。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便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国家理由”。法国国王就是通过这一理念来论证自己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正当性的。于是，脱胎于封建领地的绝对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具备了自立的完备正当性，也就具备了某种意义的绝对性。

**冯绍雷：**这个绝对性与前面提到的古典帝国的绝对性是不一样的。

**施展：**同意。我的理解是，古典时代的政治具备一种天然绝对性，其以宗教为绝对性载体，外化为一个普遍帝国，只有帝国才具备完备的自在性意义，其他政治体的意义要通过帝国来间接地获得，从而只具备次级地位，也就无绝对性。绝对主义国家的绝对性则是人为的结果。法国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理由是，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如若允许其称霸，则基督教世界将万劫不复；必须有其他的国家与其对抗，才能护卫住基督教世界的道德性，这个“其他国家”就是法国。于是，法兰西王国便无需任何帝国做中介，而具备了完备的自在性意义。法国的论证把古典帝国的天然绝对性掩盖了起来，天然绝对性由单个国家之外的载体——基督教世界的总体道德性——来表达。表面看来，国家自身在历史上第一次去宗教化。

**冯绍雷：**有点意思。但要注意，绝对主义国家的人为绝对性要到民族国家出现的时候才充分表现出来呢。

**施展：**是啊。在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地”是“国家”这一实体的本体性构成要素，但是这仍然涉及如何确认臣民的认同基础的问题。臣民之所以成为一体，在于他们共同效忠于一个国王，除此无他，臣民们彼此之间千差万别并不影响国家的

统一性。也就是说，对绝对主义国家而言，“地”是关键，对“地”的统一治理是其核心关注，“民族”意义上的“人”则不存在。

到了近代，法国启蒙对于理性的推崇，使得“人”被理性化还原了，一国内部的“人”在政治性上被视为应该是完全同质的，这构成了人民主权论的前提。法国大革命中，通过所有的人对于同一部政治契约的明示或默示的宣誓认同，构造出了“政治民族”。“民族”——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才第一次出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与法律拟制的结果，没有任何客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却可以带来一种极为不同的认同基础，化作一种强大的主体性自觉，从而带来国家动员效率的极大提升，这样，法国才可以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欧洲。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反过来催迫着德国去发展起自己的“文化民族主义”，试图确立另一种不同的主体性，来与法国对峙。由此，民族主义扩展开去，出现了一种主体性在世界上的弥散化，诸多群体都主张自己是民族，进而主张自己有权独立，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一种难以避免的逻辑后果。在这里，“人”是独立的前提，“地”不过是这一前提所必须依托的条件，但其与“人”的认同结构并不一定有本质性关联。换句话说，此时的民族主义主张，并不必然地内蕴着民族对于特定土地的依托。

根据前面所述，“民族”或曰“人”，完全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结果，所谓欧洲的疆域与民族之重合，只不过是疆域内的人被有意识地规定为同一个民族而已（而这一规定如何表达，以及它如何转化为一种认同结构，那是另一个问题），无所谓正常与否，它是民族国家正当性叙事所必须的一种拟制。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人们既可以这样规定/或曰表述民族，又可以那样规定/表述民族，结果便带来了大不相同的正当性主张。

无论如何，到了这个时候，前面提到过的“人为绝对性”充分表现出来了。“民族”幻化为现世的神，它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效忠的对象。“民族”凝聚着政治的最高价值与意义，并赋予个人以存在感。“民族”的自决带来该种价值与意义的终极表达。人为绝对性以拟制出来的“民族”为载体，外化为民族国家。

**冯绍雷：**我想你的意思大概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几个要点：1、古典帝国暂且不论，只看近代以来的转变：绝对主义时代有“地”无“人”，而民族国家时代有“人”无“地”，这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推演。2、你认为这类概念属“拟制”，乃是对于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主观投射之一，我觉得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则更是拟制。3、尽管是“拟制”，只要言之在理，仍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斯大林的理论也是一样的。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所搞出的意识形态比起他运用武力还要厉害。4、所以，作为精神现象的民族国家构建叙事成功与否，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就上述而言，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

但我想更着重提出，这一系列的“拟制”主要是基于欧洲民族发展的历史背景。

其实，“民族”这一概念早在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意思指的是外邦移民，中世纪时指的是外来的大学学生，在13世纪晚期英国教会会议时期，“民族”一词则指的是“精英”。一直到后来，随着神权逐渐地为世俗权力所取代，也随着民主意识的提升，拥有“主权”的人民实际上和“民主”的范畴相互联系。按照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的说法，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中的“主权人民”和“民主”的相互联系，这是“民族”概念最后一次重要的改变。相对于其他地区，在欧洲，单一民族比较而言相对较多地聚居于单一国家的疆域之内。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拟制”的结果。但是，因为有了欧洲一系列历史的独特性，比如首先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等等，所以使得欧洲出现了其他地方所没有能够形成的大体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系统。我觉得西方政治理论也主要是基于这样独特的历史基础在进行再创造。问题在于，如果失去了欧洲式的历史背景，政治学理论中民族问题的叙事结构是否还起作用。

记得1982年我留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多卷，系统地阅读他们的民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论述。在当时而言，确实是大开眼界。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马克思有他非常体系化的市场理论，也有他的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见解，但是，相比之下，并没有如同《资本论》那样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系统理论构架，甚至马克思也没有作出过一个关于“民族”的详尽定义。我觉得，实际上马克思这样的处理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实在是因为民族问题太复杂，我觉得更加可能的是，历史进程还没有完全披露，所以，任何一个类似于斯大林那样对于“民族”的定义，都无法涵盖真正建构起各式各样种类的民族的所有复杂因素。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民族问题上如此谨慎的原因。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有必要从若干非经典性的民族发展的历史研究做起比较靠谱。换言之，应该特别关注非欧美世界的民族问题，包括欧亚地区的俄国、东欧、以及中亚等这样一些民族发展的历史。

**施展：**您已经把我们的问题从普遍性的“人”—“地”关系拉回到具体的斯大林民族理论了。

**冯绍雷：**这是你第二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问题。

**施展：**“民族”毫无疑问全都是拟制的结果，斯大林的理论当然逃不脱这种属性。但我个人感觉，我想说的大概比您总结的四点要更多一些。“人”—“地”关系是政治统治赖以落实的结构，但其结构方式在历史上有过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何谓“人”、何谓“地”也要经受不同叙事方式的整合，尤其是在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上，更是有着复杂的结构。具体的我也分成若干点来表述吧。为逻辑清楚起见，也许会与前面的有些许重复。

1、就普遍意义上的古典世界（古典帝国）而言，根本的构成性要素在于作为超越性事业的宗教或文明之道德理想，这不指向特定的人与地，人、地都是作为次一级要素，作为一种事实对象，以该事业的质料的方式被纳入统治。亦即，宗教的道德理想是统治的根本基点。

2、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对领主而言，“地”是其财产权对象，是其统治的根本理由，“人”之所以受统治，是因为“人”因接受封地而宣誓效忠。亦即，作为财产权对象的“地”是统治的根本基点。

3、近代西方革命以来，通过之前所述的各种方式，“民族”被拟制了出来，于是“人”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民族—人”是统治的根本基点，“地”作为该“民族”的财产权对象而存在。

4、“地”作为财产权对象而存在，从而可以对其主张特定的权利与义务。这是西方的特殊产物，是在其他文明中不可能出现的内生性存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民族—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获得完整理论表述的。

5、在现代以前的非西方文明的政治统治中，“人”（在我们的讨论中，除非我用“民族—人”这一说法，否则“人”一词与“民族”无关）或被文明之道德理想所整合（儒家世界、奥斯曼帝国等），或以个人效忠为基础被整合（中亚汗国、蒙藏地域等），这种整合方式与现代所拟制的“民族”没有任何关系。“地”也是因“人”的事实占有而被统治，但并无罗马法下的财产权对象之意义。“人”是统治的根本基点；而“人”未到处，“地”便无意义。这也就是为何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大清便不将其作为国土对待；而同样人烟稀少，俄罗斯却将其作为国土对待。概因对“地”的理解不同。

6、沙俄到来之前，诸多统治中亚的汗国或帝国，其统治便如前述，以个人效忠为基础，帝国疆域及于效忠者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范围，亦即古代中亚帝国以对“人”的统治为前提而形成“人—地”之联立治理，成就帝国。在此种结构之下，帝国的效忠结构一旦崩解，或者帝国统治者一旦被灭族，则土地便四散破碎；而帝国未崩解，但是统治者将人民徙于他处而放弃某块土地，则直接带来帝国疆域的变迁；或则帝国倾覆，但统治者家族中有苗裔留存，则帝国仍有可能徙于他处，比如贵霜帝国，比如巴布尔帝国。

俄国来到中亚，带来了一种大不相同的治理基础。土地不仅仅是因为事实占有而成为帝国的疆域，更是因为作为帝国的财产权对象，土地上的人因居住于该块帝国土地之上，而应当服从帝国的管理，亦即俄国带来了以对“地”的统治为前提而



形成的“人—地”联立治理。在这种结构之下，特定土地上是否有帝国的人居住并不构成问题，关键在于帝国有驻军，可以形成有效的领土财产权主张。俄国的现代武力，加上现代治理结构，使得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持续的统治力量。中亚不会再有陷入整体性混乱之虞——即便混乱，也会是一种特定秩序下的混乱。中亚终于转化为一种现代领土，并有了一个稳定的主人。

7、到了后来，苏联建立起来了。出于建立大陆帝国之需要，中亚也是苏联必须掌控住的。但是此时苏联在中亚面临着一个新的敌人——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模式的“民族”规定（或者说，这不算“民族”规定，而是一种不同的正当性模式的规定，但这全在于我们如何界定“民族”一词的内涵了），可说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它对于突厥裔人（何谓突厥裔人，也是人为规定或曰拟制的结果）之效忠的吁求，直接威胁着苏联的中亚稳定。于是有了我们所看到的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一系列辗转腾挪。

8、斯大林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一种不同的“民族”规定模式，其提出民族的四要素理论，使得“人”和“地”必须被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才构成“民族”，否则便不成其为“民族”。于是，形成了“民族—人—地”这样一个复合观念，与此前的“民族国家”中对“民族—人”的拟制有很大区别。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与特定的“地”被作了一种本质性的勾连。从而，原本只作心理认同规定、而不诉求于特定的土地的泛突厥主义便被否定掉了。苏联可以依托新的民族理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重新划定中亚疆界，又可以在共产主义之终极超越的理念之下，确保苏联对于中亚的统治。至于中亚还曾有过的另一支力量——泛伊斯兰主义，由于它从根本上拒绝“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在斯大林充满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中，不足为虑。

当然，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所图更多，我这里只不过是高度简化，只考虑其与当时的泛突厥主义之间的较量。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中亚最后站住了脚，并不是因为它比泛突厥主义更正确——这种理论上的事情根本找不到谁正确——而是因为斯大林的理论有武力为后盾。霍布斯告诉我们，现代国家的最大秘密就在于主权意志的绝对性，而主权意志又是以主权的绝对武力为前提的——武力不一定需要实际运用，只要构成一个随时可能降临的惩罚，便足以起效。泛突厥主义没有现实的武力支撑，其主张不可能有实际效果。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借助于武力的成功，便有了强行灌输的基础，从而将自己的“民族”理论化作中亚人自己主动的一种认同结构，使他们放弃了泛突厥认同。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结果，但在当时，这可能并不是唯一的逻辑取向。

（下转第7页）

# 俄罗斯大事记

(2011年1-2月)

## 1月

- 3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签署法令分阶段减少公务员数量,公务员总数将在2014年下降20%。
- 4日 俄罗斯能源部发布公告称,2010年俄罗斯共开采了6503.11亿立方米天然气,较2009年增加11.5%,石油开采量则增加2.2%至5.05194亿吨。
- 5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旨在完善国际集团和国家公司活动的法律体制,提高他们活动的透明性和战略规划质量。
- 6日 俄罗斯批准与蒙古建立“多尔诺德铀矿有限责任公司”(Dornod Uranium)合资企业开采铀矿的政府间协议。
- 8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批准与日本核合作的协议。
- 1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限制包括北高加索联邦区在内的边境地区的土地购买。
- 12日 俄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宣布,据初步统计,去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3.8%,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8.3%。
- 13日 俄罗斯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称2010年通货膨胀率为8.8%,国家赤字占GDP3.9%。
- 17日 俄总理普京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英国石油公司(BP)商定联合开发俄罗斯北极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双方已达成股票互换协议。根据协议,Rosneft将以9.5%股份换取BP5%的普通股。
- 18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贸易谈判司司长、俄罗斯入世谈判首席代表梅德维德科夫(Maxim Medvedkov)表示,俄今年4月可能在技术上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 19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安曼(Amman)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讨论了继续进行中东和平进程的必要性;梅德韦杰夫重申俄罗斯支持成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 20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保证向白俄罗斯提供40亿美元的石油补贴。
- 21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随后,两国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
- 24日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爆炸造成35人死亡,120人受伤。
- 25日 俄罗斯与法国签署了购买“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的协议。  
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俄罗斯与美国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署的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New START treaty)。
- 26日 俄罗斯外长和日本外相证实就争议岛屿的对话仍将继续。
- 28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警察法》。
- 30日 因埃及爆发反穆巴拉克政府“革命”,俄罗斯能源企业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和诺瓦泰克(Novatek)开始从埃及撤离职员。
- 31日 拥有一半秋明英国石油公司(TNK-BP)股份的俄罗斯AAR财团在英国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互换股份和建立联合项目的协议后冻结了股息支付。该财团称这一协议将破坏财团的竞争优势。  
俄罗斯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1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达44.5万亿卢布。

## 2月

- 1日 俄罗斯谴责欧盟和美国对白俄罗斯新的单方面制裁。
- 2日 俄罗斯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在“俄罗斯-2011”论坛（The Russia Forum 2011）上发言称俄罗斯无法再一次重现2000年至2008年间的生活水平以及宏观经济指数飞速提升的景象。
- 4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i Serdiukov）对千岛群岛四岛中的三个岛屿进行了军事视察。
- 5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交换了正式批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军备控制协议。  
俄外交部强烈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前任主管、埃及反对党现任领导人巴拉迪（Muhammad al-Baradei）致力于和平改革的建设性对话。  
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称俄反对伊朗拥核，但关于对伊朗能快速获得核能的担心被夸大。
- 7日 高加索叛军领导人乌马罗夫（Doku Umarov）称1月24日的莫斯科机场爆炸案在其命令下执行，而且将会有进一步的此类的行动。并呼吁俄罗斯离开高加索，要求中国、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停止操纵穆斯林国家。
- 8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在莫斯科会见丹麦国防部长时表示俄反对将北极军事化。
- 9日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Vitali Churkin）要求安理会向中东派遣代表团，以促进巴以和谈的恢复，稳定该地区局势。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证实，2010年俄对欧天然气出口量仅有1386亿立方米，不仅低于此前预期，也低于出现经济危机的2009年。
- 10日 俄经济发展部向政府提交了2030年前俄罗斯发展预测草案。文件中包括两种方案—创新型和能源原料型。
- 11日 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到访莫斯科，要求俄罗斯早日解决两国领土争端。  
俄驻波兰大使称俄正在寻求以法律途径恢复卡廷惨案受害者的名誉。
- 13日 俄罗斯电力能源公司（INTER RAO）董事长科瓦利丘克（Boris Kovalchuk）宣布了与叙利亚和土耳其开展联合电力项目的计划。
- 15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称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应损害中东和平谈判。
- 16日 俄总理普京会见了承担更新2020年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21个专家组的负责人。
- 17日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宣布俄将从2012年开始追加GDP的1.5%用于军队和国防工业开支。
- 21日 鉴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及美国驻俄罗斯使馆不久前发表了关于支持日本向俄罗斯提出领土主权的声明，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贝尔勒（John Beyrle）。
- 25日 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Sergei Shmatko）称俄仍有兴趣参与布尔加斯-亚历山德鲁波利斯（Burgas-Alexandroupolis）跨巴尔干半岛石油管道项目，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如果保加利亚放弃使用如今的补偿支付机制，俄罗斯将准备退出。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允许运输武器、装备和美国军事人员经过俄罗斯领土至阿富汗的协议。
- 27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敦促利比亚领导人停止对民众使用武力。
- 28日 俄罗斯人权活动家警告英国不要削减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拨款，称俄罗斯公众院（Russian Public Chamber）的分配不透明。  
俄罗斯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称高油价将增加俄罗斯的储备基金，且今年的预算赤字可能降至2%或者更低。

（胡彦辑）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2期

(总第168期)

##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